



从银行不被看好谈起

作者题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银行传统业务急剧衰落乃至金融市场终将代替金融中介的说法甚为流行。这样的论点一时之间在国内也颇有声势。与这种观点有联系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市场主导型还是银行主导型的讨论。在这方面自己没有从事过长期研究，只觉得走向任何极端恐怕都不符合生活规律。

2000年12月上旬，招商银行给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有关银行前途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这篇文稿。文稿主要是分析之所以形成这种对银行前景悲观估价的国内与国外，理论与生活的背景。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银行存在——不只过去存在而且将来存在——的理由，并未展开正面的理论剖析。

其中只有一点，即从现代货币的存在形态角度论证银行存在的必然性，则是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银行的发展形成了现代的信用货币形态及其创造机制；而现代的货币形态又使银行成为现代经济生活无法排除的一环。逻辑推导，假如经济生活中



的支付不必通过“货币”，那就不需要银行创造货币；假如可以给经济生活提供一种绝对稳定的度量价值的尺度，那么现在由银行创造的不是贬值就是增值的“货币”就更没有必要保留了。关于前者，虽然还不是事实，但现在的技术好像有可能实现；至于后者，说法一直不断，却一直没有接触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应该说，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经济学最具有根本意义却又抽象得实在难以把握的课题。

文章发表在《金融时报》2001年1月13日理论周刊（有删节）；《经济导刊》，2001（2）。后编入《金融——词义、学科、形式、方法及其他》（金融出版社，2001）。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一）近来银行不被看好

近来，碰到几个情况，是关系银行的：

1. 不久前，给一个单位的金融专业研究生讲课，有的研究生问：是不是学“投资”有前途，学“银行”没前途？他们说的投资是指环绕证券市场的一套运作和学问。随后了解，在金融专业中，这样的考虑相当普遍。

2. 另一个情况是，一些大学的金融专业对于“发展方向”和“课程安排”有些拿不定主意，酝酿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依然按原来的兼顾宏观调控和银行、证券的方向走，还是把主攻方向放到像美国商学院讲“金融学”的路子——主要研究资本市场的路子——上去？

3. 先先后后碰到一些银行从业者，他们相当普遍地有种



惶惑感：摆在前面的路似乎越走越窄。

（二）近 因

1. 研究生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极其现实的出发点：学投资，毕业后可到证券界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比到银行工作的待遇好。

“学”方的动向不能不反转过来影响“教”方。

就现实的情况看，把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和证券业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后者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前者；后者吸纳人才的增长速度也比前者为高。这样的客观存在影响学与教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2. 与之同时，还涉及一个理论判断：主张“功能金融”并出版有“FINANCE”^[1]的美国著名学者兹维·博迪，在接受中文译本出版者的采访时有个提法：“必须抛弃银行”^[2]。近来，在教学与研究领域也不时听到类似的见解，来源恐怕也不止兹维·博迪一人的说法。如银行已是“夕阳产业”、是“现代恐龙”之类。

3. 银行界从业者的心境似乎与“必须抛弃银行”的理论论断关系不大；直接原因可用他们自己的概括来说明，那就是极其狭窄的存贷利差空间给予他们沉重的压力。

如果仅仅是报酬的差异，那是会随着时间转化的：也许过不了多久，由于人才供需的调整，人们会重新看好银行的工作岗位。但“银行”如果必然被“抛弃”，那就意味着在今后已无发展前途，银行不被看好将是不可逆的。至于中国的银行“摆在前面的路似乎越走越窄”的问题，有些特定的来由。不



过其深层次也涉及“必须抛弃银行”的理论论断。所以，对“必须抛弃银行”的论断需要冷静地加以思考。

（三）关于“必须抛弃银行”

可分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第一个层次，先从理论上分析。

银行，习惯上被视为是典型的间接融资金融机构^[3]。这里，先撇开银行的名称，从功能出发，看看在金融飞速发展的趋势中间接融资的命运。

1. 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大家都不会否认的前提，即货币的存在。

2. 在肯定这个前提之下，进一步考察货币存在的形态：

现在，货币都是以债权债务的形态存在的——不论其存在的形态是以纸文书或其他实物材料为载体（如钞票、硬辅币），还是以账簿记载或磁盘上的电磁信号为载体（如存款）。在这种形态下，货币金额就是确定的债权债务金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债权债务的金额就是确定的货币金额。

3. 是否还有其他的载体可作为货币？所有权证，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交易的所有权证，能否作为货币的载体？由于它的市值大大脱离面值而且不断波动，难于充当货币；今后有无可能，眼下尚无迹象可资剖析。

不仅所有权证，就是债权债务凭证，如国债券，一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其市值的波动，纵然具备极高的流动性，也尚未划进货币的圈圈直接用于支付。

4. 如果肯定货币是以债权债务关系为载体，那么货币的



支付不过是债权债务的转移与对冲。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于货币支付系统的任一环节均不能不成为债权债务的融资中介。这是因为：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必须在货币支付体系的某个或某些服务环节中保持用于支付的货币余额。按现有的经验，还难以设想摆脱以存款形式保存支付准备的可能性。这样，支付服务环节就必然集中相当数量的负债。

有了负债，不运用无以均衡。如何运用？不外两大途径：或投资，或拆放。投资，无论是投资于货币市场，还是投资于资本市场，有利于分散风险并保持较好的流动性。可是，在所有以存款作为负债形态的货币支付环节，均由投资全部覆盖其资产业务的可能性尚待论证。拆放，纵非唯一，也可能并非主要，但恐怕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排斥。至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在支付之际，难以避免有短期拆借的需求。此外，诸如消费信用之类，能否全然摆脱债权债务的运作形式也有疑问。

也可设想，在支付结算过程中，信用透支额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存款；但如果全然代替，信用透支这种资产业务将成为货币支付系统各环节资产业务的主要构成部分。而“透支”，实际是贷款，是间接融资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就是说，仅从货币支付系统的角度来看，间接融资的中介，作为金融的一项功能，是难以完全抛弃的。

5. 这时，服务于货币支付体系的各个环节——具有间接融资功能的环节——将何以名之？

就历史的延续性来说，恐怕不名之为“银行”而另造新名，没有必要。如果说，银行产生之初，是较为单纯的间接融资机构，只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混业经营得到发挥，单纯间接融资的业务比例自然缩减。这时的银行虽然还称银行，显然，



其活动性质已发生变化。如果只要冠以银行之名就把它认定是只能从事单纯间接融资的机构，那倒有点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味道了。

应该说，叫不叫“银行”并不是本质问题，核心是间接融资的功能废不掉。从而，执行这种功能的金融机构——绝不是说这个机构只能从事这一种功能——也就不能予以“彻底抛弃”。

第二个层次，兹维·博迪的本来意思到底是什么？

由于没有看到他有关这方面的较全面的论述，不好作判断。但就这篇采访记来看，博迪所说的银行，有其特定的含义——“一种从家庭取得存款，并向商业机构借出有风险的贷款的机构”^[4]。这是美国30年代以来规范的银行模式，即简单存贷的经营模式，或曰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如果说，“必须抛弃银行”指的是抛弃这种模式的“银行”，在证券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就是在长期严格分业监管的国家，事实上也已经被“抛弃”——即便不是彻底被“抛弃”，至少已有越来越大的部分被“抛弃”。

兹维·博迪指出，单纯存贷的间接融资机构，风险无法自己化解。这是极其正确的概括，也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的确，一方面是对存款的无可讨论的及时支付的义务，另一方面是贷款不可避免的风险。双方极不对称。这就是说，单纯的存贷运作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先天脆弱性。以存款保险制度化解风险，弊端极大，已有事实证明，并且也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5]。对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兹维·博迪的见解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货币市场相互基金是代替银行的理想形式。货币市场基金对于负债业务所汇集的资金是以投资于货币市场的方式运作的。这就解决了银行贷款集中风险的矛盾。不过，由货



币市场基金替代银行，在美国，大概也还是一种主张；至于前景是“替代”还是“共存”，目前还给出可作有把握论断的实践根据。回顾货币市场基金刚刚突破金融管制的束缚破土而出之际，美国的银行很快就纷纷取得在银行内举办这类基金的准许。所以，除了“替代”、“共存”，还更可能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前景。换言之，作为微观经济行为为主体的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不会死守从事单纯存贷业务的“纯洁性”而不去寻求弥补先天脆弱性的可行途径。

此外，货币市场基金是在美国发展的。除非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以货币市场基金替代银行，否则国际间资金的调动和调剂还是银行业占有的天地。

（四）深层次的原因及其在 学科建设中的反映

名人的一句话可以成为导火线，但没有深层次的原因，不可能有巨大的影响。全面概括深层次的原因非能力之所及。粗略想来，好像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一方面，证券化的迅速扩展，使证券市场充满活力与挑战；在这样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对比看来，银行体系就显得“传统”、“凝重”、“老气横秋”。而且，冠以银行名号的机构，其融资数量，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份额明显走低——特别在分业经营的国家是如此。另一方面，证券化以其锐利的渗透力使许多金融活动演变成复合型的。如贷款这种银行的传统业务可以证券化，如包括大额存单的货币市场短期融资工具则是以证券化的运作为支撑的。这意味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不断地在多



方面结合起来。这时，一项业务往往包括几种性质的金融运作，或者说是几种性质金融运作的复合。于是，过去银行向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强力渗透的势头就被证券化、被金融资产投资迅速走向覆盖全部经济生活的气势所代替。在这样性质的发展中，无疑，银行如果依然想保持传统的纯洁与正统，必然被淘汰出局——自己就会抛弃自己。要生存，那就不能不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背景上，金融学科的建设也反映了同样的特点。那就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的研究成绩突出，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在一篇讲演中描绘了这个过程^[6]。他指出，标志着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金融学”、“现代金融学”形成于1950年前后。其发展里程是：

——马科维茨（1990年获诺贝尔奖）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

——威廉·夏普（1990年获诺贝尔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有效市场假说；

——莫迪利安尼-米勒（1990年获诺贝尔奖）定理，即M-M定理；

——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的期权定价公式（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获1997年诺贝尔奖）。

对于通过这样进程建立起来的“金融学”、“现代金融学”，默顿·米勒把它的成果归纳为“商学院模型”，把它的方法论概括为“微观规范分析”。其基本内容，大略是“价值评估”、“风险管理”、“资产组合”、“资产定价”……实用的领域是公司理财，是个人理财，扩展地说，是一切经济行为主体理财的



理论和模型。

如果说，对环绕资本市场的上述问题从微观角度研究探索所建立起来的学科称之为“微观金融学科”，那么相对应，有一个“宏观金融学科”似不成问题。然而答案并不是可以简单肯定的。

否定的回答：金融学就是在商学院中发展起来的“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不过是宏观经济的内容，是宏观经济学。

肯定的回答：宏观金融确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有其独立的内容。

就我们现有的学科设置来看，金融学科的主课是货币银行学或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其基本内容大体如下：

1. 以货币供求和资金流动为核心的宏观金融理论、利息理论、汇率理论等。

2. 环绕间接融资的理论：这涉及货币市场及其运作机制，银行和非银行中介机构的功能及其经营管理原则等。

3. 环绕直接融资的理论：这涉及资本市场及其运作机制，证券化拓展的必然趋势，证券和衍生工具的价格形成，投资银行和券商等中介机构的功能和经营管理原则等。

至于保险学，一直是独立于货币银行学之外的，可暂且存而不论。

根据这样的内容，恐怕不仅应该说有一个宏观金融学科，而且在以资本市场与资本资产为内容的微观金融学科的旁边，还有另一块微观金融学科——环绕间接融资——的组成部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国外商学院发展起来的微观金融学是“现代的”，那么，宏观金融学科的现状应如何评价？环绕间接融资的金融学科的现状应如何评价？

相对于微观金融研究的成就，宏观金融的研究成就有哪



些？也可看看获诺贝尔奖的情况：包含有宏观金融内容的宏观经济学的成就获奖甚多，不过企图把应属于宏观金融领域的成就从宏观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可能不那么容易做到。较为直接关系宏观金融的有：1974年，弗·冯·哈耶克和纳·缪达尔以研究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获奖；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创立货币主义理论获奖；1981年，詹姆斯·托宾以凯恩斯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获奖；1985年，弗兰科·莫迪利安尼以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获奖；1999年，罗伯特·蒙代尔以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及最适货币区的分析获奖。相对于微观金融分析，给人的感觉不如商学院发展资本市场理论那么集中。

至于环绕间接融资的金融学科，特别是环绕银行的理论，在我国国家确有不少值得论证的理论问题。如分业与混业，如银行业的准入与经济成分的相关关系，等等。但就世界角度看，近几十年这方面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建树是什么？说建树，当然有。如货币创造的理论，其较为透彻的解决，据说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相比之下，好像年代久远，已不那么耀眼生辉。

简言之，无论是宏观金融学科，还是环绕间接融资的金融学科，的确面对着“现代”化的任务。

可能正是这样的金融学科发展状况，也使得曾经具有强吸引力的银行问题逐步减小了魅力，并进而促成人们从消极的角度对之进行观察。

（五）中国具体环境中银行之命运

我国的银行业者，其所以觉得眼下的日子不好过，顾虑前



面的路越走越窄，直接的压力，前面指出，是极其狭窄的存贷利差空间。如果全面剖析这个狭窄的空间，原因会是多方面的：

——如通货紧缩（这里是单纯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下滑或疲软）的宏观环境决定了低的利率水平；而在低利率水平之下，利差必然是较小的。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虽然利率水平高，但时常受到负利率的威胁，不过银行业却会有较大的获利空间。这种宏观环境的可变性不涉及银行生存的根本问题，宜另作讨论。

——如贷款的资产质量较好，即使利差较小，也不会造成沉重的压力。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体制因素、社会不良因素所造成的银行不良债权居高不下。无疑，这涉及银行的生存环境，极其重要。但体制因素、社会不良因素关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限于银行业，是本文容纳不下的大课题，也宜另作讨论。

直接涉及银行本身的原因恐怕是如何安排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90年代中期之前，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格局，往往有“混业经营”的说法。对于这样的归纳，可能不太确切。20世纪以来，混业经营已相当规范。或一家银行兼营存放汇、不动产抵押、信托、租赁、投资、保险各业，各业独立核算，并设置必要的防火墙。建国前中国的银行业，如南五行、北五行，大多是这样的经营模式。或存款银行、不动产抵押银行、投资银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相互参股；或金融控股公司麾下形形色色的金融企业。而参股、控股，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有法律、规章可循。至于我们前些年的问题是：银行也好，信托投资公司也好，信用社也好，经营同一的存贷业务；或账内，或账外，同样地高息揽存、高息拆放；或账内，或账外，同样地炒作股票、炒作房地产、兴办形形色色



事业。而且，资金在不同投放领域之间的变换，完全由一位或几位负责人决定。对于此种情况称之为“乱营”或可，称之为混业经营似乎有些褻渎“混业经营”的声誉。当然，要对9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的银行业作全面估价，是不能简单戴“乱营”的帽子的。甚至具体到评价“高来高去”，对之简单加以否定，也不见得客观。但就那时存在的弊端而言，说“乱营”，也许并不过分。

“乱营”，当然应当整顿。然而，回过头来看，整顿“乱营”，却走了一条从理论和指导思想上当彻底地以分业经营否定混业经营之路。

严肃的银行业者，无人认为应该回到以前“乱”的状态；如果归纳前瞻的思路，大体可概括为：

1. 银行一统天下的岁月不会恢复，但思想的清理也许是长期的任务。

2. 简单存贷的经营模式，即严格的分业经营，已不适应今天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形势。银行法的修订实际已提上日程。

3. 现有的银行，业务结构必然不断变化：在银行与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之间开通必要的资金通道；投资性业务（绝不简单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炒作）将逐步发展；由于某些贷款业务的证券化，贷放与投资相互渗透的业务比例将从无到有，逐步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纯粹的债权债务运作领域自然会逐步有所压缩。

4. 但这是一个过程。西方有些国家一直采取混业经营，如德国、北欧各国，他们的银行，有人称之为金融的百货商店，有人称之为金融的超级市场，有人甚至称之为金融的杂货铺。而刚刚走出分业经营约束的国家，他们的银行还要在混业



之路走上一段。至于是否一定走到欧洲银行的混业模式，也有待观察。我们中国的银行，即使明确要走出分业经营的界限，向混业经营的转轨无疑也需要走上一些年。

世界各国的银行均面临着挑战。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似更为严峻。问题是能否适应形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指导思想 and 业务结构的格局。事实上，世界各国今日的银行，就其业务经营方式以及所采用的金融工具来看，已大大有别于昨日的银行；同样，明日的银行，可以预见，也不会死守今日银行的全套模式。如果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接轨是我们不能不走的路，在金融、银行领域的接轨过程中，只要不排斥世界各国银行业，特别是长期实施分业管理各国的银行业，适应形势、调整行为所开拓的路，我国的银行业同样拥有开阔的发展空间和绚丽的美好前景。

【注释】

[1] 译本《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见北京大学出版社《探索智慧之旅》，42页。也见《光明日报》，第7版，2000-10-21。

[3] 现在，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分，界定的标准好像并不统一。本文采用的区分标准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不论是银行还是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以还本付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属间接融资；以“买卖”股票、债券、衍生工具以及类似性质的金融工具的方式融出融入资金（不论经过几层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均视为直接融资。是否妥当，可另作讨论。

[4] 同注 [2]。

[5] 当然，较之我们由国家全兜起来的办法，存款保险制度恐怕还是一种“进步”。

[6] 译文见《经济导刊》，2000（2）。相对于“微观规范分析”和“宏观规范分析”，他还使用了“商学院方法”和“经济系方法”。



这就是炼狱之门

作者解题

2004年1月10日，第八届资本市场论坛：“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银河证券、《中国证券报》、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联合主办。

会前虽也想了—想应该讲点什么问题，但会上的即席发言并没有完全受原来的想法约束。这里的文字是就记录稿整理的。总的意思是：当方向已经肯定，勇敢—点地跨入炼狱之门，是否不失为可取的选择？

会后媒体多有报道。记录稿收入《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附录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资本市场论坛已经是第八届，我都参加了。每届的主持人跟我都有默契，就是不安排我在会上讲话。可是最后都让我讲。由于仓促应战，曾经有一届，我把“资本市场论坛”讲成了“资本主义论坛”。在座各位可能不少都参加过那次会。所



幸的是没有因此把我打成保守派。

对于资本市场，我确实没有做研究。原来这届的主题，叫“全流通之路”，现在叫“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还是那个意思。关于“全流通之路”，能讲些什么？想借用但丁《神曲》的一句话——“这就是炼狱之门”！

《神曲》为人们的灵魂安排了三个去处：地狱、炼狱、天堂。罪恶深重的灵魂自当入地狱。炼狱则是有罪孽的善人应该经过的地方——在这里，善人要洗净自己的罪孽，以便升入天堂。至于天堂，那是善而又善的人才资格直接去的胜境——对于我们，似乎过于遥远。为什么把“全流通之路”形容为“炼狱之门”，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穿越了地狱——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当时的气氛来说，把发展股份经济，建立证券交易中心形容为下地狱，恐怕也不为过。

想当年，如果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勇气，就通不过地狱的磨难；既然已经经历过磨难走出地狱，按理说，跨进炼狱之门，岂不是小菜一碟！然而，在这扇炼狱门前却犹豫、彷徨，一晃就是两年。

问题的症结是：下地狱的那时是鸿蒙初开，大家不分彼此，一块往下跳。然而现在，面对炼狱之门的却是两个精灵——在地狱中演化出来的流通股和不流通股这两个精灵。在地狱中，两个精灵，难兄难弟，结伴而行；而今天，在经历了地狱磨难之后，却是全力以赴地要首先把你我的权益先分个清清楚楚。

国内国外，业内业外，很多善男信女都在摇旗呐喊，鼓励前进。最好听、最美丽的一个词就是“双赢”。其实双赢的本身就是利益的重组，说得白一点就是讨价还价。就因为有益冲突，在进门的时候，到底谁先进，谁后进，怎么进，如何分



担进炼狱之门的成本，就成为大问题。

现在问题是对于这个社会成本怎么估计。我们要进这个炼狱之门，就要改革我们原有的路径，必然要为之付出社会成本。这在经济学上没有问题。但是改革原有路径的社会成本一定要低于原来路径依赖的成本。只有如此，改革才是成功的，有利的。那么，怎么样衡量路径改革的社会成本和路径依赖的社会成本并加以比较？相关的变量那么多，怎么能算清？当然，有人说，路径依赖的成本极大，不用算。刚才成副委员长（成思危）说的四个缺点，就是论证不改革的成本很大，很大。但这样的论证很难说服想拖延一段再看看的人——按照原样子，日子好像还能过得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感觉，问题的解决，可能应该寻求这样的选择：不管算清还是算不清，改革总比维持好。这句话可能太空洞了。但终究是把这两个精灵推入炼狱之门，才可以实际看一看有怎样的结果。我想经过了地狱磨难，到了炼狱之内，无论如何，也不会灰飞烟灭。这里面，不外乎会受到两方面的责难：

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是始于今天，更不是因为全流通它才有流失——流失的过程是改革以来的长期过程。而且这里不是“零和游戏”，不会是国有资产的全损失。说双赢，不一定是一比一，也可能一方损失得多一点，但终究不是全损失。而且纵然有流失，恐怕对经济的发展也不会造成致命的损害。“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是不是还要深一步地考虑。

另一方面的责难——要得罪股民，而股民是得罪不起的！在座的，大概有不少股民的代言人。我说一句也许大家听着不太中听的话，在中国的各类人群里面，不应该得罪，但又不得



不得罪的人群中，绝不止股民一家。如果对股民得罪一下，造不成致命的伤害，而且今天得罪了，明天就可以大展宏图，这怕什么呢？

所以选择是不是可以勇敢一点。后果可能弄不太清楚。但有点不太清楚，大概总不会有碍于我们经济的发展。通过我们经济内部的潜力和目前发展显示的潜力来看，即使遇到了一些困难，受到了一些挫折，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能够克服的。我的这个说法与成思危副委员长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他是要求审慎研究，我是李逵三板斧，平头砍去。但我想，当大家对问题扯不太清楚的时候，强力推进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这要请大家考虑。

问题还是要回到论坛上。今天我们的论坛要努点力，看看是否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出社会成本较低的路径改革方案，并且有力地把两个精灵共同推进这座炼狱之门。预祝论坛能够实现大家期待的突破。

谢谢！



学科建设：概念与体系





《货币信用学》· 编者的话

作者解题

我开始从事金融学科教科书的编写，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改编苏联的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根据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我所在的教研室随即提出编写中国版本教材的任务。那时，苏联的相关课程是两门：《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在教学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是否把两门课并成一门课？在当时，这种想法是有混淆两种社会制度的政治风险的。195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解放思想”的口号。它鼓舞我们把突破苏联框框的想法付诸实践。我先是在校外，用两课并一课的讲法试讲了几讲，随即在教研室组织两课并一课的《货币信用学》的编写。其所以未采用“货币银行学”的名称，依然是想与西方有所区别。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货币信用学（上册）》。书中论点已不完全照搬苏联——有了根据中国情况概括出的自己的体会。在这本书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教材



内容的第一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基本原理的论述”。现在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可以是：这本教材不止讲社会主义、讲中国，更要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在货币银行领域中共同的东西。也正是由于隐含的这个意向，曾一度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批判。

由于1959年秋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下册未能出版。

后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不少兄弟院系编写的教材采用了“货币信用学”的名称。

这篇“编者的话”未收入任何文集。

2006年8月

长期以来，在教学工作中总感到缺乏一本适合于我国同学学习的“货币信用学”教材。过去较长时间我校是使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有关教材，至于有关中国的货币信用问题则只编写了一些不够系统的讲义。显然，这种情况是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的。

去年整风以后，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我们教研室决定编写一本内容从中国教学实际出发的“货币信用学”。一方面考虑到教学急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考虑到我们的力量、水平有限，因而确定先编一本内容比较简要的教材。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吸收些经验、听取些意见，如有可能，再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写一本内容比较完整，比较充实的教材。

货币信用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一本30万字的教材中显然不能全面包括。为了重点突出，我们只阐述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基本原理的论述；（2）社会主义货币与社会主义信用的理论；



(3) 我国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货币信用的利用；(4) 我国现行的信贷与货币流通的组织与计划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货币与社会主义信用的理论，应该论证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情况综合概括出来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除对苏联的情况了解较多外，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则了解的非常不够；如果说得更全面些，我们就连我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深不透的。因而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就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一部分中有些论述我们吸取了苏联经济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就；但也有一些论点则主要是我们根据我国的情况概括的。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货币信用体系、在组织和运用货币流通与信贷中，苏联的先进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按理应该比较具体地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并说明我们是如何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运用的。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这样阐述有一定的困难。因而除了少数地方之外，我们没有联系苏联的经验。这一缺陷在教学过程中倒是易于弥补的。

在教材编写中碰到的另一困难，就是如何处理目前还在争论着的一些问题。大家知道，在与这门科学具有最直接关系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分歧的看法，当然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信用理论中来。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关货币信用的具体规律与范畴的论证也存在不少尚未统一的意见。企图回避这些分歧不仅不应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采用客观介绍的方法，那又将使本书不能成为一本具有独立体系的教材，而成了资料汇编。根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最后决定在这些争论问题上只阐述我们所赞同的一些意见。应该说明，其中有些是教研室大多



数同志赞同的，有些则只是部分同志赞同的。当然，这些看法可能不正确，但只有鸣放出来才能得到更具体的帮助。至于对同学来说，我们想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学习中他们还要参考很多对立面的意见。

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的体例是新设计的，因而全部是根据有关资料新编写的。第二篇主要是根据过去教研室编写的三章有关中国货币信用制度发展历史的讲义改写的。这三章讲义从1951年开始编写，以后历年修改、增补，并曾多次油印供同学参考和分送兄弟院校征求意见。第三篇、第四篇的各章，教研室在1956—1957年也曾油印过，但这次的改动较大。

先后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有黄达、肖清、程曙光、栾重威、林与权、周升业、李春等同志。1958年短期信贷专业的毕业生也曾参与一部分资料整理工作。全书最后的统一校改与定稿是由黄达、林与权、周升业三位同志负责的。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不当之处难免。希不吝指正。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说明

作者解题

改革开放后，我所在的教学群体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写教科书。自1978年底到1980年，我和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四同志合力写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

写这本书，主要是总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几年教书的心得以及十年动乱的教训促使我们对那些心得的重新思索，其主要思路集中在我为这本书起草的《说明》中。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两节。

《说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课题：以包括货币、资金、财政、金融等范畴在内的统一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到底应名之为什么学科？有人说可叫“货币经济学”，有人说可叫“宏观经济学”，等等。后来，没有再花时间来专门思考这个问题，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形不成一个精确的概念。但不管怎么样，从这时起，我就是沿着货币流通和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这个线索，尽力从总体上、从相互不可分割的联系中作了一些探索，并于1985年出版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由于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过了80年代初的几年，这本



书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差堪自慰的是恢复高考后的两三届财经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多还记得这本教材。他们之间的不少人表示，这本书在财政金融理论启蒙中所起的作用，是直到今天还未曾忘怀的。全书定稿是1980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1981年8月。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一

开始打算写这样一本书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个打算并非偶然。我们都是从50年代初期、中期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教研室和金融教研室任教的。那时，讲课不过是苏联有关教本内容的简单复述。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逐步感到问题不少。一是课程内容不尽符合需要，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在课程中缺乏应有的反映；二是财政、金融方面有关的各门课程彼此分割，重复脱节，缺乏内在联系。因而，日益感到课程需要改革。1958年的“大跃进”是个推动。“大跃进”给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也正是这些教训要求我们以科学态度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然而，这在我们过去奉之为圭臬的外来教本中并无现成的答案。而且仅仅抱住一门课程所学到的那点知识也完全把握不住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必须从各个有关范畴的相互联系之中才能把握的问题。所以，改革课程已势在必行。那就是，必须把实践所提出的理论课题纳入教学内容，必须把有关各门课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问题是如何开步。



在困难时期，在财政金融领域之中，大家关注的理论问题之一是综合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很感兴趣。由于它涉及面广，要求有关各课的教师参与讨论，于是就开创了我们两个教研室原来各抱一门课的同志们共同研究的风气。那时，环绕着这个题目以及其他一些题目，我们写了一些文章。通过这段共同研究活动，当我们从量的关系上进一步认识到财政、金融以及财务等范畴相互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之后，随即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量的紧密联系是否反映着它们之间在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课题，而且环绕着这一课题深入下去，或许就是解决课程改革如何开步的门径。于是我们就酝酿两个教研室合起来，沿着这个思路，共同写一本既不叫财政学，也不叫货币信用学，但又能综合反映有关各部门学科科学成果的书。能否写好，没有把握，但我们相信，选定这个方向开步走，总比在老框框里兜圈子会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但在形成这个想法不久，1964年开始了“四清”运动，随之十年动乱接踵而来，当然一切都谈不上了。70年代初，人民大学停办，不久财政金融专业又被取消。那时，转做什么的都有，但就是没有人还研究社会主义财政金融理论。然而多年培植起来的专业情感依然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四人帮”一被粉碎，大家不约而同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把这个中断了十几年的计划重新拣起来并设法完成它。在1978年初人民大学复校的消息传出后，我们即着手组织。这样，丢了十多年的事情又有了新的开端。开始，参加讨论计划的几乎包括两个教研室的全体同志。后来，由于其他任务甚多，才逐步集中由我们五个人执笔。



二

一旦开始着手编写，立即碰到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是：

（一）我们所要描述、所要探讨的对象是什么？当然，它不只是货币，不只是资金，不只是财政，也不只是金融，如此等等。因为这些都是现有独立学科的独立对象，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则是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但是，在60年代提出是否有一个在质上统一的客体之后，我们并未开步走。所以，今天我们的起点仍在原处，即对这个有机统一体是什么，我们仍然不过是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

粗略想来，这个统一体似乎具有如下的特点：

货币，或者说商品货币关系，是它的前提。在这个统一体中，我们找不到与货币无关的范畴和运动，也许可以说，没有货币，也没有这个统一体。

资金，特别是货币资金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货币收入，像是它的实体。这包括基层经营单位中周转的资金；包括各种形式的，其中主要是居民的货币收入；包括通过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分配和再分配的货币资金和货币收入，等等。它们相互依存，紧密结合，舍掉任一环节，整体将不存在。

在国民经济中，这个整体并不是以其构成的各个部分分别地、独立地、互不干扰地发挥作用，而是既分别但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相互均衡地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发挥作用。如果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不是在有机的结合中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国民经济中社会产品的运动，也即物化劳



动的补偿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即不能实现。

在实现着社会产品运动的过程中，这个整体构成了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宜于概括为价值方面，还是货币方面，抑或是资金方面，可进一步推敲，但它确实是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与作为实物形态的社会产品相对。这两个互为条件的方面，相互作用，调节着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方面的矛盾又会集中地回归到货币问题，即流通中货币量是否与客观需要相符合的问题，或者说，物资供求是否平衡的问题。

虽然有了这些看法，但对这个整体到底应该怎样加以科学概括，仍然是我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处于对象还没有怎么搞清楚却要对之阐发的矛盾境地。不仅由于对象尚无科学概括而一时难以把全书的体系作出合理安排，而且甚至本书如何题名也成了问题。不过，我们的想法是，与其等待有朝一日——如果有那么一日的話——给对象下了科学定义之后再动笔写，不如现在就把我们所想说的按照怎样说着比较顺当的次序表达出来。当然，这免不了出现把几门学科的内容用串糖葫芦的办法简单串在一起的毛病，实际上这个毛病也很突出。但如果不开步走，恐怕我们只能沉浸在自己的计划中而无所作为。所以，我们下决心摆脱通常写教材时总会把作者搞得头昏脑涨的“对象”、“方法”之类的缠绕，不揣冒昧，斗胆动笔，并暂且标了个书名——《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二) 其次碰到的或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的标志到底应该怎样进行科学概括。

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财政金融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社会主义的，那就应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衡量可以称之为社会主



义社会的一切模式中的财政金融规律。显然，如果从原则到具体概括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的明确界限，我们就具有了最首要的前提。问题是，大量的问题还没有现成的答案摆在那里。但是如果要等待这些基本问题通通搞清了再来探索财政金融理论，那也无异放弃探索这一学科的努力。看来，只能在探索财政金融问题的同时也要探索作为首要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力不胜任的。我们的态度是能搞清一点算一点，如果一时提不出明确的看法，在不能回避的情况下，就沿用传统的说法。大体说来，如下的几点是我们的共同看法并力求贯彻于全书的。

(1) 赞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是消费，是人民需要，从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特别是积累同消费的比例等重要方针的确定都必须从这个目标出发的观点。与之同时则强调必须重视正确处理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矛盾。

(2) 承认国家所有制在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的基本形式之一，并且本书在论证各个范畴时主要是以这种公有制形式为出发点。同时，赞同在所有制问题上对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观点的批判，承认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发展。

(3) 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我们的理解是，其中必须包括有指令性计划，如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要有指令性计划保证；基本建设规模和重点国家应有统一的计划安排；工资应有统一标准，价格应有计划价格，工资、价格的调整必须由国家计划统一控制，等等。同时，则强调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调节的必要性，强调组织经济生活应有足够的灵活性，反对统死、管死。对于计划调节和利用价值规律调节这两者，我们赞同两者可以统一的论点，但反对那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任何有实质



意义的矛盾的看法。

(4) 从不能脱离物质利益谈经济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赞同必须承认国营企业有其本身的物质利益并须相应地赋予它以应有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而且，调动基层生产单位的积极性，这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具有关键的意义。所以，对于正确处理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我们是把它视为经济改革的核心，并强调其他一切改革均必须服从于这一核心的要求。

(5) 经济效果是关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管得好还是管得不好，经济效果是集中的表现；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种种矛盾能否解决得好，其物质基础也在于经济效果。所以，我们是把经济效果既作为目标，又作为衡量器来看待，强调各项经济工作，其中也包括财政、金融、财务等各个方面的一切改革和措施，均必须着眼于提高经济效果，并以能否提高经济效果这个标准来检验。

(三) 如何处理理论论述同现行政策、现行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久已存在的问题。过去，我们的经济学科往往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探讨客观规律性，并据以剖析和评价有关的现行政策和做法。恰恰相反，我们却往往是把现行的政策和制度作为只能肯定的前提，设法论证其正确性并据以建立“规律”。比如，多年来，用现行的物资管理体制论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情况是极为多见的，至于我们这套物资管理体制到底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管理生产资料的要求，可以说直到这次改革才作为问题提出来。这类本末倒置的情况显而易见是谬误的，无疑必须抛弃。因而，在写这本书时，我们强调写基本知识，写基本道理。当然，讲基本知识和基本道理也不能



不涉及过去实行的、现在实行的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政策和措施，问题是并非作客观介绍，而是要借以总结出一些基本的规律性。但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距离甚远，目前还只能说是向这个方向努力。

（四）关于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学科中，很多概念，从内涵到外延，大家理解得极不一致。如资金、财政、货币流通等等，你一个界说，他一个界说，各自从自己的界说出发作文章，给进一步的讨论造成很多困难。还有一些概念，如积累、财政赤字等等，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易说清之处，但如深入追究一步，如何确切使用这些概念也并非没有问题。我们在本书中把有关的各个范畴放在一起研究，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能在相互联系中对有关的界说、概念作些推敲。当然，如果能够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概念体系最为理想，但这绝非轻而易举，更非我们今日之水平所能及。我们只是力求在这本书中，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我们如何看待、如何使用各个有关概念作些交代，并试图协调对各个有关概念的理解，使之不要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当然，实际上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地方恐怕还不少。

（五）就我们的最初设想，本书似应包括货币、资金、财政、金融、个人货币收支、对外金融、综合平衡等七个部分。个人货币收支本是一个很明确的对象，然而多年来它只是在研究市场供求和货币流通等问题时顺便涉及的问题，似乎构不成独立学科，也没有多少理论可谈。到底是的的确不值得研究，还是由于我们未曾花力量研究而不了解其奥秘，这当然应该讨论。但现在，现成的研究成果积累不多则是事实，因而这个空白恐不是短期所能填起来的。对外金融倒不会有人认为是没有值得研究的内容，问题是多年来闭关锁国的方针使我们一直把我国的经济当作一个最纯粹的封闭型经济来看待，以



致对外金融这门学科，除去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少数人员外，很少进行研究，因而基础也嫌薄弱。目前只好暂付阙如，来日努力，或可补救。这样，我们现在就只能拿出五部分，当然，颇不完整。



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学》课程发展的回顾及如何进一步建设

作者解题

1987年8月下旬，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大学发展项目Ⅱ”，召开了组织中外学者参加的“中国财经教学计划研讨会”。会议提出了财经类专业10门核心课的目录。这个目录曾受到不少责难：如方向有问题，如中国人的教学计划为什么让外国人来定，等等。但让中国人自己本着牢牢掌握大方向的精神来设计，也不过是这么几门课，而且对一两门课是否列入也会存在同样的争议。所以，虽有风风雨雨，并未影响这10门课的建设。

在竞标程序下，由我牵头的《货币银行学》写作设计取得了编写的任务。1989—1990学年，中国人民大学金融教研室的周升业、王松奇、李焰、沈伟基等同志先后参加了大纲和教材初稿的编写。1990年6月《货币银行学》的大纲出版。为了在教委要求组织的“暑期《货币银行学》师资讲习班”介绍货币银行学的大纲，我准备了一篇讲稿：《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学〉的足迹》。讲习班办得并不理想。参加的师资不少人认为大纲内容太多，不好讲；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对于办好



讲习班的准备不足。同时也暴露了对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参与者之间缺乏认识上的交流。为了较为充分地表达自己对于建设这门学科的想法，遂在《足迹》这篇讲稿的基础上加以增补、推演成为本文。

关于“回顾”部分，是我根据自己从事、参与的教学实践总结的。至少许多史实难以从书面材料找到。任何领域，历史都是应该了解的，因为任何领域都有鉴古知今的必要。增补的部分是写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中特别是讨论货币银行学中是否只能有西方经济学所创建的原理。这是一个属于思辨性质的论题。文章中的有关论述，今天看来，自己并不满意。不过，我仍然有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对于经济学原理的创建，必然有其应有的地位。

作为努力方向，全文的最后一句是，我们应该编出“中国人，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为了使中国的学生，掌握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领，而传授《货币银行学》所需要的教材”。这个观点是否成立，那是要由《货币银行学》教材的编写实践来论证的。

本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1），并编入《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使用参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货币银行学》是财经类专业普遍开设的课程。为了把这门课程建设好，提出几点想法同大家讨论。在说明这些想法之前，回顾一下40多年来这门课程的建设历程可能是有益的。



一、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学》发展的回顾

一切从头来

我们今天讲的《货币银行学》，可以说基本是从1950年开始建设的，或者说，是没有怎么继承新中国建国前对这门学科移植、探索的成果。那时的想法似乎是：我们要建设的是新的，旧的那一套过时了。建设新的当然应由新的思想体系来指导，但把一切原有的知识都视为无用的，则显然是过分幼稚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旧中国对货币银行问题的研究有不小成就：（1）关于教科书，有几本中国学者写的货币银行学原理。内容大部分是介绍西方理论，但也都有不少部分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此外还有几本翻译的教材。（2）关于中国30年代至40年代金融问题的研究，文章、专著甚多，如白银问题、法币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涉及面很广。这类文献对于了解建国前的国情是很有价值的。（3）对世界金融动态的介绍和研究有大量成果。如关于30年代世界性的货币战、布雷顿森林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各国债务的整理等等，都有一些著述。（4）世界金融名著翻译，如费雪的《货币购买力》，1934年即有商务印书馆的译版。（5）关于金融史和地区金融问题的研究，均有一定的规模。（6）关于农村金融、合作金融的研究总体规模很大。这样大的研究规模在世界上也很有特点。（7）关于金融资料的积累，等等。

当然，以上所述都是四五十年以前的文献，现在讲授《货币银行学》的同志，除非专攻现代中国金融史和金融思想史，



已无必要再花过多的力量去考察这些事情。但在 50 年代初，对这些成果未予应有的重视，对我们自己的知识积累来说，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损失。是否可以这样说：不论在任何时期，对前人的文化积累采取简单否定态度，恐怕并不能使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更正确些，或许还会使自己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付出更多的代价。

学苏联

那时，我们的口号是学苏联，强调“一边倒”，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绝不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而要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从走什么道路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把这个政治观念绝对化地扩及到如经济理论的建设领域，就未免简单化了。这在《货币银行学》的建设中也概莫能外。于是，在 50 年代初，苏联大学中的货币银行学教学体系就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我国的高等院校。

当时，苏联高等院校的《货币银行学》，其主课是两门：《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在这两门主课下面，有《苏联信贷的组织与计划》、《苏联货币流通的组织与计划》等。

《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们简称“资本主义部分”，在苏联的权威教本是由艾·雅·布列格里编写的。这本教材的核心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的理论，基本上概括了马列主义原著有关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并作了便于理解、掌握的必要整理。总的说来，是忠于原义的，但有的概括也不很确切。现在我们结合西方现状讲授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学原理的体系，即基本脱胎于此。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在这一部分中，布列格里对货



币、银行诸范畴下了一系列定义。有的定义是马克思的原话；但有些是苏联学者的，甚至就是布列格里本人的。例如，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就是布列格里本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对通货膨胀本质的表述。所以，不论这个定义对还是不对，确切还是不确切，全面还是不全面，都涉及不到马克思本人。然而我们那时往往采取了这样的公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混淆，造成不少思想上的紊乱。

结合着货币银行学理论的阐述，这本书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货币银行体系的形成及现状，并注意揭露这个体系的矛盾，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的情况很有帮助。至于对资产阶级货币银行理论的批判写得则不成功。一种观点为什么是错的，我们从书中找到的多是表态性的结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这些错误为什么会形成，更难找到有分析的答案。用这种批法能否把资产阶级货币银行理论批倒，大有疑问；以这种批法来教学生，当然也不见得能真正增强“免疫力”。

在布列格里这本书问世以前，有一本李达教授写的《货币学概论》。这本书是根据苏联柯兹洛夫教授的一本教材改编的。柯兹洛夫的书有个译本，但太难读，流传不广。所以对于苏联货币银行学资本主义部分内容的了解，首先是通过李达的改编教材，随后才是布列格里的教程。

如果做总的估价，苏联货币银行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在我们这里所起的最主要作用是引导我们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银行理论。不过，这里有两种态度：一是以之为起点去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其原意，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独立思考地观察现实金融世界；一是认为布列格里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记下来就等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一种态度实际上是自己堵塞自己前进之路，现在看来，似乎



幼稚得难以理解。

《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这门课我们简称“苏联部分”。那时我们先后译了两本教科书，内容基本一样，大体由三块组成：

(1) 社会主义货币、信用的必要性及其对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优越性和本质区别。这实际上是建设社会主义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无疑很重要。但在这个问题上写得与《政治经济学》简单重复。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1952年发表的。在这前后，苏联经济学界有一场关于商品货币问题的讨论；我国经济学界那时也讨论了一阵子。只是这些讨论才多少充实了我们当时有关这部分的讲授内容。

(2) 苏联货币银行制度形成的历史。这块是按历史顺序讲的，按理说，应把苏联货币银行制度为什么会改造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必然性交代清楚。但如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教科书写得却不理想。幸好，那时翻译了几本苏联专著，如关于十月革命后的银行国有化，关于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关于1930—1932年的信用改革等专题著述。这些书有较多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为什么这样改而不那样改，遇到过什么困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等等。不过，很多情况，我们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楚。

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教学，还是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在苏联的确有个“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实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的确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模型。对于这个模型，今天我们发现它有颇不理想的缺欠——并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但我们还是要以十分景仰的心情和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回顾这场巨大变革。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真正认识世界、认



识历史。

(3) 对苏联的信贷、结算、基建投资拨款和现金发行等制度的介绍。这部分与相关具体业务课程的重复很多。类似的重复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也还是颇难处理的。

总的看来，相对于资本主义部分，这个苏联部分像是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体系。

联系中国实际

那时一方面强调学苏联，一方面还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不少教师在掌握理论、了解苏联和不断深入认识中国自身这几个方面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1) 结合货币银行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努力从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银行理论，并力求对它进行比较准确、比较深入浅出的诠释。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银行现状也力求介绍得比较全面，比较易于为中国的读者所理解。我们曾按照这样的要求改编了布列格里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这本教材在高等院校及有关干部学校中曾被普遍采用。

(2) 努力了解苏联，力求原原本本地介绍苏联。那时的确下了工夫，多少还是开拓了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了解苏联的路子。遗憾的是，当这种了解有可能真正深入下去的时候，由于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样的研究戛然而止，对于发展我们的学科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3) 对中国情况的整理主要从三方面入手：建国前30年代至40年代旧中国的货币银行制度；解放区的货币银行制度和政策；建国前后开始的制止通货膨胀，建立人民币制度，改造旧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建立新中国银行体系，等等。最初在人



民大学形成了三篇油印稿，通称为“中国部分”。

1956年前后，“苏联部分”开始取消，从而形成直到现在还采用的格局：“资本主义部分”和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社会主义部分”。后一部分也就是在“中国部分”的基础上并入“苏联部分”的论点而逐渐充实发展起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实际部门的理论工作者，在理论修养方面底子都比较薄弱。于是苏联的说法先入为主，对一些人的思路影响较深，形成束缚。自然，观点只要是正确的，我们应自觉地接受这种“束缚”。但问题是我们那时所接触的苏联观点，有些地方有明显的局限性、片面性。因而由之造成的束缚不能不对思路的开阔有所影响。

突破

1958年，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相应的还有打倒奴隶主义、打倒“贾桂”的提法。这些口号和提法的背景有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提前到来和对所谓“马鞍形”的批判等等。后来实际生活的发展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将提前到来的预期。所以，如果不是就字面来理解，这个“解放思想”实际上是过急的愿望，是与对主观能动性过高的估计等等纠缠在一起的。因而很难一般地给它以肯定的结论。但就理论研究角度来看，这个口号还是起了颇为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突破了对苏联教学内容和理论观点几乎是一字一趋的桎梏。

从课程体系看，在这以前已有了一些变化，如“社会主义部分”逐步由“苏联的”转变为“中国的”，但总的说来还是苏联定下的大框子。考虑到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的



重复，1959年我们编了一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的（或社会主义中国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二合一”的《货币信用学》。这在当时也还算是个大胆的举动。但是不久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批判”，罪名是混淆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但排除这种胡乱批判的过“左”做法，大家看法也不一样：有赞同的；有人认为还是分开讲好。直到今天，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是否应该这样认识：合起来讲与分开来讲，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优劣之分，本质的正误之分，似乎不必非得有一个统一的见解不可。

“大跃进”中间，在教学内容、在理论观点方面，似乎还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起的突破性进展。原因可能是“解放思想”刚刚开始之际，很多理论问题在大家的头脑中还处在开始思考酝酿的阶段。至于当时大肆渲染的所谓“突破”，多是“大跃进”的空话。例如，货币可能很快消亡；如银行不要账，不要柜台；又如“实物”储蓄；哪里需要就在哪里贷款，需要多少就贷多少的生产观点等等。显然，把这些主张和做法称之为“突破”的确是非常滑稽的。

在货币银行学的理论建设上，1961—1963年这三年困难时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问题倒不是在章节安排上又有什么新的花样，而是在教学内容上有了新的进展。概括说来，就是我们的认识，我们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是我们自己通过对自己的国家的国情和实践的认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并由自己思索、总结、概括出来的东西。如果说50年代初，我们讲授货币银行学不过是介绍人家的思想，那么，经过10年，在60年代初，已经主要是讲授经过自己理解、消化，从而有所取舍的思想。

其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当然可以回溯到1958年解放思想



口号的提出。不过开始时，这个口号虽然帮助我们解脱了简单照搬苏联的束缚，但就理论思考来说，所引导的却往往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大跃进”的方向来解放，从而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所谓“突破”的笑话。只是到了1960年底、1961年初，才出现了有利于冷静地、科学地进行思考的环境。人们回顾了建国10年来走过的道路，其中有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成功经验，有“大跃进”时期的失败教训，并作出了理论判断。可以说，只有这时，才由解放思想的方针引出了积极的成果。

这一段的研究成果，从现在的标准看，数量很少。因为那时理论队伍很小，而且货币银行问题也不被重视。思想突破的程度也相当有限，因为我们那时的出发点还只能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模式。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相当有限的思想突破也并非轻而易举的。

可惜的是，利于开展学术探讨的气氛存在的期间太短了。从1964年下半年起，可以说又再次失去了这样的环境。那时，大家曾想比较全面地探索金融理论问题，曾想组织力量编一本水平较高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等等，但都落空了。至于进入“文化大革命”，教学和理论研究一停就是10年。

前一阶段的总结，新一阶段的开始

十年动乱期间，在货币银行理论的建设上乏善可述，然而也不能简单地画个零。1980年前后的几年，出版了一些书籍，有教材，有专著。作者有“文化大革命”前在学校中执教的，有“文化大革命”前在实际部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所以能写出这些书，作者们主要是依靠三年困难时期的思想酝酿。十年动乱确也使他们体会到一些过去不甚了了的东西，这主要是政治



的、社会的、哲学的，虽然不是货币银行学的，但加深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提高了他们专业的思想水平。这些改革开放的著述，对于培养新一代的金融理论、教学 and 实际工作者起了历史作用。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市场机制日益被广泛地运用，货币银行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步入了繁花盛开的阶段。上面所说的那些著述，虽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实际，但总体来说，它们的历史地位在于为 17 年货币银行学的建设划上一个句号。而作为改革开放新内容的反映，则是迅速增多的、数以千、万篇计的文章以及一些新的专著。对比十年动乱以前的著述来说，其数量可说多出不止千百倍。其中有对基本理论的探讨，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理论的研究可以说都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课题，而对策性的研究也都注意以一定的理论剖析为依据。从质量上说，对比十年动乱以前的著述，也升高到一个新的阶梯。

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推进，无疑给《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增添了大量新的内容；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大量新编教材无疑也因之有程度不同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货币银行理论发展的这个新阶段虽然尚在进行之中，也许还不到进行结论性估价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已经经历了 10 年，中间不断出现的起伏和波折也促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深化。在这种形势下，通过比较深思熟虑的回顾和思考，编出能够充分反映 80 年代研究进展并能较好满足时代和改革开放需要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恐怕已是摆在我们货币银行学教师队伍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如何建设好《货币银行学》 的几点想法

确定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基准线

《货币银行学》是一门财经各专业从中专开始直到攻读博士学位多层次开设的课程。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当然有不同要求。那么，基准线定在哪里为宜？

大学本科是学习专业打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既要求对有关必须学习的各专业领域的课程有一个成体系的了解，同时又要求为进一步深入攻读有关课程打下基础，也就是说，如只学到这个阶段而不再进入高层次学历教育阶段深造，已可对各该门课程有个基本系统的、完整的了解；已可在实践中锻炼如何对它们加以运用。如果要求攻读高层次学位，本科的学习是必要的、不易逾越的阶段；如果希望自学钻研，本科的学习也应使学生具有独立深入探索的功底。这是本科对一般必修课（包括货币银行学）的共同要求。

对于财经类专业来说，绝大部分都应学习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这是不需要特别论证的。至于各专业的不同要求，一般来说是次要的；过分强调不同要求，甚或有害。因为这门课的核心部分，必须成体系地学习；过分轻视整体而强调部分，部分实际也难以把握，至多也不过是了解一些具体知识和情况，而难以起到这门课程对提高各该专业水平的作用。至于财政、金融专业本科对《货币银行学》的要求，从学科深度的层次上与其他专业比较，也许需要有某些提高，但更多是论证的细化和面的扩展，是考虑到其他相关课程而对课程内容如何讲



授有些独特的安排，等等。

所以，基准线似以大学财经类专业本科阶段的共同要求为宜。

对《货币银行学》的讲授，有的安排是一门课，有的安排是两门课，甚至还有多门课的，那是否能找出一条共同的基准线？如果不考虑有关业务技术课的内容，不论是几门课，内容都不外是基本理论加基本知识。它们的范围应是可以讨论清楚的。简言之，课程如何讲，书如何写尽可不同，但在基准线上则应通过讨论，逐步取得共同认识。当然，所能取得的不会是绝对的一，而只能是比较接近、比较一致的看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我们讲《货币银行学》，是为了使学生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这里有个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涉及我们对理论观点评价的标准，而社会主义方向本身就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货币银行理论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其精髓不只是指其精辟的理论分析和论断，而更是指其进行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在今天，乃至将来，都具有真理性的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保证我们所推进的货币银行理论的科学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拒绝任何非科学的武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保证货币银行理论建设可以吸纳旁人研究货币银行问题的一切合乎真理性的内容，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具有极大活力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消化、改造一切有益于自己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要求而构建起来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等于句句拘守马克思经典作



家关于货币银行问题的任何论断。的确，时代的变化，甚至像货币、信用、银行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类的主要问题，简单引用马克思在前一个世纪的论断来加以概括都是不充分的；至于货币、信用、银行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作用更不宜简单地直接引用。这要求我们在坚持的前提下加以发展。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读马克思的书。与货币银行学建设有关的，如80年代初对《资本论》二卷的研究，又如为了解释价格形成规律，为了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发展股份制度问题而引起的对《资本论》三卷的重视等等，都很重要，需继续坚持。近年来，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动摇的问题。这不能不影响货币银行学的建设。我们应该引导受这样思潮影响的同志读马克思的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少人并未认真研究读过；不了解就反对，似乎有些奇怪，但却非个别现象。真心实意从事教学、理论的工作者，是追求真理的。当有些人认真研读之后，往往自己会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摇和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引进现代西方货币银行学

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下，货币银行学的建设，不借鉴西方而完全走自己探索的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也并不可取。比如，关于信用与货币供给一般关系的理论，这在西方经济学中到30年代已经解决得很具体，而我们却长期自己摸索，走了不少弯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为其目标模式的，这要求对市场机制的广泛应用。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主要是以市场机制这个侧面为研究对象的。对于这个侧面，西方经济学一直没有中止研究，而我们



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很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西方经济学仍然采取简单排斥态度，并企图自己全然从头做起，那就未免迁阔了。

问题只是在于，当我们引进西方货币银行学时，是否牢牢地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是否始终明确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学科体系的根本区别：一个以论证资本主义永恒为己任，一个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为己任；一个论证市场机制是不可代替的，一个论证计划经济的必然性；一个把个人的利益追求作为不可代替的社会动力，一个确认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将使集体主义成为社会动力的主导，等等。只要在基本上保持清醒，那在如何引进西方货币银行学方面就能分辨是非，掌握分寸，而不会陷入迷信、照搬的危境。

现在确有西方一切都好，西方的学问比我们都高的思潮。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而不能以拒绝接触、学习、借鉴西方有用的东西为对策。再有一种倾向就是对西方的东西不懂充懂，“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真懂就谈不上鉴别，这是时刻需要注意防止的。

是中国的，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

我们要建立的《货币银行学》应该是中国味的、中国化的。具体是否应该这样要求：

从基本理论这个角度考虑，如果需要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史料来说明，首先是要采用中国的。因为货币、信用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并不落后于西欧，有些地方还有其特色。比如，就币材说，西欧是从银向金过渡，而中国在先秦时即有金的广泛使用，但东汉以后却突然中断，而成为



布帛和铜币的天下；再如，对利息，西方中世纪曾把它视为罪恶的渊藪，而在中国却长期不存在严厉反利息的思潮和斗争。如此等等，不能不使我们对相关理论论断的表述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需要用资本主义的史料来论证，则首先要用西欧的。比如，要说明现代银行的发展，不能不谈到16世纪至17世纪威尼斯等地的银行，不能不谈到英格兰银行。这时如硬要以中国的“柜房”为主线来论证，那是荒谬的，以钱庄、银号论证也不典型。但说了西方必须回来说中国。纵然可以略去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但半殖民地货币银行制度的发展则不能不予理睬，当然应尽量控制在说明理论观点所必要的限度内。

如果需要用社会主义的资料，苏联的不能不讲，否则说不清中国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制度所采用的模型的渊源。但宜尽量摘取其最必要的部分，以保证中国现实资料的主导地位。

从基本知识这个角度来考虑，无疑主要是讲中国，以使学生对当前中国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货币信用的运行机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做法等等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没有考察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银行学》教程，仅以美国为例，讲货币是讲美钞，讲银行是讲联邦储备制度，其他国家的情况至多偶然带上几句，如讲通货膨胀，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例子等。在他们那里，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我们这里却要专门强调，这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或存在过主要讲西方或主要讲苏联的状况。严重者则是这样一种若明若暗的观念：外国有成系统的模型，讲来带劲；我们这里一切乱糟糟，似乎无从讲起，乏善可述。假设确是一切乱糟糟，那也要把怎么个“乱糟糟”讲一讲，否则谁来治这个乱糟糟？

当然，我们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只讲自己的。我们要取他



山之石以攻玉；我们要改革开放，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些都要我们对外国的情况，也包括货币银行领域的情况，有必要的了解。

综上所述，或许可以这样概括：我们的货币银行学，必须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为背景来建设。由于这个背景的特殊性，我们又不得不以相当大的力量把有关外国的历史和现状引入这个背景之中。这就使我们中国学生为了掌握科学，不得不比有些国家的学生付出更多的劳动。

也应有中国的“原理”

问题之所以提出，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讲货币银行学，事实上主要是讲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在中国，可能讲的只是这些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的运用，在中国这块土壤的本身不可能产生具有独立意义的原理。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

(1) 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银行学，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对立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银行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货币银行学。两者都是以纯市场机制或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为背景展开分析的。由于统一的背景，所以对一些范畴可以有相同的概括，比如，都认为货币的特性是可以交换到任何财物。但由于思想体系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具有这个特性的货币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转化为资本并最终导致对自己本身的否定；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的这个本性由于最适合于个人利益驱动的市场机制，从而决定了它本身的永恒存在。这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由于都是从理性高度做出的抽象概括，因而没有人怀疑它们的“原理”资格。当然，从是否是真理的角度来评判，一个是肯定的，一个



是否定的。但肯定也好，否定也好，这构不成它们能否称其为“原理”的理由。所以，只有在西方经济学中才存在货币银行学原理的这种说法，从这点来看就不能成立。

(2) 如果说，以市场机制为背景建立起来的货币银行理论，纵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体系，但都可以称得上是原理，那么以计划经济为背景建立起来的货币银行理论，是否也有资格称得上是“原理”呢？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最早在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型。而以这个经济模型为背景建立的货币银行理论是不成熟、不够理想的。但作为一个原则或方向，这个模型是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从而以它为背景形成的货币银行理论也不能全然否定。这样一来，在以市场机制为背景的货币银行理论之外，事实上又存在着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货币银行理论。如把前一类理论称之为原理，而后者只配称之为前者的具体运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错误的。比如，对市场机制来说，保证货币无拘无束地发挥作用是最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银行原理和西方货币银行学原理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不同的判断。而对计划经济来说，在允许货币存在的限度内，也力求使之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同时对其的限制则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就我们所了解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来说，为了保证直接计划指标的实现，限制货币的作用是有必要的条件。显然，不同的背景有显然不同的观点。而要把这显然对立的观点说成一种观点不过是另一种观点的具体运用，未免过于牵强了。如果承认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货币银行理论不能视之为以市场机制为背景的理论的延伸，又不能抹杀，那就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以市场机制为背景的货币银行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的货币银行原理之外，还有一个以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背景的货币银行原理。

(3) 在诸多国家先后掀起改革的浪潮以来,探索一个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想模型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课题。中国在自己的探索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就基本思路来说,这个模式鲜明地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针对中央集权计划模型的弊端而采取极富有创新精神的改革方针,其中包括在管理经济中相当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虽然这个模式尚在形成的过程之中,但已可看出,以之为背景的货币银行理论必然相应具有自己的特点:肯定货币银行的作用应有极大的提高和扩展,这使其有别于以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为背景的理论;强调货币银行的作用,应体现广泛运用的市场机制必须受计划经济制约这一要求,这又使其有别于以市场机制为背景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论点不会是前几种原理的简单加减取舍;虽然它与前几种原理的因缘关系有脉络可循,但也很难说成是前几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应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立特点的体系,从而是有别于前几种原理的一种原理。

当中国按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时,应该说,中国形成不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银行学原理,至多不过是使引入的原理带点中国味,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实际存在的情况。假如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同样也形成不了自己的货币银行学原理,照搬西方原理即可,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走的路,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货币银行学原理的基本内容现在谁能系统地陈述出来?这如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一样,以之为背景的货币银行学原理也必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过程之中如能提出成熟的、系统的原理倒是不可理解的了。成熟的、系统的中国货币银行学原理旁人不可



能为我们准备好，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

有这样的原理，有那样的原理，是否还有更一般的原理？应该说是有的。因为当我们比较各种原理时，不可避免地有共性的提炼，而共性也就是一般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原理体系都必然涉及这些具有一般意义的内容。但真正的一般必须是真正共性的提炼，而不得把某一种特定背景的原理封为一般的原理。特别要注意的是，切不要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货币银行学原理就是一般的原理，而其他的原理都只不过是这种原理的具体运用。假如这个认识成立，那么，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所论证的货币银行理论观点，凡不符合西方货币银行学理论的（这种不符合是必然的），那就不符合原理；我们的金融政策和措施，凡是用西方货币银行学理论度量有出入的，那就是不按原理办事。怎样才能符合原理，才是按原理办事，答案也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市场机制。只要彻底按市场机制的要求重组我们的经济，也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那时任何中国化的货币银行原理必将与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合拍，而任何政策、措施也必将是按原理办事的了。所以，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货币银行理论视为原理，那就难免要得出这种危险的结论。

几点其他想法

教材一般要编入比较成熟的理论论点，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往往给人以绝对真理总汇的印象，这很容易桎梏学生的思想。是否应该在教材中既把已垦土地加以描绘，更把未垦的广袤荒原展示在学生面前，以便诱导学生懂得掌握已有的理论自然极为重要，但用这些理论去开拓、去创新，并在开拓创新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更是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中国，货币银行



理论——中国化的货币银行理论建设正处于探索的过程之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这样的特点：其中的一些方面，已有多少成熟一些的理论剖析，大家也有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更多的方面还不清楚，多种意见并陈。在这种情况下，侧重点似乎更应放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开拓进取方面。

货币银行理论，发展是迅速的；货币银行制度、业务操作和运行机制，也日新月异地起变化。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如此。所以，教材必须能够诱导学生注意理论的新动向、制度的新变化、实务的新进展。但要把一切新的都在教材中点到，恐怕任何教材都是容纳不下的，而且也无必要。我们的任务是选择最重要的新的发展信息，通过它们使同学牢固地建立这样一种观念：客观世界在不停顿地发展，如果不注意把握新动向，则难以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也许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即在注意新的同时，也要重视货币银行学科已经取得的成果。前人有经验，有教训，有已经开拓的路，不必都要自己开头。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全然自己开头，但不尊重前人，不过是自己多走弯路。这里所说的前人，主要不是指古人，而主要是指现代人，包括那些只比自己早走一两步的同辈人；外国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往往倒是被重视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前人更要特指中国人。

一点概括

上面说了一点又一点，似乎头绪很多。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作为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工作者，应该致力于编出：中国人，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为了使中国的学生，掌握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领，而传授《货币银行学》所需要的教材。



最重要的是学科内容的建设

作者解题

1997年9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四川省金融学会、《金融时报》理论部、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等4个单位在成都举办“'97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对于金融学科体系问题已有一些教师发表文章。当时，对于引起讨论的背景——由于国外大学商学院有关课程FINANCE的引进而引发的对“金融”概念的理解分歧——我还不甚了了。在会上，我只是一般地讲了讲过去有关财政、金融范畴的诸多界说，目的是希望不要把主要精力陷入望文生义（特别是对翻译过来的词语）和就概念论概念的圈子之中。发言中的看法都是有感于建国以来在学科建设中的酸甜苦辣而发的。

会后，对发言进行了文字整理。整理后的文字刊载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一书。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一) 这次会召开的背景是去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的研究生专业培养目录。原有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含保险学)”和“国际金融”合并为“金融学”,列在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

学位委员会此次调整专业目录的方针,是贯彻全国有识之士,特别是教育界有识之士多年不懈的呼吁:拓宽培养口径,扭转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以提高培养质量。这是正确的方针,在制定培养计划时应努力贯彻。

调整目录的过程中,归并划分过细的专业和确定归并后专业的名称是核心工作内容,吸收了很多专家、学者参加,并要求科学、规范。这项工作无疑涉及对各有关学科的理解。在参与的专家、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见解乃至较大分歧,也全在意料之中。学术讨论不能强求一致,但体现拓宽培养口径的专业目录,却不能等待不可能有终结的学术讨论而久拖不决。有时是少数服从多数,有时是必要的妥协,有时是大家都没有多大把握的从权处理,有时也难免有行政领导的干预,等等。专业目录本身,就其总体而言,的确体现了我国现有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思想,但是,又绝不应把它看做是对学科建设中种种问题的最后“学术”裁定。

比如:

——专业目录定名为“金融学”,是否意味着在现在已有的有关金融各学科(如《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银行管理》、《金融市场》、《投资学》……)之外必须新立一门“金融学”?

——“金融学”与“货币银行学”孰大孰小;前者是否应是后者的高一层次的发展?

——把“金融学”视为“应用经济学”是否合适,它是否



应该是，或者至少部分应该是“理论经济学”？

——“保险学”是否应是“金融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金融学”这个名称，如果译为“Finance Economics”，与国外的学科划分如何衔接？

如此等等，要是用“专业目录”的规定作讨论的“理论”根据，显然是本末倒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同样显然的是，作为推进解决这些问题主力的金融学界，也不会讨论几次就能取得一致意见。倒毋宁说，长期存在分歧完全是正常现象。首先，金融这个词就很令人伤脑筋。

(二)“金融”的“金”和“融”这两个字，古已有之。古往今来的辞书，分别对每一个字，均说明见于什么典籍，是什么意思。至于把这两个字组成一个词，虽然也载于当今的辞书，但释义中均无古籍的出处。这个词始于何朝何代，更无解说。

估计，作为一个词，是日本明治维新之际，旅日学者带回中国的。那时，日本人吸收西方文明，在经济学方面也翻译了大量词汇。我们经济学中的很多词汇，就是那时直接把日语中的“汉字”拿来并沿用至今。比如“银行”这个词号就是来自日本。听日本学者说，最初对于如何翻译 Bank 这个字还曾有过争论——是译为“银行”好，还是译为“金行”好？

使用了一个多世纪，金融这个词——以及拿来的类似的词——已经像是土生土长的了。问题是，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中，对这个词事实上是怎么使用的。

(三)从我们这次会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家对金融这个范畴的界定并不一致。通常情况下，在讨论与这个范畴有关的问题时，并不是先给它下定义。但就实际用法分析，事实上各有各的看法。在我们国家，对这个范畴大体有四种理解：



(1) 认为现代金融的核心，包括的是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市场的有效性、风险、收益和定价等经济过程。持这种看法的，一是理工学界对金融有兴趣并已投入研究的学者。这是因为他们进入金融研究天地的切入点基本是在这里。可能他们并没有给金融下定义，也不一定强烈反对扩大金融范畴的外延，只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就是这么理解。至于原本是金融、经济学界的人士，特别关心证券市场、资产选择和公司筹资的，也往往持有这种看法。在国外，这也是对 Finance 的一种重要的诠释。

(2) 认为金融问题的核心是货币、资金、资本的融通，内涵基本与“信用”相当。所以金融所涵盖的是融通的活动、融通的机构、融通的市场等有关方面。货币与金融联系紧密，但金融范畴不包括货币。金融界、经济界中持这种见解的很多。其中，有的是经过研究后的见解，大多则可以说是习惯的思路。

(3) 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和信用紧密联结，以致时时处于一而二、二而一状态所形成的范畴，从而货币的现实运动也包括在金融体系之中。学界持这种见解的是金融理论工作者的一部分。而在金融学界之外，大多对这种看法同同一种看法的区分不甚关心，通常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至于金融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如果说管金融的任务只是管资金融通而不包括管货币供给，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从中似乎可以看到长期实际生活对这种观念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日本银行月刊》各期的目录中，日文的“金融”对应的英文是“Money and Banking”。至于旁的日本人倒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理解。

(4) 认为金融 \equiv Finance。持这样看法的——可能未深入



思索，也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极其普遍。如果简单肯定“恒等”绝对成立，似有问题。在传统的外国权威辞书中，Finance 的含义是很广泛的。假如我们用外国这类辞书诠释洋文 Finance 的外延去界定金融，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国家财政、企业理财等就要被金融所涵盖。但是，不准两者简单互译，有些地方就行不通。如 Financial Mathematics 不译为“金融数学”如何译？而且，西方人对这个词的使用也不全同他们的权威辞书一样。如洋人说的 Financial Market 同我们说的“金融市场”倒不像有多大出入。在（1）点还指出，国外有人对 Finance 的诠释即主要聚焦于金融市场。

看来，对金融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见解不同，是客观存在，并有其客观原因。期望“定于一尊”并不现实。

（四）不统一对“金融”的界定，如何建设金融学科？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矛盾、实质性的难题。

就金融学界来说，对金融的认识大多属于上列第（2）、（3）两条所述的见解，但也不尽然。在讨论界说、定义时，原则的分歧似乎难以调和，但真正建立起学科来，能有多大的区分，还是颇有疑问的。分别确定有关学科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设计各学科所包括的内容可能有不同划分方法，章节的排列也会各有特点。不过，如果把有关学科的内容综合起来考较，可以预测，至少在近些年内，难以有较大的原则出入。原因并不复杂，我们这些人今天所掌握的烹饪原料和作料，老实说，难分轩輊。掌勺的手艺，源流一家，也无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怕的不是做出口味确有不同菜肴，而是怕菜名虽很花哨，口味仍然雷同。

所以，对于学科建设，完全应该鼓励由志同道合者分别进行，不会“天下大乱”。至于范畴界说、体系设计，在学科建



设过程中自然避免不了，也应思考、探索、研讨，像这次会议这样。但大多数的主要精力似不应陷入这个方面。

在这方面有些经验教训。50年代初，财政学的“对象”曾吸吮了不少财政学者很大的精力。问题是出在一个俄文的词“финансы”。它与英文的词 Finance 是对等的，当时翻译——至少是翻“财政学”的翻译——把它译为“财政”。于是财政学的对象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国家财政”或“Public Finance”的学科对象，而是 Finance 这个极为广袤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讨论是用极其抽象的概念进行的，在少数财政学者的圈子之外，其他各经济学科的学者很难弄懂。与之同时，词意含混的金融，倒没有人就其本身费力推敲。当时采用的学科名称是从前苏联引入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可能货币和银行的丰富理论内容已使人目不暇接，而无暇顾及及其他极多学科投入极大精力讨论却极难讨论出个最终论断的学科“对象”。这对于我们金融界的学者来说，恐怕应视为幸事。

（五）与金融范畴本身如何诠释一样，前面提到的那些有关金融学科的问题，长期存在不同看法，也同样不是我们建设金融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要真的把主要精力用在“统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学科建设倒会被推迟。

当然，在今天，绝不排斥金融学界少数有志于研究学科定位的“专业户”从事这类问题的研究。

（六）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学科内容的建设，也就是迫切需要增加烹饪原料和作料的规格、品种并提高对其质量的要求。这实质上也是个队伍建设的问题。

现有金融学科的框架和水平，是建国以来老的金融教师和研究人員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員共同构建并努力达成的。要是加以概括，可否视为以下这几部分学



问的叠加。

(1) 50年代初开始的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到苏联留学）的功底和老留学生30年代、40年代到50年代初在国外学西方经济学的功底。

(2) 在改革方针路线的指导下，对集中计划体制中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土壤，所独立进行的总结。

(3)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对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和吸收——主要是在国内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的，再加上短期出国访问的收获（遗憾的是，出国攻读学位者回流极少）。

对比改革开放前，应该说金融各学科的建设大步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面对90年代以来飞速变化的形势，以客观要求来衡量，迫切地感到有一大段差距需要我们尽快赶上。

其一，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学得并不理想。比如，马克思对股份公司作了那么多的分析，我们却在股份化的问题上存在这么多的混乱。本质问题是经济理论的功底不扎实。

其二，改革开放开始的一段，对市场经济中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从知之甚少到有所了解，就是大进步。现在，国内外条条渠道接轨，说合作也好，说竞争也好，在金融领域，要求于我们的已不应只限于“有所了解”，而是外国人的理论我们要懂，外国人的操作实务我们要会。懂要真懂，会要真会。一天不真懂真会，我们就实实在在地吃亏一天。

其三，国内金融的变化日新月异，问题层出不穷，必须时时深入观察、了解，而且必须拓宽视野，放在整个经济、政治、社会之中去观察、了解。否则，身在中国也不见得就能把握住中国金融的脉搏。真正懂得中国金融，更是建设中国金融学科的必要条件。



为此，需要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坐得下来，能与实践紧密联系，并具备能及时追踪国外理论和业务运作新动态的高素养的学科建设队伍。显然，我们今天的队伍，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不够的。

所以，关键是应全神贯注进行金融学科内容的建设，全神贯注环绕提高学科内容的队伍建设。任务无疑极其艰巨，但形势所迫，困难再多，也只有这义无反顾的一条路。



金 融

作者解题

“金融”，作为工具书的词条，已写了多次。第一次是为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写的（条目是《金融学》）；第二次是为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写的；第三次是为1998年出版的《中华金融词库》写的（由王松奇同志根据1993年的词条增改初稿，由我定稿）。这是2001年5月之前改写的，应是第四次，是为了重新修订1990年出版的《中国金融百科全书》而改写。框架是《中华金融词库》的词条，但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改写了。

与过去比，主要的增补有两方面：一是针对上世纪末，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上对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来“金融”概念的冲击；二是对世界金融学科发展的理解不断有所提高。

编入《金融——词义、学科、形式、方法及其他》（金融出版社，2001）。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凡是涉及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信用，以**证券交易为操作特征的投资、商业保险**，以及以类似形式进行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



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

——金融覆盖范围、金融学科体系设计、金融专业办学方向

作者解题

本文是应西安交通大学的邀请，为“‘交大—海通’经济论坛”而作，并于2001年5月21日，在首届论坛上讲演。

面对21世纪，金融学科的建设必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金融学界的共识。我所主编的《货币银行学》，1992年初版，使用近十年，必须提高。2000年决定着手编写《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

这本教材的建设，应该立足于中国，吸纳当今世界货币银行学的精髓，总结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设计一个最为合理的内容取舍和篇章安排的框架。这是容易达到共识的。但这时却需要解决一个有些突如其来的特殊问题——什么是“金融”，《货币银行学》是否是金融学科？2000年的访美，曾带着这个问题求教，但收获不大。因为人家那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2000年7月30日，在教育部高教司财经政法和管理处举办的“《中央银行学》课程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我做了以《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为题的讲演。那是以讨论什么是金融为切入点酝酿《金融学》框架设计的开端。随后，用了几



个月的时间，走访兄弟院校，与金融教学同行反复交流切磋，对于金融覆盖范围、金融学科体系设计和金融专业办学方向几个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想法，并同时形成了编写金融学教材的最后框架设计。这次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讲演，应该说是这一段努力的总结。

从这次讲演之后，三年多的时间，在许多教师的合作配合和鼎力支持之下，完成了《金融学》、《金融学（精编版）》和金融学课件的编写。

本文发表在《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第4期。后以计算机文稿的题目《金融学学科建设设想》编入《金融——词义、学科、形式、方法及其他》（金融出版社，2001）。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一）背景

金融学科建设应该如何推进，是近来在金融教研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有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金融学的学科建设曾展开过一段讨论^[1]。当时，对于“金融”涵盖的范围，从而“金融学科”的体系设计，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见解。但如何按各自不同的意向大力着手学科建设好像尚无特别紧迫之感。我当时的看法是：（1）“对金融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见解不同，是客观存在，并有其客观原因。期望‘定于一



尊’并不现实。”(2)大多数人的主要精力似不应陷入范畴界说、学科体系设计的议论之中，“关键是应全神贯注金融学科内容的建设；全神贯注环绕提高学科内容的队伍建设。”

到今天，我的看法依然是这样。然而，近一两年出现了如下一些情况：

——90年代中期以来，从国外商学院学成回国的教研力量迅速增强，同时资本市场在经济领域中的发展态势咄咄逼人。可能是这样的背景，使《新 PALGRAVE (帕氏) 经济学词典》关于 Finance 条目的释义，被相当广泛地看做是对中文“金融”这个词的唯一的学术性的解。从而在中国日常经济生活中习惯视为金融问题而又超出这个释义范围的，如宏观调控中的货币供给运作，是否还是金融范畴圈里的课题竟成了疑问。

——对于讲了多少年的《货币银行学》，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它已走向自己的历史终点，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可以并入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之中。

——诸如“抛弃银行”、“传统银行的没落”等观点流行颇广。似乎有关银行方面的学问已没有多少值得探讨的东西了。

——一些大学的金融专业对于“发展方向”和“课程安排”有些拿不定主意，相当强烈、相当紧迫地酝酿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依然按原来的兼顾宏观调控和银行、证券的方向走，还是把主攻方向定位到像一些美国商学院讲“金融学”的路子——主要研究资本市场的路子——上去^[2]？

如此等等，从理论观点到如何办金融专业都反映出有点超出常规的“动荡不安”。这就不能不使我对于自己在1997年表达的观点“主要精力似不应陷入范畴界说、体系设计的议论之中”作些修正，即还得分点精力对范畴界说作些分辨，并对金



融专业如何办和对金融学科体系如何设计花些精力作些讨论^[3]。

（二）什么是金融？

——“金融”与“FINANCE”

什么是金融，如果要求的是约略指一指金融涵盖的范围，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这个不像是大问题的问题，在近年来却成了需要花些精力予以分辨的问题^[4]。

1. 中文“金融”这个词所涵盖的范围

请注意，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由中国字的“金”与“融”组成的“金融”这个词汇。

①我国日常经济生活中所使用的金融口径：

多年来，在党政部门、在实际经济部门、在不是钻研金融概念的经济学界、在土生土长讲金融的教学界，“金融”所指的范围大体包括：与物价有紧密联系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保险系统，以及通常以国际金融概括的这诸多方面在国际之间的存在，等等。

这样的用法并不是始于采用了某种理论界定，毋宁说是根本没有理睬什么理论界定而自然而然形成的。或者说，如此理解金融所覆盖范围的，绝大多数人恐怕从未把金融覆盖的范围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

②可是现在还有与之并行的口径：

那就是：“金融”——是指有价证券及其衍生物的市场，



指资本市场。

持有这样用法的主要是：80年代，即开始关注金融、研究金融的一些中老年理工学者；90年代中期起，在国外学成回国的开始讲现代“金融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获取这方面知识的主要来源——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是国外商学院。

相对于上述的日常习惯口径，这样的口径窄得多。为了叙述方便，可以“宽”、“窄”口径加以区分。需要指出，宽口径自然形成，边界不可能十分清楚。窄口径来源于国外，国外的有关用法也有出入，所以也不是刀切斧砍那样划一。

③于是同一个“金融”却同时存在两个口径：

宽口径，即日常习以为常的口径，使用的人数极多；窄口径，即只将金融覆盖资本市场的口径，使用的范围限于学界，人数较少，但学识的层次却极高。

持有窄口径用法的，对于上述的宽口径，部分人士承认：在自己的“金融”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被更多的人视之为“金融”的领域，可称之为传统领域或主流领域，应该解决彼此之间的打通的问题。另有不少人士认为，上述的日常口径，或只不过是政府的习惯用法，进入不了理论范围；或是认为已是过时的用法，将来必将被取代；或是认为不能与国际接轨，反映了中国的落后经济现实，等等。也有的人士几乎不怎么关心在自己的“金融”之外还另有疆域。

同样，持有宽口径的人士之中，也有人不知道还有一种窄口径，或虽然知道却只是觉得难以理解。

问题出在哪里？持宽口径者说，中国从来就是这么用。但这个“从来”的年月有多么久远？持窄口径者说，“金融”就是西文的 Finance，Finance 即指 Financial Market, Capital



Market。

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1）金融这个词，在中国，始于何年何月，是怎么讲解的；（2）洋人到底是怎样使用 Finance 的。

2. “金融”这个词并非古已有之

“金融”是由中国字组成的词，但它并非古已有之。古有“金”，有“融”，但未见“金融”连在一起的词。《康熙字典》以及在它之前的工具书均无“金”与“融”连用的词，可以说明这个判断。

连起来的“金融”始于何时，无确切考证。是否直接译自 Finance？无任何证明。最大可能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那一阶段，有许多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就是从日本引进的——直接把日语翻译西文的汉字搬到中国来。是否如此，也需考证。

最早列入“金融”条目的工具书是：1908 年开始编纂、1915 年初版的《辞源》和 1905 年即已酝酿编纂、1937 年开始刊行的《辞海》。

《辞源》（1937 年普及本第 11 版）金融条的释文是：“今谓金钱之融通状态曰金融。旧称银根。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曰金融机构。《通鉴长篇》：‘公家之费，敷于民间者，谓之圆融。’义于金融为近。”建国后的《辞源》修订版，可能是由于定位于“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删去了这一词条。

《辞海》1936 年版金融条的释文是“(monetary circulation) 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金融市场利率之升降，与普通市场物价之涨落，同一原理，俱视供求之关系而定。即供给少需要多，则利率上腾，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紧迫，亦曰银根短绌；供给多需要少，则利率下降，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缓



慢，亦曰银根松动。”该书 60 年代之后的表述有较大的改变，下面再说。

始于近百年前编纂的《辞源》、《辞海》编入金融条目，说明这个词的使用，在 20 世纪初以前，至少已有数十年的经历，并已相当定型。《辞海》注以英文，显示系来源于海外之词^[5]。

经过一百多年，用来用去，已像是土生土长的概念。但其内涵和外延长期是不怎么清楚的。比如建国初期常讲“金融物价”：“物价”指什么，大家清楚；“金融”指什么，没有专门解释过。进入计划经济阶段，金融这个词日常已不怎么使用。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它才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

《辞源》、《辞海》这两本辞书，就其始刊时的释文来看，都仅指通过信用中介机构的货币资金融通。《辞海》20 世纪 60 年代的试用本和 1979 年首次公开发行人版的释文修订为：“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主要通过银行的各种业务来实现。如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国内外汇兑的往来，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贴现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活动等，均属于金融的范畴。”这一变化了的概括，可以说与今天日常所使用的口径基本一致。

简言之，“金融”之词并非古已有之，虽然如此，却也至少使用了一个多世纪，并形成了今天宽口径的用法。

3. 洋人对 Finance 的用法

如果简单概括；用法也不只限于一种。

①Oxford、Webster's 这类字典和一些百科全书对 Finance 的解释是：monetary affairs, management of money, Pecunia-



ry resources……；前面加 public，是指财政，加 company、加 corporation、加 business，是指公司财务，等等^[6]。简言之，凡是与钱有关系的事情都可用 Finance 这个词。

显然，这属于“宽”口径。但其宽度却是我们宽口径的金融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在洋人的宽口径中，不仅包括我们宽口径的金融，而且还包括国家财政、企业财务（公司理财）和个人货币收支。而财政、财务和个人收支，在我们这里是明确不能算作金融一部分的。此外，洋人的 Finance 也有“Finance 学”或 Financial Economics 的含意^[7]。

②PALGRAVE 新经济学词典对 Finance 的解释则是：The primary focus of finance is the work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supply and the pricing of capital assets. 中文译本是“金融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8]的运行机制，以及资本资产的供给和价格确定”。

显然，这属于窄口径；中文金融的窄口径即源于此。

③但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口径，如：

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the granting of credit, 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 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 (1986,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这里圈定的范围，与我们的宽口径相当。

此外，还可举两个例子：

一是联合国统计署有 Financial and Related Service 这一项统计口径，粗略地说，包括：

——金融中介服务，包括中央银行的服务、存贷业务和银行中介业务的服务；

——投资银行服务；

——非强制性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再保险服务；



——房地产、租借、租赁等服务；

——为以上各项服务的种种金融中介的服务。

二是美国 1999 年通过的“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其 Financial Services 规范的范围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储蓄协会、住宅贷款协会，以及经纪人等中介服务。

这两个例子中 Finance 的用法也类似我们的宽口径，或至少不是最窄的窄口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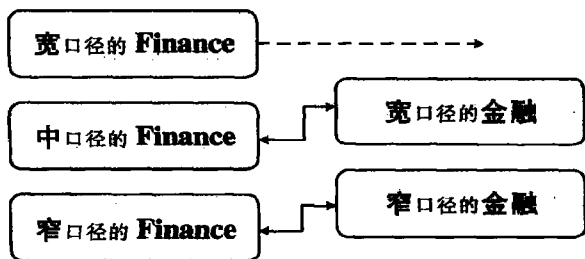
④据美国某些人士解释，在他们的经济界，现在习惯的用法是：泛泛地，按古典的解释使用；在经济领域，单用 Finance，即指资本市场。如有的美联储人士说，我们只管 Money，不管 Finance——这里的 Finance，即毫无疑问地是指资本市场，特别是指股市行情。不过，这样的解释可能也概括不了在美国经济界如何使用 Finance 的全面情况。如美国学者讲演、写文章，提到 Finance 时，也常常讲有关银行、保险之类的问题。

如果说“金融”一词来自日本，那看看日本怎么用。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报告，前些年与“金融（日文的汉字）”对应的是 Money and Banking，这些年改为 Money, Banking and Securities。日本中央银行这样用，其他日本人则不一定都这样用。

⑤概而言之，洋人对 Finance 也并非一种用法。大体有三：最宽的、最窄的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介于两者中间的，事实上也存有颇大的区别。

4. 把“金融”与 Finance 相比较

把中文的“金融”与西文的 Finance 相比较，可列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要强求确定“金融”与“Finance”的一一对应关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5. 翻译的苦衷

翻译过来的词与原文难以一一对应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中文词“金融”与西文 Finance 之间。

从 19 世纪以来，我们是一个引进先进文明的国度。但又不同于有些并无悠久传统的较小国度，只要简单拿来填补空白，问题就解决了。既要引进，又有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传统，所以在概念、范畴方面如何通过翻译沟通中外，就存在极大的理论问题。

音译是一种方法。历史上，译佛经就是音译。日本的外来语，有其优越之处。我们也有“洋泾浜”，但“洋泾浜”的发展恐怕不太可能赶上日本的外来语。或许可以这样看，与其用汉字音译，还不如直接用洋文。不管是汉字音译还是直接用洋文，都存在传播较难的问题。比如，不易与原有的文化积存沟通。

意译，如何选择对应的词汇不容易。如鲁迅先生曾讽刺地把 Milky Way 译为“牛奶路”。但更困难的是不存在完全对应的词汇。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有许多就是这种情况。于是，不得不造一个新词（包括过去从日文引进）。这个过程，



对翻译人士是一个创造过程，功莫大焉。但一方面是外来的新概念、外来的新范畴，一方面是本国原有文字的新组合，即使译得煞费苦心，也往往难以精确、全面地体现洋文的内涵。简言之，就是在最初翻译之际，就难以实现内涵与外延的全然对应。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洋文本身的内涵会有所演进。如把 Finance 限定用于资本市场，在西方也是近些年在特定圈子里的事情。作为译文的中文词，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同样会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强化或弱化某方面的含义。这就使译文和原文更难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中文的词“金融”与西文的词 Finance 就是存在着这种始终难于全然对应状况的典型例证。于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度中，常常由译文引起争论甚或混乱。

通过争论以弄清洋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可以对应的部分和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对应的部分——对于学术和商务等等交流是必要的。但期望重建一一对应关系，至少在全球实现“大同世”之前，只能是虚耗精力。仍以“金融”与 Finance 为例，显然，我们不能为了对应而要求洋人要按中国人使用“金融”的口径使用 Finance；同样，我们在今天也同样无法叫中国人完全按洋人对 Finance 的理解来使用“金融”概念。

6. 不同用法并存，如何办？

只就中文词“金融”本身来说，如上指出，事实上是宽口径和窄口径两种主要用法并存。用法不同，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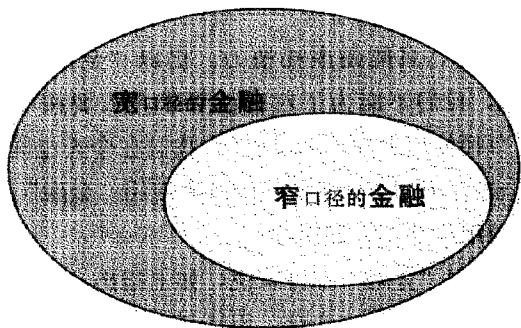
一个选择是争个你死我活。但结果总会是想你死我活而不可得。一方面说，对于金融，中国人都这么理解；另一方面说，我也是中国人，就不那么理解。一方面说，与国际接轨，金融只应这么用；另一方面说，洋人对 Finance 的用法就有不同口径，应往哪一条路上接轨？有的人士说，从发展前途看，



资本市场必将成为主体，因而“金融——Finance”应指这一领域；有的人士说，商业银行的作用今天依然极大，今后是否必将削弱，谁能定论；也有的人士说，银行、货币如果趋于泯灭，大概 Finance 也不能独自保存下来。如此等等。

贾宝玉说过一句话：“任凭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这用来表达爱情的专一极为深沉、真挚。如搬到学术研究领域，恐怕就会失于偏颇。

另一种选择是“和平共处”。既然并存不同用法，是客观事实，难以存此废彼，难于定于一尊，那就必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同的用法。其实，中国人对金融涵盖范围的宽窄两种口径并不是完全的排斥关系：宽口径认为凡属于自己范围内的都是金融，而窄口径是自己的一部分；窄口径认为自己是金融，而不怎么愿意承认宽口径中不属于自己范围的部分也叫金融。用图可以表示如下：



这是否会乱套？不会！本来就有不同用法，承认已经存在的事实，至少不会更乱。其实，问题本不难解决：讨论问题时，事前交代一下自己所使用的口径，或冷静分析一下对方所使用的口径就可以了。实质性的探讨并不会由于这类问题而受到梗阻。



(三) 关于金融学学科体系的讨论

有金融就有以金融为对象的金融学。只要承认，在中国，事实上人们对金融覆盖范围的口径有宽窄之别，那么同一名号的金融学也必然相应地有宽有窄。

这些年，以“金融学”命名的书籍（基本是教材）极多，但究其内容，则有极大的差别。有的以金融学为名的书实际是多年习用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最近翻译的 S. 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其原名是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9]，实属“正宗”的货币银行学。有的以“金融学”命名的书，其内容基本是讲金融市场的学问。最近翻译的 Z. 博迪和 C. 莫顿的《金融学》，其原名是 *FINANCE*^[10]，可作为代表。而 J. 艾希贝格尔和 I. 哈珀的《金融经济学》，原名 *FINANCIAL ECONOMICS*^[11]，讲的内容却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两个方面并重。如果随现有的书名转，并分别考究“名”与“实”，那很可能陷入迷宫。或许先抽象地作些讨论，可能会比较容易地理出个头绪。

1. 先从宽口径入手

从宽口径分析，金融学包括的内容，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层面和金融理论的微观分析层面。

①宏观分析的层面大体包括：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利率形成与汇率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震荡，名义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国际



金融的制度安排与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

②微观分析的层面大体包括：

——主要从金融市场角度的分析。其内容有金融工具与工具创新，价值评估，风险管理和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这类学问。再进一步概括，可简述为金融领域中的决策学。Z. 博迪就是把他的金融学概括为“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资源的时间配置的学科”，而服务于决策的“金融理论由一系列概念和定量模型组成”。这样的金融决策理论是个人理财、公司理财，乃至一切有理财要求的部门所共同需要的。

——主要从金融中介机构角度的分析。“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机构”、“金融中介”通常混用，是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的总称^[12]，而限于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的银行。关于金融中介机构的分析，其内容中首要的部分是不断推进对金融机构存在根据的理论论证，并由此自然引申出它们的职能和作用及其存在形态的演进趋势；同时分别各个侧面的研究有：种种金融机构的共同特征，金融机构与风险转移，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系统风险和存款保险制度，国家监管与金融机构运作和演进的相互作用，以及分业与混业，等等。如果进一步提炼，其理论所特别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发展趋向和未来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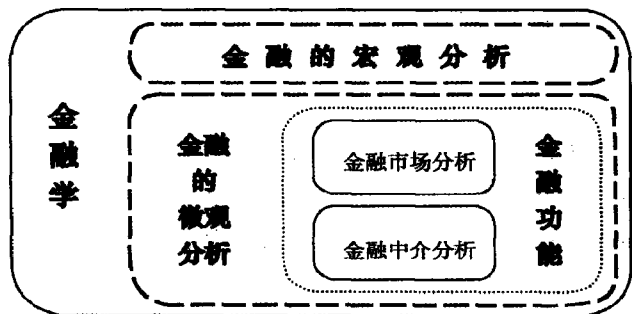
——关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银行资产的证券化等问题的研究，则是揭示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相互渗透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从金融市场角度的分析，还是从金融中介机构角度的分析，都会关注它们之间的交汇区。

——从金融功能角度的分析，也即抽象金融机构的千差万别和不断变化，通过揭示稳定的金融功能来探讨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金融机构的演进规律等。



③多年以来，宽口径金融学科所讲的内容中，事实上，还有一块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都包括不了的，那就是范畴部分，即关于货币、信用、利率乃至金融本身这些范畴的剖析和论证。

可约略图示如下：



2. 窄口径的看法

上面说过，窄口径来源于国外。按照这样的口径，金融的微观分析层面是 Finance，或 Financial Economics，而金融的宏观分析层面则是 Money Economics，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Money 不是 Finance，Money Economics 不是 Financial Economics，这在洋人的文字中是再清楚不过了。在中国用中文说，则成为：“金融”的微观分析层面是“金融”学，或“金融”经济学；至于“金融”的宏观分析层面并不是“金融”经济学，而是“货币”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换言之，金融——日常称之为金融但实际不应称之为金融的金融——的宏观分析层面不属于金融——当然是窄口径金融之金融——的研究范围。概念缠绕，头绪很多，说来几乎近于拗口令。

持窄口径的观点与持宽口径的观点不仅在宏观分析层面是否属于金融学科范围有歧见，而且对上面所列的微观分析层面



的内容是否均有同等资格可以列入 Finance 学之内，似也有疑问。对于国外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太具体。大体的概念，如用我们惯常的用语来表达，那就是金融市场的学问极受重视，从事研究的力量大，Finance（金融学）的桂冠好像专属这个部分；而金融机构的学问受重视的程度似乎有明显的差距，从事研究的队伍也小得多，专论他们的书籍好像还无权把 Finance 这项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在国内，关于金融机构的著述甚多，但大都属于较为具体的经营管理层次；把金融中介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作理论和规律性的研究则更为罕见。

这样，就对学科建设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对金融领域的宏观分析层面如何处理；其二，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学问如何看待。

3. 金融学科要不要包括宏观分析的层面以及货币银行学的命运

的确，上面所列举的有关宏观金融分析的主要内容，从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直到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可以说都是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题目。所以，在金融学科中包括宏观分析层面，肯定会与宏观经济学存在重复、重叠问题。那是否就不应在宏观经济学的旁边有相对独立的金融宏观分析教程了呢？这可以先看看教学生活实际。

到现在为止，是否在宏观经济学之外，还同时有金融宏观分析的教学内容？有，但不是有一门独立的金融宏观分析课，而是包含在许多金融课程之中。其主要部分是包含在货币银行学（或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货币金融学……）之中，而且这个“主要部分”也正是货币银行学的核心、主干。此外，在国际金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等相关课程中也有宏观金融分析的内容。既然金融宏观分析的主要部分构成货币银行学的核心



内容，简单推论，假如，为了避免重复，“不应在宏观经济学的旁边有相对独立的金融宏观分析教程”的论断成立，那么，取消货币银行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金融学科要不要包括宏观分析层面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转化成要不要取消货币银行学课程的论题。

我见到的最早的中文货币银行学教程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13]。50 年代初有李达教授的一本《货币学概论》，以前苏联有关的教程为蓝本，实际是半部货币银行学；从前苏联引进的布列格里教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以及我们以之为蓝本改编的教材，就框架来说，同西方国家的货币银行学没有原则的区别。至于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和我们自己编著的书名各异的货币银行学则是大家熟悉的。

过去只讲政治经济学的年代，经济学以讲生产关系为主，货币银行学是从金融角度讲经济运行机制，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什么“重复”的问题。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加西方经济学，讲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不断加大，于是重复问题提出来了。就内容的大轮廓来对照，的确重复之处极多。但稍作具体分析，还不能作简单重复、基本重复、全然重复之类的判断。比如，讲货币需求，两门课可能讲不出多大差别，但讲到货币供给，粗细、深浅的差别则显然可见；讲均衡，讲均衡模型，货币银行学甚至不如宏观经济学讲得细，而要讲以实现均衡为目标的国家实施干预的货币政策，货币银行学就有较大的展开和深化的余地，等等。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只学宏观经济学还代替不了学习货币银行学。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把金融的宏观分析概称为 Money Economics 并认为不属于 Finance Economics 的见解，是在美国流行的。可是，在美国却没有看到货币银行学明显“衰亡”的



迹象。从上个世纪中期 L. 钱得勒和 S. 哥尔特菲尔特的《货币银行学》^[14]，到上面提到的最近翻译出版的 S. 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先后有多种这方面的教程，并且好的教材是一版再版。同时，在他们那里的经济系和商学院，相当普遍地开设这门课程，好像还有点长盛不衰的味道。

这里恐怕有个“结”需要解一解。洋人的确是说：Money Economics 不属于 Finance Economics，但好像^[15]并没有听到 Money Economics 应被剥夺作为一门独立教程的说法；在洋人那里，是否有取消货币银行学的主张，也不知能否认定。从而，使人有点弄不太清楚，要取消货币银行学的说法到底是来自异国他乡，还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引申？

应该说，货币银行学在这几十年中，无论中外，都是不断调整、增补，有明显的提高。其前进的历程，脉络清晰可见，显示了作为一门教程的生命力。

既然以金融宏观分析为主的货币银行学，其内容难以由宏观经济学取而代之，这也就意味着金融的宏观分析层面虽与宏观经济学的有关部分重复，但作为教程，却并未融入后者之中。其所以有内容难以取代之处，究其学科发展方面的原因，是否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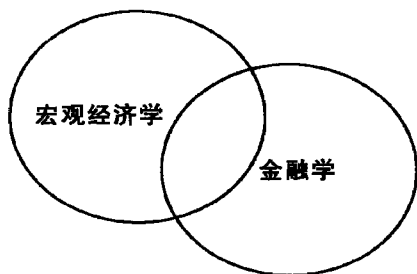
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是对整个经济的宏观分析，其中有关金融的部分，是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考察金融的侧面，而考察金融侧面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把握经济整体。所以，当一位学者把宏观经济学作为主业之际，在通常的情况下，对金融问题的钻研是有其限度的；同时，作为一门教程的宏观经济学，对金融侧面的分析也只能限定在总体框架之内展开，而不能不受限制地扩展和深入。

另一方面，对金融的宏观分析，在其作为金融学科总体一



部分的情况下，是与对金融的微观分析有着直接的紧密联系。业有专攻——专攻金融领域的宏观分析；支撑有力——直接依靠金融微观分析的基础。这就自然而然地使金融宏观分析的学问，就其内容，特别是就其深度，有其在宏观经济学的旁边独立存在的理由。

这样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4. 如何看待对金融市场学问的热和对金融中介机构学问的冷

在金融的微观分析层面，热的是 Finance（金融学）。这门以经济行为主体的金融决策为核心的学问，就其主要内容来看，在国内，多以“金融市场学”、“资本市场学”、“投资学”、“证券学”等名目成书。至于分别就其中的某一方面，如风险管理、资产评估、衍生工具定价等单独讨论的著述和译著，种类繁多，更难一一列举。确实显示了热门学问的气势。至于金融中介机构的学问则相当冷清。在国内，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书籍，就种类、册数来说，或许更多，但就理论研究层次来说，与 Finance（金融学）不处于同等的台阶之上。

这种情况的形成，究其原因，并非偶然。20 世纪的下半叶，资本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后 20 年，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迅速变化的生活现实，给人提出丰富的、焕发



人们研究激情的课题；而实际生活对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则推动了尽快取得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的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使得 Finance（金融学）的建设长足进展，并获得全球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M. 米勒在一篇讲演中提到^[16]，从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金融学，即 Finance，其发展历程，都是与诺贝尔奖挂在一起的。其中，1990 年诺贝尔奖：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W. 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 M-M 定理；1997 年诺贝尔奖：一个被誉为创造了一个全球衍生工具市场的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的期权定价公式。M. 米勒认为有效市场假说也是具有同等意义的理论成就，遗憾的是尚未得到诺贝尔奖的荣誉。这些熠熠生辉的理论光环罩住了人们的视线是不足为奇的。

至于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其中的银行，相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已是极其“古老”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反复提出讨论的问题，时间长的已存在一个多世纪，好像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推敲。同时，金融市场的研究，同微观经济行为为主体的利益关系极为直接，如可直接指导理财；而金融机构的研究，虽然最终也关系到每个微观经济行为为主体的利益，如风险问题，但人们往往直觉认为这关系全社会而非直接关系当事人。这也使人们对两者的关注程度有所差异，就与炒股的股民和存款的储户两者心态迥异的情况类似。

与之同时，金融中介机构还不时受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的理论质疑——假如金融中介机构失去存在的前景，那么研究金融中介机构的理论也就有点唱挽歌的味道了。曾有这样一类推理：在市场对于有效配置资源是足够完善的情况下，当经济行为主体会自己构造投资组合时……金融中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



价值。幸好是前提条件在可见的将来几乎难以形成，所以，这样的推论影响不大。近些年，有关商业银行的一些论断，如“必须抛弃银行”，如“传统银行的衰落”等^[17]，却有颇大的影响。关于金融市场已逐步取代商业银行在金融领域领导地位的实证研究也是强有力的配合。这是质疑金融中介存在的极强“攻势”。但也许是攻势过强，却成了对于金融中介机构研究的推动力。

我曾提出这样的问题，环绕金融中介的理论研究，就世界角度看，近几十年这方面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建树是什么？应该说，由于对于国外有关金融中介的理论研究情况把握不清，问题提得十分唐突^[18]。近几个月来，同行提供的信息，帮助我对这一领域作了一些了解。虽然仍旧知之甚浅，但大体的印象是：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内容同样丰富，而且极有深度。用以思考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会提高一个层次。只是金融中介机构的理论不像金融市场理论，缺乏熠熠生辉的诺贝尔光环，从而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有点遗憾。

5. 金融学科体系设计的几个问题

如果可以接受对如上两个问题的分析，那么，宽口径金融学科体系（并不排斥窄口径金融学）所涵盖的内容大体成立。现在则需进一步具体讨论课程问题。

①要不要建设一门以宽口径金融为对象的《金融学》？

应该说，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门包罗万象的《金融学》。比较接近的是以金融宏观分析为主的货币银行学。前面曾指出，金融的宏观分析构成其核心内容、主干内容。但除此之外，还有如下多方面的内容：

——与金融有关的经济范畴；



- 金融领域的常识；
- 金融的微观理论；
- 也还有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学问，等等。

是否可以考虑将这门学问沿两个方向推进：

一是强化其核心部分，即金融的宏观理论为主，微观理论为辅，注重宏观、微观理论的结合。以之作为金融学科体系中的主干，作为深入钻研金融奥秘的主阶。

二是把货币银行学发展为金融学科的“杂货铺”，即要面面俱到，供一般学习金融问题之用，起读一本书知金融天下大事之效。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深度，如特别要讲清金融的灵魂所在。这样的教程沿用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之名也可，称金融学、泛金融学、广义金融学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这两个方向的努力应并行不悖。如果是这样，建立“包罗万象”金融学的要求似并不急迫。

②要不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宏观金融学”？

目前，尚无金融宏观分析的课程设置。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倒是甚多，但多属学术性论文和专著。不过这些学术成果虽是有用的参考，用作教材却不理想。我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曾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教学，不过也没有涉及这一领域的全部^[19]。也有的同行，从不同切入点从事类似的工作。

是否有必要建立规范的课程并尽快编写出教材？这倒不一定作肯定的回答。其一，在货币银行学之类的教程中已包括相当部分，虽然深度似嫌不够；其二，相关的专题讲座甚多，虽不规范，但作为砌块，积累颇丰，也使金融的宏观分析并无全付阙如之憾。当然，如有志于创建规范的教程，也应获得支持。

③建立一门金融中介机构理论的教程十分必要。

如果说有关金融市场的学问已形成相当成熟的教程并“抢



占”了“金融学”的“域名”，那么，有关金融中介机构的学问好像尚未取得独立存在的空间。自然，在货币银行学里有一点，在各种金融机构的教程中也有一些。只是嫌支离破碎，难以提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比如，国外的研究已深入到揭示类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质的共同规律，而我们的精力却只关注如何考察它们质的差异来寻求分业管理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中国，应该说，真正深入探讨金融中介的理论，有极其现实的意义。所以，创建这门教程极为迫切。可喜的是，现在已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活动^[20]。积极推进，应是金融学科建设的突出任务。

④保险学问题：

在宽口径的概念中，保险属于金融范畴但是高度独立。相应地，保险学按理应属于金融学科体系，但这门学科的建设也同样是高度独立推进的。在设计金融学科体系时，对保险学通常是“存而不论”，——说白了，就是从金融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应该如何推动保险学的建设提不出多少明确的思路。

保险和保险学的高度独立，有其客观的理由。但从金融学科建设的角度，关注保险与整个金融事业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则非常必要。从金融的宏观层面来看，通过保险业务积聚的资金，在西方国家早就占有极大的份额。现在在中国，也急速形成举足轻重之势。从微观层面来看，保险运作进入银行业，而投资、居民储蓄运作也与保险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合、互动的势头不减。所以，近期的目标是否应该是：把这样的发展，分别在各个金融学科中，当然也包括在保险学中，尽可能充分地加以剖析，以便于引导人们的视野更多地扩展到金融领域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面。



⑤关于“金融工程”：

关于金融工程的重要性，已经无须论证——它已是红得不能再红了。好像有一种说法，金融学只有发展到“工程”阶段，才成为“科学”。这样的判断恐怕有些过头：社会科学（经济科学也在其中）的各门学科，没有挂上“工程”的不在少数，如果都够不上“科学”，社会科学算不算“科学”也就大成疑问了。

金融工程的确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不过对于它在金融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却应有恰如其分的了解。这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一门学科，直接的理论基础是窄口径的金融学；把它视为微观金融学，甚或视为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恐怕是出于对之不甚了解的缘故^[21]。

这门学问形成的时间不久。在西方国家，也不是所有有关院校都能开出这门课。没有疑问，我们应该重视，应该尽快掌握。

也许还要补充一句。技术层面的学问，绝不是“不重要”的学问。没有这个层面，就不称其为完整的金融学科体系。而且，从技术层面还往往提出最高层次的理论大问题。比如从支付清算体系在网络基础上的迅速发展，有人已在思考货币存在的前景。

⑥经营管理层次的课程：

我们现有的经营管理层次的课程极多，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投资银行经营管理，以及信托、租赁，等等。在讲经营管理时，大多也讲一些有关的微观金融理论甚至宏观金融理论。这类课程要求的是能及时反映国内外的情况，特别是金融创新的进展。能在介绍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讲出些道理，是提高质量的要点。



6. 简单的概括

把以上所述加以归纳，金融学科——宽口径的金融学——体系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宽口径的金融学。

第二个层次：宏观金融分析、微观金融分析。

宽口径的金融学和宏观金融分析均无现成的规范教程。货币银行学的内容兼跨两个方面，不过，或不能覆盖全面，或深度不够。

微观金融分析，大分之，有市场与机构两个方面。也有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研究的。商业银行学、信托学、保险学等实际上属于金融机构微观分析的个论。现在感到特别缺的是从理论上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综合研究。

第三个层次：是技术层面和经营管理层面。现有的课程虽然极多，但有缺口；同时，提高质量的任务也不轻。

以上关于学科体系的讨论，给出的是一个大的轮廓和一些考虑、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思路。无疑，显得相当笼统，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但即使再作努力，也很难画出一幅类如树状结构的学科体系的平面图。

7. 一点体会——学科边界模糊和内容交叉不可避免

金融是一个复杂大系统；金融学科，作为金融的理论反映，无疑也必然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在一个这样的系统中，要想按照一个或一组标准清楚无误、毫不含混地分清层次以及逐层的子系统，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从我开始从事金融教学以来，每次讨论学科建设，大家集中精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划清彼此所讲授的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解决“重复”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一次曾经求得过满意的解。也正是在这样不断反复的过程中，也不断形



成并不断加深了这样的认识：金融学科体系之内的各门学问、各门教程，分别来看，边界都是模糊的——勾画一个约略的轮廓尚可，想求得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则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就彼此的关系来看，内容交叉，难解难分之处颇多，硬要分清你我，往往也只是从权的暂时处理而非遵循科学的原则，从而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贯彻。简言之，毋宁说学科边界模糊、内容交叉，应属正常现象。当然，这并非一般的否定界定学科对象和建立协调的学科体系的必要，而是说，应该在努力认识并充分尊重复杂客观的基础上，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来实现这样的目标。

（四）如何把专业办出“特色”？

与金融涵盖范围和金融学科体系设计受到冲击一样，高等学府里的金融学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应该努力朝哪个方向发展，也成了有关院长、系主任思考的重点课题：怎么办有前途；怎么办，才能在兄弟专业之中有特色、居前列。

在学生方面，不少人认为“学银行”没前途，要求“学资本市场”。也不时听到这样的主张：建议把专业的主攻方向定为金融工程，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上到现代金融学的层次。对这类问题应该如何判断，从前面的分析中已可得到部分答案：特色、前列，绝不限于“资本市场”，也绝不限于“金融工程”；金融领域自有广阔天地。

但就教学组织领导方面来说，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突出的就是：如何妥善处理学科建设与学生教学内容安排之间的关系。



任一院校的教师队伍不可能在金融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均可保持强项地位。所以，各院校在学科建设上，无疑不应分散力量，全面推进；而应施展自己之所长，或宏观分析，或微观分析，或市场，或机构，或工程，或管理，或国内改革，或国际秩序……重点突破，力争在学科建设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居于前列。也只有在各院校的金融专业从不同角度为金融学科的建设作出各具特色的贡献的基础上，才会有金融学科建设总体的繁花似锦春满园。

然而，对学生的教学安排却不宜过分偏颇；不应是教师专长什么就给学生教什么。

——本科“金融学”专业，应该使学生了解我国习惯采用的宽口径金融的概貌，把握宽口径金融学的大体内容。这至少在绝大多数院校中，应是对开设这个专业的普遍要求。

在当今时代，大学本科仍属于打基础的教学阶段。专业口径不宜过窄。把“金融”设为专业，恐怕已经是不能再窄的专业口径下限。本科阶段，在过窄的口径上定型，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

当然，在满足“普遍要求”下限的基础上，则应鼓励各院校特长的发挥。

——研究生的“金融学”专业，其硕士生阶段的课程计划各院校必然会有所不同，但也应考虑使学生了解我国习惯采用的宽口径金融的概貌和把握宽口径金融学的大体内容。在吸收大量非金融专业本科生的情况下，这是相当必要的。至于论文选题方向，那应根据指导教师的特长，不存在划一的要求。

这就存在教师队伍对教学内容难以面面掌握而学生所应掌握的教学内容却要求照顾全面的矛盾。这是留给院长、系主任解决，而且必须予以妥善解决的课题。



以上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特殊情况，自应另作具体讨论。

【注释】

[1] 讨论的内容集中反映在曾康林和徐永健主编的《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一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之中。

[2] 参看我2001年初发表在《金融时报》（1月13日）和《经济导刊》（2期）的文章《从银行不被看好谈起》。

[3] 为此，从2000年，特别是下半年开始，相继访问了几所兄弟大学的金融院系，座谈、讲演并形成了几篇文章：《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9期）；《由讨论“金融”与“金融学”引出的“方法论”思考》（《经济评论》）；《从银行不被看好谈起》（《金融时报》2001年1月13日的理论周刊，刊载时对原稿略有删节；《经济导刊》2001年2期）。

[4] 本节的内容基本来自《由讨论“金融”与“金融学”引出的“方法论”思考》一文。

[5] 注以 *monetary circulation*，在当时，恐怕也不恰当。

[6] 这里引述一些材料：

(1) *Monetary affairs* (1989, *The New Lexicon Webster's Dictionary*; 1960, *Funk & Wagnalls New Standard Dictionary*).

Management of revenue (1978, *The New Oxford Illustrated Dictionary*).

Management of public or company revenue (1989, *The New Lexicon Webster's Dictionary*).

The management, of money esp. public money (1995,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2) *Pecuniary resources* (1989, *The New Lexicon Webster's Dictionary*).

The money resources, income, etc. of a nation, organization, or person (1996,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Pecuniary resources of sovereign, state, company, or person (1978, *The*



New Oxford Illustrated Dictionary).

The pecuniary affairs or resources of a state, company, or individual (1971,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The money available to a person, company or country (1995,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3) The obtaining of funds or capital (1971,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Finance is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funds for economic activities (1985, *Encyclopedic Americana*).

The money used or needed to support an activity, project etc. (1995,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7]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re concentrated in specialized fields, each of which constitutes an income-making endeavor. These financial specialties include—among others—banking, consumer finance, business or corporation 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public (governmental) finance (1985, *Encyclopedic Americana*).

The science of the profitable management of money and of monetary affairs (1960, *Funk & Wagnalls New Standard Dictionary*).

The managing or science of managing money matters, credit, etc. (1996,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8] 这里说的金融市场是指资本市场。

[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1]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12] 我们这里, 对“中介机构”有一种狭义的使用法: 即仅指从事会计事务、资产评估这类中介服务的机构。

[13] 一本是1930年黎明书局初版的《货币银行学》, 著者是朱彬元。在这本书的“自序一”里, 有1923年在清华大学开“货币银行学讲席”的记载。再一本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货币银行原理》。这是美国一本教材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 第三版的译本; 第一版是1927年出



版的。

[14]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据该书1977年第7版的译版。

[15] 本文在说明国外的情况时,一再使用“似乎”、“好像”这类字眼。这确是因为了解的不够全面、不具有十足的把握。在我们这里,经常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如说“外国”如何如何,其实依据的只是从“美国”得来的材料,说“美国”如何如何,其实依据的只是与某些美国人、与美国学界的某一部分在有限接触的过程中所了解的资料,等等。依据类似的介绍,实难作出严谨的判断。在生活中,就是在国外居住过几年,要不是特别留心、专门调查,也不见得就能准确全面地掌握所不熟悉的某些专业性的情况。

[16] 译文见《经济导刊》,2000(2)。

[17] 我的《从银行不被看好谈起》一文就是辨析这个问题的。

[18] 见我的《从银行不被看好谈起》一文。在同一段中,我特别肯定了在上世纪30年代对货币创造理论的透彻论证。可是国外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者对它的评价并不特别高。的确,从微观角度看,它只解决了扩大授信数量界限的模型,而对中介机构来说,同等重要的问题还有许多。可是,从宏观角度看,它可以说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关于信用创造争论的最后一个句号,反映了从金属货币过渡到完全信用货币的理论探讨的结束。现在看来,也是联结金融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关键环节。

[19] 教学成果形成《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20]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两本译著:《微观银行学》和上面已经提到的《金融经济学》,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21] 宋逢明教授在多次论述现代金融学架构时,对金融工程这门学科曾有较精确的说明。



金融学·导论

——从《货币银行学》到《金融学》

作者解题

从2000年开始酝酿写作的《金融学》，2003年8月终于出书。这就需要向教师和学生介绍。在继续编写《金融学（精编版）》、学习指导书和课件的同时，数次以《金融学·导论》为题，介绍写作的缘起，遭遇的问题，确定书名的依据，在金融学科体系中本教材的地位，编写思路和结构设计，以及一些值得提醒的问题等。2004年7月是最后的一稿。也许可以说是这次《金融学》编写过程的完结。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 (1) 专业：金融学；
- (2) 课程名称：货币银行学；
- (3) 教材：选用《金融学》。

这里存在一个《货币银行学》演进和取名《金融学》的历程。“导论”要介绍这一历程，但同时要结合介绍：开始学习



本课程之际，需要了解的一些重要问题。

- (1) 演进的历程；
- (2) 为什么取名《金融学》；
- (3) 《金融学》在金融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 (4) 编写思路和结构设计；
- (5) 分别向教师和同学各进一言。

一、演进的历程

(一)《货币银行学》在中国的发展

1. 在西方发达国家，何时开始讲授以《货币银行学》命名的课程，不详。

在中国，至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有这门课程的开设——从西方引进的。

(在 1930 年黎明书局初版的《货币银行学》的“自序一”里，有 1923 年在清华大学开“货币银行学讲席”的记载。)

2.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学科在中国相当活跃，颇有建树：

讲货币制度的改革、讲银行事业的垄断、讲物价和通货膨胀……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以凯恩斯经济理论推进《货币银行学》的建设；苏联则建立了自己的课程体系。

与西方《货币银行学》相对应，苏联有两门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4. 1950年，我们按苏联模式建设两门有关货币银行学的课程：《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同时完全中断了对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引进。

5. 应该说明，苏联课程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那时学科建设的内容，虽说强调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但讲的是商品货币关系的规律，实际有许多基本点是相通的。

6. 1958年之后，我们曾编写出版过《货币信用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把两门课并为一门课，意图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但这一努力，没有坚持下去。

7.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在中断了30年之后，重新引进西方的《货币银行学》。

最早是1980年翻译出版的教材——[美]钱德勒等著的《货币银行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王传纶教授主持翻译）。

8. 这时西方的《货币银行学》，与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已有了极大的变化：

——极大地发展了宏观均衡部分；

——微观部分，特别是金融市场内容，几乎面貌全新。

9. 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变化也反映在教材名称、课程名称上：

Money and Banking→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对于后者，有直译为《货币银行金融市场经济学》的；有译成《货币金融学》的。

（二）建设自己的《货币银行学》

1. 改革开放后不久，《货币银行学》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但教材，本土的、引进的，杂陈于书桌之上。

——“本土”的，内容失之于“旧”；

——翻译的书是外国教授结合外国实际写的，最容易造成的学习结果是：只是慨叹于中国实际落后于书本原理；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

2. 我们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教师，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

那就需要编写出反映这样要求的教材。

这样的目标可能一时达不到；但没有类似的目标，那就只有照抄照搬。

3. 当然，这不仅不排斥而还要积极争取：在中国的讲坛上，请洋教师，面对中国的学生，用外文原本教材，讲授根据外国实际建设的《货币银行学》。

更不反对学成归国的学子用外文原本教材讲授《货币银行学》，而无须勉强结合中国实际。

问题是，无论如何必须记住，我们的使命是在中国的土壤上浇灌中国的花朵。

（三）“10 门核心课”及其招投标

1. 1987 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组织中外教授讨论中国大学财经类专业教学计划，提出了 10 门核心课目录。《货币银行学》是其中的一门。

2. 对这 10 门核心课的建设，教委采取了招投标方式。

当时，对《货币银行学》投标的几份提纲提出各自的设想，反映了那时的思路——意欲摆脱原有框架的桎梏但尚不成熟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中标。



3.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黄达主编的《货币银行学》:

(1) 1992年,作为“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 1999年,经较大修改,并纳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 2000年,纳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系列。

4. 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段期间,讲授金融学科的教师和从事金融问题研究的学者,编写了不少《货币银行学》教材。不论水平高低,大都属“中西”揉合类型,反映着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努力摆脱建国后《货币银行学》模式的总的取向。

(四) 跨世纪背景下的《金融学》建设

1. 面对21世纪,金融学科的建设必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金融学界的共识。

——全世界金融学科的飞速发展;

——我们对金融学科的理解明显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要求相应改变讲法(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日益难以硬性割裂)……

2. 为此,自1997年起,一些设有知名金融专业的高校,相继组织全国性的研讨会,讨论新世纪金融学科建设的方向、重点和规划。

200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邀请兄弟院校金融教学骨干,讨论建设金融学科和重新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指导思想。



会后，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决定着手编写《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

3. 从2000年到2003年，历时3年完成了《金融学》的编写，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4. 为了满足不同教学需要，编写了《金融学（精编版）》，于2004年5月出版。

5. 在我们编写、出版《金融学》的同时，有好几本或命名为《金融学》，或命名为《货币银行学》的教材相继出版。其中，有的属改编，有的属新编，或多或少均有所突破。

这标志，“货币银行学—金融学”这门相当古老的课程正迈进自己新的历程。

二、为什么取名《金融学》

（一）解释中文词“金融”以及要求更名的趋向

1. 一本教材、一门课程，如何定名，是件重要的事。古人云：“名定而实辨。”

但也不是生死攸关，神圣的不得了。比如教材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即使书名旧一点，也属瑕不掩瑜；而内容依旧，书名再亮丽，也并不意味着实际水平的提高。

新教材，其所以取名《金融学》，有其长期酝酿的过程。

2. “金融”，这个由两个中国字“金”与“融”所组成的词，并非古已有之。

“金”与“融”，是两个极其古老的字，自古以来的辞书都分别有：①对字义的详细注释；②列出包括“金”或“融”的所有词组。但“金”与“融”连成一个词——“金融”，却是



直到《康熙字典》为止，均无记载。

最初见“金融”词条的辞书是 20 世纪初的《辞源》和《辞海》。说明这个词至少于 19 世纪已经流行。

3. 从《辞源》、《辞海》的释义看，在 20 世纪之初的三十余年，是把金融理解为通过金融中介的资金融通。

从 20 世纪中叶起，人们谈论金融，更关注其影响物价的货币流通方面；同时也日益以较宽的视角理解这一范畴。

60 年代，《辞海》对金融词条的释义可作代表：“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主要通过银行的各种业务来实现。如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国内外汇兑的往来，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贴现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活动等，均属于金融的范畴。”

4. 反映多年来中国人对金融这一词语的实际使用习惯，可作如下描述性的概括：

金融涵盖的范围大体包括：与物价有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如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概括，通常所理解的金融，就是指由这诸多部分所构成的大系统。

5. 由于货币银行学所讲授的内容与中国人对金融这一词语实际使用所涵盖的范围相当，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编写《货币信用学》和 60 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编写《货币银行学》的时候，都有采用《金融学》名称的建议。

改革开放之后，更一直存在把货币银行学更名为金融学的意见。而且已先后有更名为《金融学》的教材出版。

6. 不仅是教材、课程的名称，专业名称——不论是本科的还是研究生的，多年也一直采用“货币银行”的称谓。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本科、研究生的专业目录已先后更名为金融专业。

7. 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金融系的新编教材采用《金融学》的名称，不过是这门学科在中国环境中长期演进的必然结果。

但有两个插曲却使得这一更名过程带有相当的戏剧性。

（二）插曲之一：“金融”与“FINANCE”

1. 如果说，《货币银行学》更名为《金融学》不过是学科在中国环境中演进的结果，并无多大玄奥之处，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插曲却一度造成了“学术”上的纷扰。

其一，货币银行学不是金融学；

其二，货币银行学不过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无独立存在价值。

2. 《货币银行学》不属于金融学科体系的说法来源于如下的背景：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发展迅速的 Finance（或 Financial Economics）课程以及相关课程（如《金融工程》……）大量引进。

寻找 Finance 的中文对应词——是“金融”，于是 Finance 译为《金融学》。

3. 当前，在美国等国外的商学院里，Finance 课程，是从微观视角讲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有的仅限于讲资本市场。

诸如资产评估、风险度量、风险管理、利率结构、金融资产定价、金融工具创新、资产购并重组等等，从基本概念的论证直至具体的计量模型，就是 Finance 及其相关课程的内容——显然是与货币银行学内容有极大差别的内容。



4.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推导”：

(1) Finance 译为《金融学》，于是《金融学》就是 Finance；

(2) 《货币银行学》讲的不是发达国家 Finance 课程的内容；

(3) 论断：《货币银行学》不是《金融学》，不属于“金融”学科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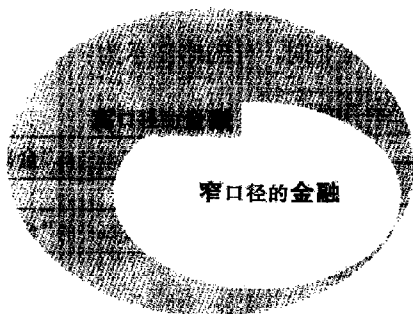
5. 在外国，说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不是 Finance，明白无误。

在中国，说《货币银行学》不属于金融学科体系，则有悖常情，实属费解。

6. 问题出在哪里？忽视了“金融”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所涵盖的范围——这个范围较之 Finance 研究对象的范围要大得多。

Finance 译为金融学——这无可厚非，但决不等于中国人对“金融”这个词必须从此放弃原有的理解和使用习惯，而只能按国外 Finance 学科对象的范围去理解和使用。

7. 但两者的关系也不是“绝对”对抗的。可图示如下：



8. 问题只能这样解决：

中国人原来对金融怎样理解，今后依然应该如是地理



解——“货币银行学”更名为“金融学”不会因为 Finance 译成金融学而不能成立。

当然，由于 Finance 的引进并译成金融学，那么在学术圈子里，对“金融”就同时有了宽窄两个口径的理解和使用。

9. 其实，Finance（许多西方文字的这个词均出于同一字根）的一般含义极其宽泛：

一切与钱有关的事情，都可使用 Finance 这个词。说得具体点，它不仅包括我们习惯讲的金融，而且还包括国家财政（公共财政）、企业财务（公司理财）和个人理财。

相对于这个“宽口径”，Finance 学科则是以“窄口径”使用 Fin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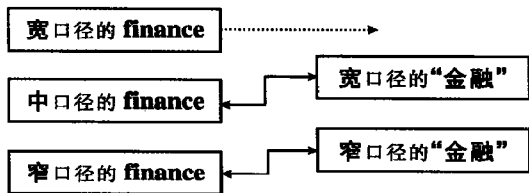
10. 在宽口径和窄口径之间，还有种种用法，其中包括与中文的“金融”大体相当的“中”口径。

简言之，要在中文与西文之间建立如下的恒等关系是过分简单化了：

finance ≡ 金融

在通常的翻译处理中，不得不如此简化。但在处理科学概念问题时，则不能如此简化。

11. 如实比较两个词，可约略图示为：



12.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出现了两种《金融学》：

——从《货币银行学》演化来的《金融学》；

——上个世纪末，从国外商学院引进的，其原名为 Fi-



nance 的《金融学》。

生活是复杂的，只能复杂地对待：只需记住，此金融学非彼金融学；彼金融学非此金融学！同名而实异，异名而实同，并不罕见。

13. 在中国，出现了两种《金融学》，这无可奈何，但如果把从《货币银行学》演化来的《金融学》译成外文 Finance，那倒是无法使外国人弄清楚的。

为此，设计的英文译名为：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Finance。

（三）插曲之二：货币银行学有没有独立存在价值

1. “货币银行学与宏观经济学重复，从而已无独立存在价值”的说法，与“货币银行学不是金融学”的说法，是同时出现的。在 2000 年的下半年风势最劲。

这样的论断能成立吗？回答是否定的！

2. “货币银行学不是金融学”的说法，隐含着这样的意思：金融学（Finance）讲的内容是金融的微观分析，货币银行学不是金融学，所以不应该讲金融的微观分析。

其实，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货币银行学，大部分内容是讲银行业务，讲金融的微观分析；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的西方货币银行学，金融的宏观分析占了统帅地位，但依然有很大分量讲金融的微观分析。

3. 当然，就金融微观分析的深化、模型化等方面来说，货币银行学与 Finance 比较，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果要求刚刚迈进金融领域时概括地把握金融微观分析的全貌，货币银行学的优越性又是 Finance 做不到的。

4. 至于说货币银行学只是重复宏观经济学，也是出于不



了解货币银行学。

比较《货币银行学》与《宏观经济学》：

(1) 就内容的大轮廓来对照，重复之处甚多；

(2) 但具体地，而不是大而化之地比较两者的内容，就可看出，只学宏观经济学代替不了学习货币银行学。

5. 宏观经济学是对经济整体的宏观分析。

当学者把宏观经济学作为主业之际，对金融问题的钻研是有其限度的；作为一门教程的宏观经济学，对金融侧面的分析也只能限定在总体框架之内展开，其内容不能满足金融专业。

6. 货币银行学对金融的宏观分析，是直接、紧密联系对金融的微观分析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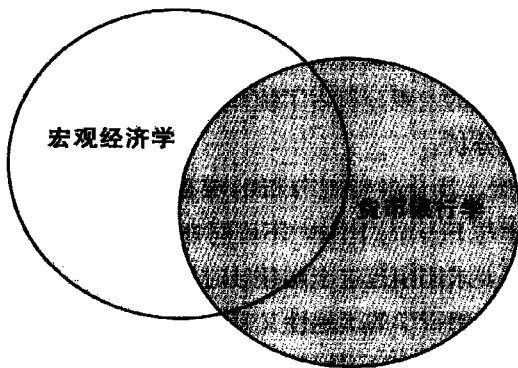
业有专攻——专攻金融领域的宏观分析。

支撑有力——直接依靠金融微观分析的基础。

这就使作为货币银行学的金融宏观分析，较之宏观经济学里面对金融的分析，在接近生活、具体深入等方面，有不可代替之处。

7. 所以货币银行学有在宏观经济学的旁边存在的充分理由。

两者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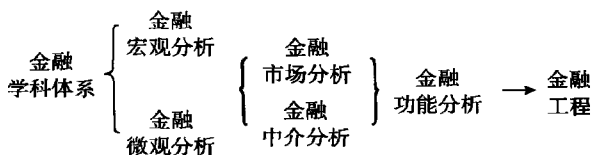
8. 通过这样的论辩，反倒推动了对《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再认识：

《货币银行学》百年的传统是既讲金融的宏观，也讲金融的微观。

今天观察，这样的结构依然是这门课程的优势。

三、《金融学》在金融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一) 金融学科体系



(二) 《金融学》是金融学科体系中的基础课

1. 金融领域，广阔而深邃，通常只能瞄准一两个方向深入。

要想深入一点、几点，也必须对金融的“全局”有必要的、概略的把握；没有足够的宽阔基础作为支撑，只求在狭小的范围深入，进到一定程度就会难以继续。

2. 所谓把握“全局”，就是要求能对金融领域的主要构架，如金融理论与金融知识，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等等之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哪怕是概略的——了解。

3. 《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正是以自己百余年发展所形成的结构，结合宏观、微观，可以对金融领域的体系面貌、经



营管理、运行机制和理论理念，作系统的、基本的介绍和讨论。

4. 由此，可明确两点：

《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是金融学科体系中的基础课；凡是进入金融专业、欲窥金融殿堂奥秘的，首先必须学习这门基础课。

四、编写思路 and 结构设计

(一) 编写思路

1. 力求营造一个小而全、小而精的“金融学小超市”。

从《金融学》本身发展的历程来看，作为金融学科体系的基础课，是使入门者可以约略了解金融的概貌，为继续深入打基础。

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实现这样的使命，营造“小超市”或可较为形象地予以说明。

2. 力求反映金融学科的前沿成就。

金融，属当今世界的热点，前沿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就金融学来说，是要选择基础性的成果。

前沿成果，多是在论争中形成，因而必然存在不同观点。有不同观点，如实介绍，不强加评论。

3. 对于重要理论，力求理出其发展脉络。

只了解现有的论断和模型，而不知道核心思路在千百年前早已存在（不过是以古老的、质朴的形式表达），不可能较深入地把握理论的精神。

文明，是历史的积淀。厚今薄古是对的。但视野中只知



今、不知古，或者以今非古，学到的就是没有厚度、其薄如纸的学问，架不住敲打。

4. 引进理论的宣传、学习，往往造成这样的观念：是落后的中国实际不符合理论模型的设定，使得学来的学问无用武之地！

“西学东渐”已有一百几十年的历程。但其间存在的问题，如食洋不化，妄自菲薄等，今天依然是现实的存在。强调立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实际，非陈词滥调。

5. 教材应该引导学活而非学死。

（二）结构设计

1. 《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有四部分：

- （1）范畴；
- （2）微观分析；
- （3）宏观分析；
- （4）连接微观与宏观的“节”。

2. 范畴，构成第一篇。

这篇讲述金融领域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些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在全部金融学教程中无处不在。

一开始就对它们有个较为准确的理解，是探索金融奥秘的基本准备。

3. 微观分析，构成第二篇。

本篇讲述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相关政策观点。在创新的统领下，金融微观领域的新事务极多，力求提纲挈领地讲述。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对比和相互作用是近年来金融理论发展中受到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专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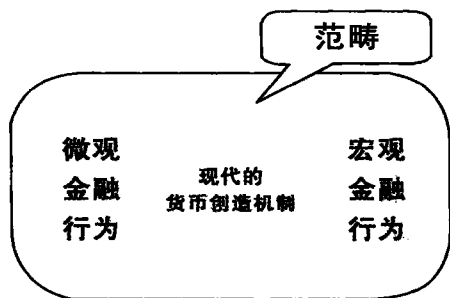
4. 宏观分析，构成第四篇。

本篇讲述货币对内、对外均衡和环绕货币政策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相关政策观点。

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溢出效应推动了金融的国际协调。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颇快，有相应分量的论述。

5. 连接微观与宏观的“节”，是现代的货币创造机制，构成第三篇。

然而，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关于这一机制，大多淹没在讲述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章节之中，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本书不仅专章讨论，而且独立成篇。



6. 金融监管是一个独立问题，早已存在。

近二三十年，金融监管在政府行为中的地位迅速提升，理论探讨和实践不断丰富。同时，金融的国际化则推动了金融的国际监管。故独立成篇。

7. 最后一篇包括：

一些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又难以纳入宏微观分析框架的问题，如金融与发展、金融脆弱性与危机等。

最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名义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从讲货币开始，就立即出现，并伴随教材的全过程。故



列为全书的总结性章节。

五、分别向教师和同学各进一言

学习任何课程，都会有说不完的指导意见。

说者，总怕挂一漏万；听者，句句均属金石良言，却总也抓不住自己最想抓住的能够轻而易举一通百通的诀窍。

过去十年，对我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同学和教师各有一条主要的反映。这里只想对这两条反映做点解说。

（一）学生最集中的反映

1. 这本教材，问题的阐述倒也比较全面，但阅读之后，总觉得不少问题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也可那样理解，找不到明确、精准的答案。如何应对考试？

最典型的例子：什么是货币。整整一节，好几种界说，哪个对？考官要求怎样回答？

这包括：其一，学术问题；其二，如何应对考试的问题。

2. 初学者，希望学到最具权威的唯一定义；几乎教材编写者也力求给出最准确的定义。

然而，我们对金融领域客观对象需要了解的深度，较之瞎子摸象所要解决的任务不知复杂多少倍。事实上，人们通常是从某一视角、某一深度来观察，而不大可能同时观察全面。

所以，任何概念、范畴的界说、定义，都只是一个视角、一个层次的理论概括，从而不可能是唯一的、绝对全面的，从而不可能彻底地“排他”。

3. 对于像货币这样的经济范畴，如果不是从不同视角、



不同深度来认识其性质，就不可能对之有多少可以称之为全面的、基本的理解。

什么是货币？

——最粗略的表述：可用来买东西的 What；稍加扩展：在购买、支付和储蓄中被普遍接受的。

——20世纪以前古典的说法：一般等价物。

——始于凯恩斯：流动性；最具有流动性的。

——东西方理论都讲的社会计算工具或“选票”……

还有种种机智的说法，可以给人以启发。总之，绝不是一两句话就基本使人能够懂得货币。

4. 那么，如何应对考试？应该说有点无能为力。

——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只有“一般等价物”这一个答案；

——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答案是“被普遍接受的购买、支付手段”。

问题在于：为这次考试提供标准答案的是哪类老师？

5. 与其花力气刺探考官的“军情”，不如多视角地界定货币，多掌握些学问。

当然，碰上死守标准答案的评卷人，对多视角的、较为全面的答案也会被扣分！

碰到这种情况，那只能慨叹考试失败的惨烈与悲壮：时也，命也，“非战之罪”！

6. 除去界说、定义，同学又大多关注最具权威的理论模型；而教材编写者也都力求给出最精辟的理论模型论断。

但是，任何理论模型都是从严格的设定条件推导出来的。只要注意了解为模型设定的前提，就可以看出，诸多的约束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是极难同时存在的。只要多多少少地返回现



实，最精辟的理论模型论断就会模糊起来。

7. 概括地说，这涉及“学”的最基本的问题：要学“活”，切忌学“死”。

记下了一条论断，的确长了“学问”。但在此止步而不问几个为什么，那只是一条“死”学问。应付考试也许游刃有余，对于提高真本领却无实质性的帮助。

这是挑战，也是科学探索诱人的魅力。

（二）教师最集中的反映

1. 从十年前举办讲授这本书的前身《货币银行学》的研讨班时，有些老师就抱怨：有的内容不好讲，不会讲，无法面对同学。

比如，当时有的老师，对书中引用了一些古文，就认为有点“与老师为难”。

新的《金融学》出版，必然会有更多的抱怨。

2. 这里有一个三段论的逻辑推导：

大前提：接受货币银行学教学任务的老师必须对内容全面精通，才能面对同学；

小前提：有的老师对内容并非全面精通；

论断：对内容并非全面精通的老师，不能面对同学。

问题出在大前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对货币银行学“全面精通”的老师。其实，在大学中，不论什么课程，没有学生绝对问不倒的老师。

3. 最棒的老师，或许是这样的标准：

——可以较为全面地从总体轮廓上把握货币银行学—金融学；

——对其中的相当部分较为熟悉，有的问题有研究，誉为



“精通”也可；

——对其余问题有所了解，也会有一部分不了解，在授课中要翻阅辞书，请教同行。

4. 所以，教师一定不要给自己戴上“全面精通”的紧箍咒。

开课伊始就应该向同学说清楚：在当今时代，小小一门课的学问，也博大精深，老师有懂有不懂；懂与不懂，均当尽领路之责，望共勉之。

——要自己主动卸包袱！

5. 学生，特别是进入大学不久的学生，也应尽快地打破不符实际的框框：不应该认为各门课的老师，在各该领域，必然应该无所不知。

(三) 两个问题，合二而一，那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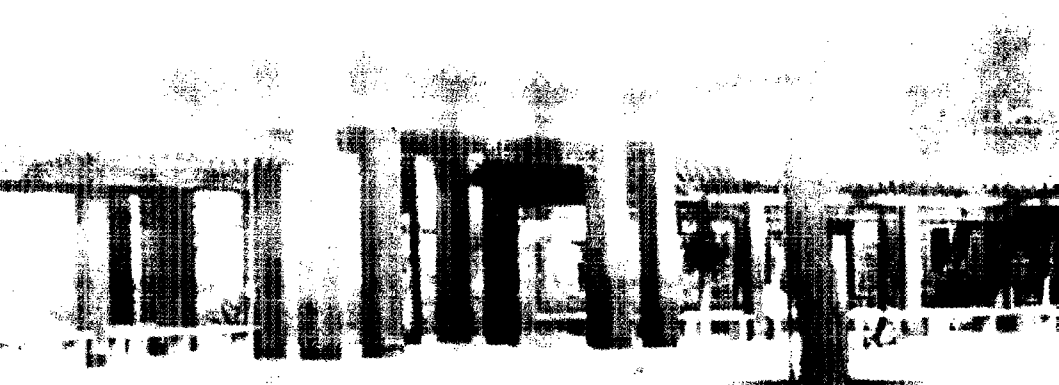
教学相长——

师生共勉，是为至要！

金融天地，浩淼幽深；览胜揭秘，乐何如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要学好
西方现代经济学
也要掌握**







认真学习《资本论》 推进金融理论建设

作者解题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北京市金融学会邀我在纪念会上讲一讲，我作了如题的报告。

在这次讲演中，我比较具体、比较全面、也比较放开地讲了自己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些偏向的看法。同时，讲述始终是结合金融问题进行的。报告录音整理稿刊登在由北京市的财贸学院、财政学会、金融学会、商业经济学会合编的《财贸工作研究》1983 年第 3 期。收入《黄达文集》时，对个别文字、标点和分段做了些技术性的修改。

2006 年 8 月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北京市金融学会让我结合金融战线上的情况，谈一谈学习马克思，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加强我们金融理论的建设问题。力图通过加强金融理论建设来指导我们的金融工作，指导我们金融工作的改革，为实现战略目标而奋斗。



一、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

现在我们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般地要求重复普遍的道理，而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特殊情况，根据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是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个新任务，是不是经过总结过去的教训，就可以认为已经彻底解决了呢？恐怕还不那么简单。比如我们的金融工作，过去搞的是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现在要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过去我国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过去我们农村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象是社队，现在基本上是实行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等等。面对这些，我们工作的原则、方针等等，是不是要相应地改变呢？又比如说，过去我们是财政银行分工把口，各级银行负责人只要守计划、把口子，这两条做到了，就算尽责了。现在很多原来的界限被突破了。过去计划是条条下达，这个贷款指标，那个贷款指标，打油的钱不许打醋，卡住这个就行了。现在则是存贷挂钩、差额包干，有了相当的活动余地。那么，计划怎么个“守”法，口子怎么个“把”法呢？再比如，过去对社队贷款有个办法，现在对个人贷款了，对家庭贷款了，怎么个贷法呢？这些都是涉及规章、制度、原则、方针、办法的大问题，都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

总之，现在需要说明的问题很多，除了大的框子中央有提



法外，一般的还是需要大家研究。特别是由于变化很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今天的做法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做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过去的是不是有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这样的问题必须想通，想不通心里就没底。所以新形势、新任务来了，总是要有重新学习的问题。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世界，提高理论水平，那就能大大前进一步。

我们所以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因为我们过去学得不好。比如说，我们教书的，教马克思主义的，按道理说应该学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部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教马克思主义的，总应该好好读过《资本论》吧。把我们这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凑到一起，调查一下，说你们到底有几个人老老实实地把《资本论》这三卷看过一遍，我估计这一考，要考下去一大半。我们搞实际工作的，要把两千多页的《资本论》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个要求也许过高。但是在实际工作部门中，也有搞理论工作的，也有搞政策研究的，要是考一考这些同志有没有看过《资本论》，我看也要有一大半会被考下去。

我们过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有一种常见方法，即语录法。你看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部头的著作，到处都有引文：马克思说，恩格斯说，列宁说，如何如何。不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都可以引上一两句，外行人觉得这里学问好大。当然，踏踏实实下工夫研究马克思主义，熟悉马克思著作，碰到问题，一翻书就能找出根据的同志还是不少的。但是，说实话，有时却不是这样。有一种工具书，叫做主题索引。如马克思全集主题索引，列宁全集主题索



引等等。如果要写一篇有关银行的文章，这个不难，你把列宁全集主题索引搬来，然后找到银行这一条，就会知道在第××卷、第××页有关于银行的论述。比较用功的，态度比较严肃的，还把这些条条都摆出来看看，翻开原著，看看前言后语，用这一条，对不对。要是马虎一点，选上一条差不多就行了。更成问题的是，他脑子里早就有个框框，要说银行作用大，找列宁的“银行是个奇妙的机关”；要想说银行作用不大，也可以找几条列宁主张取消商品货币的言论进行论证。显然，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是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学到手，是不可能掌握精神实质的。所以，要想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那就需要老老实实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学习。

现在我们强调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基于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在信念上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教书的，跟青年人接触很多。青年人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学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学着学着，他说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比马克思的还好。西方的东西，你不让他学不行。学生不能在罐子里培养，在罐子里培养，什么抵抗力也没有。可是让他接触，他就要提出问题。青年人这样，年岁大的人，也不见得没有问题。比如说，过去总是听说外国工人都苦得不得了，可是现在看，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有些出国的人，带回来的观感是人家的生活比我们强得多。有的同志不知他在外国看到的尽是好地方，许多地方的阴暗面没有看到，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些想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像那种通过语录式的学习方法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能巩固吗？能不动摇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压服没有用，压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们的脑子里都有一个逻辑系统，有他的逻辑思维的思路。你要是不给他真正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够真正



地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信仰。所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只有让大家对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观点，自己用心来多学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有稳固的基础。

总之，我们纪念马克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不断提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那就能够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觉性，有更大的信心，方向就会掌握得稳一点，金融这个经济杠杆在实现战略目标的作用中，也就会发挥得更大一点。

二、《资本论》是研究和指导金融工作的重要武器

我们进行金融理论建设，应该从《资本论》里寻找指导方向，汲取理论营养。《资本论》的内容，确实十分丰富。有的人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也有人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不论叫什么，都说明这部书凝结着马克思几十年的心血，凝聚着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以应该尽可能地争取学一学，哪怕只学某些有关的部分。对于在金融战线工作的同志来说更应该是这样。

《资本论》对于金融理论建设的指导意义，我想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直接有关金融的论述。有关货币、货币流通、信用、银行这些方面的论述，在《资本论》中占有很大比重。《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是商品交换、货币，这可以说是专门论述货币理论的，也涉及到货币流通的基本规律。可能很多同



志看过马克思写《资本论》以前出版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前三章也是写商品、货币、货币流通。但在《资本论》中的论述，重点更集中、更突出。《资本论》第四章，货币变资本，以下就是论述生产过程，关于货币方面的直接论述较少。第二卷是两大块，一块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研究个别资本的运动；再一块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研究社会资本的运动。这两部分对于我们研究货币流通，对于我们研究信贷资本的运动都极为重要。再有就是第三卷，第三卷里头有个第五篇，是讲生息资本，就是可以生利息的那种资本。具体地说，这篇讲的是信用和银行，也论述在信用和银行基础上，所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银行券的流通、商业票据的流通以及国际汇兑等等。其他很多经济问题在《资本论》里都没有像金融问题论述得那么多。比如财政问题在《资本论》里只有有数的几句话。所以对我们搞金融工作的同志来说，这是很幸运的。既然宝贵的财富现成地摆在这里，我们就应该努力学习，用以指导我们的理论建设。

第二，或许比直接论述的更重要，那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观点。这里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再一个是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还有一个是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关于马克思的价值论问题大家都知道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实际上，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不是马克思首创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就坚持这个论点。马克思说，我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者，我是在什么创造劳动价值这一点上有所发展。古典经济学只是谈到劳动创造价值，而马克思论述了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由于对劳动的性质有所区分，这就进一步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并由此出发揭开了剩余价值之谜。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现在是有怀疑的情况存在。由于通常我们讲劳动价值论，主要是就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来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指吃的、穿的、桌椅、板凳等等。但是社会生活里不只是这个，还有个精神产品，还有服务性行业。服务性行业，有的好说，比如，到饭馆吃饭，菜饭那是物质的。听戏情况就复杂一点了，戏在上面唱，唱算不算物质的？不过，他唱你听，听得高兴，也可以说是使用价值发挥了。不过，现在又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科学技术进步，现在起的作用很大。一个发明，产品成本可以降低很多，可以赚很多钱。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点讨论得似乎比较清楚了，但它们是不是创造价值呢？是如何创造价值呢？又如电子计算机发展了，计算机中的软件，是不是物质产品呢？还有信息的传递等等，这同劳动创造价值有什么关系？总的说来，这类性质的问题，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用这个学说的体系，是可以解释的，当然不那么简单。我们在课堂上往往把劳动价值论讲得过简单，似乎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就是这么一点点。正是由于这样，许多新的问题就难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情况也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简单化，那么就会使人们认识到它现在还是真理，还是应该以它来指导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对金融工作的指导意义是非常直接、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贷款，贷款要有物资作保证，只有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作为物资保证，这像是很通俗的话。但这句通俗的话是结合着贷款业务的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来说的。所谓适销对路的产品就是指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也只有具备使用价值的产品，才能使生产它的劳动凝结为价值。可以作为物资保证的产品，在商业部门可以出售；在工



业部门可用以进行加工，并把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形成市场供给。如果我们不考虑物资保证，贷款再多也不起作用。因为贷款只能形成购买力，而购买力却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物资来对应，结果贷款只能冲击市场。这个从马克思价值论来的道理看来很简单，但是坚持起来很难。再如，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银行的资金有边、没边，有数、没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前年夏天在我们的实际工作里，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的。1981年年初，那时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重工业的日子不好过。不久就提出了不能只压缩，还要有速度，没有速度，也不能调整好的问题。要速度就意味着建设，建设就要钱，哪儿来钱呢？大家一议，就想到银行，银行有钱。银行怎么有钱呢？光储蓄存款，1980年比1979年增长100多亿吧，连续几年增长的幅度总是100多亿。这仅是储蓄一项，如果把其他存款等等各项资金来源加起来，每年就有三四百亿的增长幅度。这不是钱很多吗？但有多少钱可以拿来建设，这就说不清了。有说多的，有说少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其实，这件事如果从马克思的价值论来看，也不太复杂。马克思谈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价值，是凝结在物质财富里面的价值。劳动创造价值，同时也创造使用价值。我们要是进行建设，要拿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进行建设的砖、瓦、灰、石是要现实的，机器设备是要现实的。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形成固定资产？增加流动资金，要拿粮食储备、棉花储备、木材储备或者是化工原料的储备，没有这些储备，增加流动资金有什么意义呢？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把货币完全抽象掉来思考：人加工物质财富，这样有了厂房、机器设备，生产能力出来了；然后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有了社会产品，这才能消费，这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是基



本的道理。马克思价值论告诉人们，人进行劳动，创造财富，然后才能进行分配。如何分配呢？补偿一块，个人消费一块，还有积累一块。社会产品被个人消费了，当然形不成建设资金。用于补偿的社会产品，其中相当于折旧基金的部分，通常都看做是建设资金，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只是有补偿的意义，也有扩大生产能力的意义。剩下的积累部分，这是建设资金。还有，我们可以挖潜，这也增加建设资金。比如十台机器，使用效率提高了，可以省出一台来，这台机器可以增加生产能力。原材料储备降低，利用节约的材料可以扩大生产等等。积累、折旧、挖潜，建设资金就是这么多。这些资金财政支配一个相当部分；企业留下一部分，即预算外资金；剩下是银行的。可用于建设的社会产品既然数量是确定的，那么除去财政和企业的支配部分，由银行支配的资金也不能是没有数量界限的。要是脱离价值与使用价值统一这条原理而只就货币资金论货币资金，就往往说不清。比如，一算储蓄，大部分是定期的，既然老百姓现在不用，不是可以用来长期投资吗？再算现金发行，发行的钞票越来越多，并不会全部回来购买商品，这不是也可用于长期投资吗？再有银行的结益，各种存款增长的稳定余额都可论证成可用于长期投资的。左加右加，光在这个钱上面算账，而且是孤立地算账，就会认为银行的钱多得不得了。其实账面上这些钱到底有多少真正可用于建设？这是很不容易说清的。不只外行人听不懂，内行人也有不少问题还待研究。如果总在这里纠缠，那就总是旁人说银行有钱，银行自己则既不能说没钱，又不能像旁人那样说自己的钱多得不得了。所以，要想在大框子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最后只有从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来解决，即研究建设资金问题，不能只在钱上打算盘，而要看价值与使用价值统一的物资



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把住这个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就不会对很多问题产生虚无缥缈、单凭脑子想像出来的看法，就可以把比较复杂的问题归结为比较简单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问题，是我们金融工作者必须重视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占很大比重，应该说我们对这部分的理论比较熟悉，研究得比较多。但要在实际工作中把握住精神，也不容易。

比如，我们都知道，资金要周转，周转要有条件，要有主观条件，也要有很多客观条件。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细致的，他甚至对一个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要占用多少时间，劳动要用多少时间，自然发酵要用多少时间，都作了分析。虽然马克思研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是以外部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为前提的，但他也不时提醒内部条件对资金周转的意义。总之本着这个精神，我们知道资金周转是受很多主客观条件制约的。比如，找到一个好经理、好厂长，资金周转就会快一些。厂长按道理说是个主观条件，但从社会看也是个客观条件。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就这么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个问题。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有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出问题。比如我们几乎每年都提降低成本百分之几、资金周转加速百分之几这类任务。3 000亿的流动资金周转加速1%就是30亿，加速5%就是150亿，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到底能不能加速呢？近几年连续提加速流动资金周转，可是连续几年资金周转不仅没有加速，有时反而还慢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调整时期，由于客观条件变化，使周转减慢的因素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那么结论应该是能保证周转速度不再降低就不错了，要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作计划，计划就切实可靠了。可



见，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要真正贯彻，还是有好大问题的。再如，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讲，资本在循环和周转之中经历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三种形态——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变成商品资本，商品出售又变成货币资本，资本三种形态的转化又构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从这样的原理出发，很容易得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我们这里就是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应该有一定比例的结论。对于这个结论也没有人反对。既然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应有一定的比例，那就不仅要重视固定资金，也要重视流动资金。简单地讲，基本建设应该重视，增拨流动资金也要重视。比如形成了很大的生产能力，没有流动资金，生产能力还是发挥不出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但实际执行起来就难上难了。多年来，基本建设、固定资金的投资一直是很受重视的，而流动资金的供应问题则很少受到重视。银行每年有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上数百亿，人们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党委从不过问，可是这两年开办了中短期设备贷款，虽然这种贷款的数量比流动资金贷款少得多，但党委都极为重视。当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积极从理论上宣传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关系，特别要宣传流动资金实际上是挤不了的，或者说，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实际上也是很硬的，一点也不软。满足不了，结果只能用过多的货币投放来满足。

再说社会总资本的问题，即马克思讲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个部类怎样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说得再通俗一些，即基本比例问题。这两年，中短期设备贷款作出了不少的成绩。比如，促进了轻纺工业的发展，调整了轻重工业的比例，改善了市场供求等等。这些大家都承认。其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应该说是正确



的、合比例的思想为指导的结果。我们协调了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反转过来，又推动了银行工作，改善了信贷和货币流通的状况。另一方面，中短期设备贷款也搞了一些重复建设，这则是没有严格用比例思想指导自己工作的结果，对货币流通、信贷也有消极影响。所以学习社会的总资本的理论对提高我们的工作也有直接的意义。

以上说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基本论点都不是直接论货币、论信用的，但却是关系到能否正确确立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比马克思在金融方面的直接论述更为重要。

第三，谈谈应重视学习《资本论》的写作态度的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一卷发表后所作的评介中有这样一句话：“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作者，却以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并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恩格斯的这句话有几处是很令人注意的。一个是“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无可怀疑的知识”；再一个是“考察了全部关系”；第三个是“绝对认真的研究”。

关于第一点，即“博学”的问题，当然像马克思那样，咱们做不到。翻开《资本论》大家会看到马克思的注解很多，每提到一个论点都要指出出处。马克思不掠人之美，有肯定，当然也有批判。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批判地吸收。马克思在伦敦20年一直在大英博物馆钻研，这点咱们也做不到。但有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总是要积累一些知识。特别是不要以无知冒充有知，这恐怕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一点上往往出毛病。比如前几年有人出国，说资本主义搞通货膨胀，发展



了资本主义经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于是也就主张我们搞通货膨胀。的确，到外国一看，人家是“四高”：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高增长。问题是，人家的物质生活水平高，是否是用通货膨胀搞上去的呢？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人就能回答清楚，而我们有的同志却津津乐道。类似的例子说明，我们的结论、论断、决策如果是建立在知识不够充分的基础上，那是很危险的。

再有一点就是考察“全部关系”。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间很长，咱们看电视，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就开始转向德国人所“不屑于研究的经济学”（当时德国主要重视研究哲学），一直到逝世为止。他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历史，而且把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用到研究资本主义上来。也正是经过这样全面考察才能作出判断，才得出来结论，才以其无可争辩的真理性，掌握了人民群众，指导了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我们往往却不是这样。有的同志本来不了解银行业务，只研究一点就发表议论。比如说银行那么多储蓄存款，今年增加假如说是150亿元，大部分是定期，既然群众不用，拿出100亿搞长期投资有何不可呢？他提这个问题觉得挺有道理，但他不懂得对储蓄的研究须将与储蓄有关的问题都研究到。实际上储蓄只是银行资金来源的一项，此外，还有各部门存款的增加，发行的增加，自有资金——银行结益的积累，还有些国际上的来源等等，这些来源到了银行实际上就拧在一起分不开了。而同时存在的资金运用也不是一个项目，比如有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和中短期设备贷款，有时财政还要借款等等。总来源要和总运用来比，在总的比较中才能确定有多少钱能用来进行基本建设性质的贷款。所以，研究储蓄至少应把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全



部情况研究了，才能说清它在扩大长期投资中的意义。实际上光研究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还不够，我们还应该联系到财政的资金，而且目前还要特别联系到预算外资金。这些问题都联系起来，我们才可以说对资金大体上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在这里，学习马克思考察全面关系的治学态度显然是很重要的。

再有就是“绝对认真的研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定要被消灭，可他并不是将资本主义简单地骂倒。比如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讲了如何唤醒了生产的问题；再如，对英国的工厂视察员（原则上说，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也是具体分析，他肯定了他们的某些意见曾经对改善工人状况起过好作用等等。马克思是最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不是随便轻率地作结论。比如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在《资本论》中始终没有说。对于货币，他只说将来可能是用“劳动券”代替，至于到底是不是“劳动券”，他并没有肯定。能作结论的作结论，不能作结论的就不作结论，而我们有些同志就比较爱作结论。比如在我们银行工作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拿出一个做法就说这个做法是最马列主义的；改个做法，又把改的做法说成是最马列主义的。到底哪个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呢？所以我们应该用马列主义的态度反对实用主义的态度。

我们说，《资本论》中对金融的直接论述对于我们有指导意义，全书的基本经济论点更有指导意义，而写作《资本论》的态度，也就是治学研究的态度，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尤为深远，目的就是强调应该学习《资本论》。当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如果能挤出时间还是希望对这部经典读一读，哪怕只读上一部分。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意 克服两种倾向

我们过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资本论》存在两个偏向。

一个问题是，口头上说赞成马克思主义，应该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往往实际上并没有学。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马克思本来已经说到的东西，我们有时却还发表与马克思不一致的看法。而且并不是经过分析认为针对当前情况应对结论进行修改，却是好像马克思根本没说过一样，这显然就成问题了。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又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认真读马克思的书，不准确了解马克思的论点，这似乎奇怪。但就有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语录式的学习方法更容易出现这个毛病。比如关于货币流通，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比较趋于一致了：货币流通应该研究现金流通，也应该研究存款转账。过去有种说法，现金流通才是货币流通，因为现金流通是货币的运动，存款转账不是货币流通，存款转账是资金运动，货币和资金不是一个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特别是到了第三卷，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货币和资本的关系。他指出，流通过程包括两种流通：一个是货币收入的流通，比如工人领取工资去买消费品，这是单纯的买卖；再有一个是资本的流通，比如资本家购买原料和劳动力以及出售自己工厂的产品，这既是买卖，又是实现占有剩余价值的环节。但他说清两者的区别，同时又说无论是收入的流通或是资本的流通，在流通过程中则只有一个流通，即资本



家为进行生产在市场上买东西和一般人去买消费品，单纯从流通过程看是一样的，都是流通，都是买卖。比如资本家到市场上买木材、钢材、水泥，可能是盖工厂，也可能盖别墅。盖工厂就是资本的流通，盖别墅就成了收入的流通。流通并不要求资本家事先声明他的目的，因为流通所需要的只是等价交换。所以，在流通中，资本的流通和收入的流通都一样，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在流通中都是货币，都是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或者说资本的流通就是在一般的简单的流通之内完成的。

既然马克思说的这么清楚，为什么还把货币和资金绝对地对立起来呢？可能有时凭直觉作判断，或者是凭苏联的教材。这里插几句，我们过去学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大部分学的是苏联教材，后来有了我们自编的教材，但初期也是苏联教材的改头换面，现在逐渐突破，但痕迹也还能看得到。因此，我们说的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往往就是苏联教本的那个“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当然并不是说那里面都错了，不过至少它并不“等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应该说里面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很多有问题的地方，很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可是咱们把苏联教科书上的概念当成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的原书并没有看，这就不能不出漏子。

再说个例子。咱们搞银行的最爱引用列宁的话。列宁说过，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列宁既然说银行的作用大，当然就应该大大发挥银行的作用。的确，列宁对于银行说过很重视的话，但苏联取消银行也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个退步，是个让步，将来还要进攻。就是说恢复商品经济是个退，将来还要进，在这种情况下，“将来”银行的命运也还是成问题的。所以列宁说



的话，我们要全面地学习并理解其一贯的、真实的意思，这样才不至于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列宁身上。

马克思讲过了的咱们不知道，这是个笑话；但没有说过的，也不能说有，更不能瞎解释，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另一个问题就是抓住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断不放，而不作具体分析。我们往往看到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相持不下，只要有一方把书一翻开，指出这是马克思说的，对方一下就泄了气，似乎再争就成了政治问题了。马克思的话是不是句句是真理呢？至少不能说马克思的每一句话都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总的意思是说有的话不能用。比如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咱们通常总引用的一句是“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的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一个有力的杠杆发挥作用”。但下面只隔着一句话，马克思说：“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前面那句话说的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信用的作用很大。这句话咱们经常引，但底下那句话就不行了。因为这句话是说，只要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信用制度就完了。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就基本完成了，按马克思的论断信用早就该取消了。这句话能不能搬用呢？当然不能简单搬用。这个例子说明，马克思的具体论断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于今天。我们应该分析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作的论断，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些论断。

不过像这样明朗的问题不多。有些问题的具体论断本来已不适应今天的情况，但往往为了“捍卫”某种论点，马克思的话就成了挡箭牌。比如，认为存款转账不算货币流通的观点，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马克思只把转账视为货币的节省，而不视



为货币本身的运动。的确，马克思只是把存款的转账说成是货币的节约。马克思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银行转账是“对于一种已经不存在了的存款进行支付”。连存款都不存在了，那更谈不上货币的流通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需要结合当时的金币流通来说明。比如一个人愿意把 100 金币存入银行，这时银行库存增加 100 金币，顾客的存款账户上有了 100 块钱存款的记载。银行收进了 100 金币不会放在那里不动，它要贷出去，当然不能全贷，必须保留一定比例以准备支付存款的提取。金币贷出一部分之后，账面上虽然还记着 100 金币的存款，但原来的“存款”——金币——已大部不存在了。于是马克思说这种存款就是“已经不存在了的存款”，因为账面上的只是个“观念的”货币。然而存款人无需知道他原来存入的金币是否被银行贷出去了，只要有支付需要就可开支票，比如支出 50 元给另一个顾客。这个人（收款人）要求另一家银行给他转账，把支票上的钱划过来，于是取款银行向付款银行要钱。要真正的金币对方没有，实际上资本家银行也不是这样，而是原来的存款顾客的存款账上要除掉 50 元，收款人的存款户上则进账 50 元。所以马克思说，银行划拨是对“已经不存在了的”存款进行支付。就当时来说，马克思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平时虽然不用金币就可转账，但是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则只有金币才是真正的货币，大家都追逐金币，非现金转账则不管用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金币之类的货币早就没有了，有的只是钞票和银行存款。如果你对一个企业说，你的银行存款是“已经不存在了的存款”，对方一听准保发火；你说这是马克思说的，他会说马克思说的也不行。因为存款对他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实实在在购买力，实实在在的资金。所以说，现在观察问题就不能抱着马克思



思根据当时情况所说的话不放。其实，不仅马克思这么说，那个时候包括资产阶级学者也都那么认为。马克思逝世以后情况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研究，认为流通中的货币不仅是金币，有钞票，还有存款。于是货币流通量是钞票加活期存款这个概念就形成了。这是在19世纪以来20世纪初形成的。糟糕的是，苏联给我们制造了一个特殊的观念，这个观念输入到我们这里，就把存款从货币中剔除了。现在我们反过来说存款转账也要看成是货币流通，似乎一下子跑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其实不然。我想马克思如果在世，他也一定会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表述。否则，我们就无法研究现代的货币流通和现代的市场供求。

所以学习《资本论》要根据它的历史背景学，要结合我们现在的条件进行对照研究。大的框子、大的原则是不能随便更动的。比如价值论就不能随便改动（当然，价值论也要发展），关键是用马克思的原理来分析研究当前的情况。至于具体的论断都是在具体情况下提出来的，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搬到现在，往往就谈不通、行不通。为什么我们往往做这种谈不通、行不通的事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脑子里装进了许多先入为主的东西，似乎只有这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念凝固起来之后，就会引经据典来论证它，捍卫它，而不自觉地在维护一些已不适应实际情况的观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应该纠正，不改只会阻碍我们前进。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学风很浓，学习的劲头很大，这是个好现象。希望能挤出一点时间，真正安下心来读点经典著作，读点《资本论》，提高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水平，这对于推动金融理论建设和金融战线的各项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要学好 非马克思的经济学也要研究

作者解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中国有几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1987年8月下旬，“中国大学发展项目Ⅱ”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由中外学者参加的“中国财经教学计划研讨会”，目标是提出一个能体现财经类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的核心课目录，向国家教委推荐。

会议的第一天，西方一些教授均强调应学习现代经济学，即西方的经济学；中国的教授则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好像没有调和的余地。问题是，是否真的不存在值得探寻的共同点？我是第二天发言，发言内容即如本稿所示。

实际上，后来还是讨论出来双方认同的教学方案。其中，确定了10门核心课。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关系，前者定为6学分（有人记得是8学分），后者定为4学分。会后，国家教委有关司局组织了这10门核心课的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并于90年代初先后出版发行。

本文是据保存的发言底稿编入的。英译稿收入 *Proceed-*



ings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eminar on Chinese Economics and Finance Edu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ject II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中国的财经教学，其目的在于培养在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为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应该说不是学校本身单独所能解决的，它要求全社会的协同努力。至于说到学校本身，有专业设置问题，有课程设置问题，有教学方法问题等等，但我想得更多的是教学内容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教学内容的建设，在我提供的背景材料中提出了这样的基本思路：(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 汲取西方和东方在这些学科中的最新研究成果；(3) 立足于中国的经济环境，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实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原则在中国的地位，是在坐的教授学者们所了解的。自然，其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两者能否并存，特别是外国的同行，也存在一些疑问。在这里，我只想讲讲自己的一点体会。我是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我的信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进取的，是反保守的，它的着眼点总应放在解决客观不断提出的新课题，并在这样的过程中来发展自己；是开放的，不是自我封闭的，它绝不应无视人类研究成果而自求完善，如果自我封闭，它就会丧失生命力。也许正是本着这个信念，我在努力推动提高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同时，也大力推动青年，特别是将来要做教师的青年，对外国的经济理论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从长远考虑来说，既



应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要学习东方的，即苏联、东欧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们近些年来在改革方面的各派理论。不过，近些年，可能在学习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方面我们花的力量更多一些。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一是中国的教授，主要是过去在西方留学的老教授讲授。既在研究生阶段讲，也在本科阶段讲。二是提供相当数量的可供阅读的外文书籍。对于从事教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学习途径。问题是书的数量与需求对比来说太少。三是派出留学生。虽然面临有些留学生滞留国外，但还是要派，终归大多还是会回来的。四是请外国教授在中国讲学。应该说外国教授在中国讲学不断碰到一些困扰。在这方面我愿意介绍一个成功的例子，即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Chinese Committee of Economics Education Exchange with The U. S.）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合作举办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一年制的教学计划和暑假的研讨会（Workshop）。一年制的计划是对选拔的研究生进行正规教学——按学期开课，给学分。外国教授基本按国外的教学法教，效果较好。暑假的研讨会是介绍经济学某一个方面的新进展。对于在西方经济学方面有基础修养的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来说很有帮助。在座的刘遵义教授对此有发言权。

当一个人学了马克思经济学又学了西方经济学，那就必然地，甚至自然而然地要探索这两者的联结问题。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否则，一个讲马克思经济学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教授，一个熟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授，让他们两个“结合”，经验证明，这只能演“三岔口”，难以取得什么效果。所以，我的努力方向在于追求培养人



才，特别是青年人的长期效果，而不推崇急于求成的方案。

再要说的是，对中国学生的教学必须牢固地根植在中国的土壤上。美国的货币银行学是以美国的实际为背景，中国的货币银行学如果一味大讲联邦储备系统就成问题了。但过去，乃至现在，懂外国的多，懂中国的少的中国人，还是不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了解中国似乎不应成为问题。其实不然。比如，在我们接触的学生中，研究货币需求理论，对资产选择理论津津乐道，但问到他，中国现在以及不久的将来，到底有哪些可供选择的能与货币替换的资产，却不甚了了。再如，讲到利息，有的学生对于改革中未能重用利息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十分不满，但却不去具体了解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利息为什么就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还需花相当大的力量使学生接触实际生活，了解多年中央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当前经济生活到底有多么深的影响。否则，马克思经济学也好，西方现代经济学也好，都起不了作用。

我说的这些，可能是一部分财经教育界同仁的思路。介绍出来或许有助于大家了解中国的情况，有助于讨论。谢谢。



积极稳妥地推进 学科改革与建设

作者解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一方面认定中国人民大学是保守思潮的阵地，是改革的非积极因素乃至逆向力量；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国人民大学已不再坚持传统方向，不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有不同认识是很自然的事，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也极其必要。但不时夹杂着歪曲事实、恶意攻击，则的确令人厌恶。

1993 年年初，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报道成了一时颇受关注的热点。而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政治性事件。当时的背景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已发表一年，全国正面临新一轮的改革高潮。就学校来说，教学改革在经过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冲击有所徘徊之后，正处于如何向前推进的转折关键阶段。回想当时学校的情况，在政治、学术、教育的客观环境比较宽松的气氛下，教学改革确有较大幅度的推进。在那个阶段，人们特别关注的是专业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



也比较大。1993年初，媒体多所报道。利用这些报道，国外和港台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在几天之内大肆炒作。英国《金融时报》1993年2月8日以“Chinese students turn from Marxism to business”为题的报道是个典型例子。

为了澄清当时国内外舆论造成的紊乱，我，作为校长，不得不郑重地公开阐明学校的态度。为此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刊登在1993年3月16日的《中国教育报》上。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高等学校是现代社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孤立于周围环境之外；同时又有着自身长期形成的运作机制，具备相当大的独立性。对待这一领域的改革，既要富有激情，又要保持冷静，只有这样，才能突破由于自身发展惯性所形成的那些已与生活进程不相适应的框框，积极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与兄弟院校一样，在改革大潮中应该努力提高全校师生员工对改革的认识水平，调动大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应该依据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要求调整专业学科设置，并形成对不断发展的改革形势有高度适应性的教学科研体制；应该改进学校内部的管理，提高办学效率，形成能够发挥学校各部门创造性的运作机制，等等。与此同时，也要剖析学校本身的特点，因为把握特点会使改革的着力点更有针对性。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哲学、文史、政法、经济、管理诸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内容，用我们过去习惯使用的粗略表述法，是讲革命，讲建设。改革的每一进程，



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都有着直接的冲击。这样的特点就使得学科建设问题成为学校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有相当部分的课程是从不同角度直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是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包括其前身——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发展全过程的特征。去掉这一特征，也就割断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歷史。

但是，讲马克思主义，可以讲好，也可以讲坏。讲好了，是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14年改革实践的胜利；讲坏了可以是保守主义，是教条主义，是十年自我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要讲好马克思主义，就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要求具备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近些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为了讲好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已本着这些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过去已有的努力是不够的，还有大量艰苦的思想创造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从50年代起，开始建立讲授计划经济的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各相关课程通过总结过去集中计划体制的经验和不断推进的改革实践的经验，通过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和管理各学科的理论，在内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这为学科建设增加了新内容。但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还是具备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只是由于形势变化极快，学科内容与现实发展的差距仍有拉大的趋势。

目前，经济与管理学科必须调整课程内容。不仅计划学的课程内容亟须调整，像财政、金融、劳动、价格、企业管理等课程也需进行改革。甚至像会计学、统计学的内容也有同国际



惯例接轨的要求。再有一种情况是不少学科边界不断模糊、不断改变。比如，过去我国工、商、农的分野极清，因而企业管理学科也可分而为三。而现在共性的东西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而学科归并的趋向日益强烈。还有一种情况是集中计划体制下，很多没有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中却是主要成分，如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这就使一些新的学科需要建立，如以资产选择和资产组合为内容的投资学等。归结起来，就是要建成适应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与管理学科。

要形成学科体系，哪怕是并不完整的体系，也难以一蹴而就。学科建设必须吸取人类社会一切积极成果。这样的指针，在理工科领域中可能比较容易贯彻；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则似乎不那么顺畅。的确，在这些领域，外国的文明成果往往与意识形态、与政治见解纠缠在一起，正视它，则必须分析评论，这就不能不碰到带有政治性的敏感问题；如果望而却步，只能仍旧像过去那样，陷于自我孤立的天地之中。

然而，改革开放，特别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今天，自我封闭事实上已无法过日子，不过，在这方面仍然有些矛盾。以经济学科为例，我们现在虽然已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但对学习西方现代的经济理论却仍然没有予以正视。把学习经营管理与学习经济理论分家，只管前者不学后者，结果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所以如此分割，似乎学经营管理是方法问题，不危险；学理论，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好把握。但实际上，西方的经营管理是以其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经济理论则是其经营管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只学方法不学理论恰恰不易做到有所鉴别，况且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却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予足够的重视，只会使自己被动。不仅经济学如此，哲学、政治学、法律理



论、文学、历史理论、新闻传播理论等等也是如此。经验表明，自我封闭实际上是不能增强免疫力的。

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就必须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真正形成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和环境。

教育者的任务是“传道”，“道”体现在学科内容上。学科内容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就不能培育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可以担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重任的人才。所以，对于中国人民大学来说，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冷静地、脚踏实地地进行学科建设不能不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



古今中外 含英咀华

——金融基础理论建设之路

作者解题

2005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黄达书集》，并于6月2日组织了“《黄达书集》出版暨推动金融理论繁荣发展座谈会”。

在准备发言中，是想表达自己对于推动金融理论建设进一步繁荣、发展的一贯思路。但怎样表述才能言简意赅？想来想去，好像“古今中外，含英咀华”这样几个字几乎可以把自己的领悟加以概括。

本文发表于《中国金融》2005年第12期。

2006年8月

感谢出席“《黄达书集》出版暨推动金融理论繁荣发展座谈会”的各位领导、各位经济学界、金融学界和金融业界的朋友和来宾！

感谢组织这次座谈会和出版《书集》的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党组织分配我从事财经理论教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不久的1950年春；登上金融学科的讲坛是始于1950年的秋季学期。五十年来，有熏风暖阳，有凄风苦雨，更有今天中华振兴的大好形势。如果说幸运，那就是我一直没有离开金融学科的教学岗位，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财经教学的群体；也应该说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金融学界；同时，自始至终又一直得到金融部门以及财经各有关部门的支持。没有这样的环境，恐怕也难以把这部《书集》奉献在大家面前。

这部《书集》，包括5本教科书，5本专著，1本译著；教科书和译著都是动员了集体力量；专著也是得到了周围同仁以及教学对象的帮助和启发。这11本书，不仅记述了自己教学研究的历程；同时也刻画了金融学科教师群体建设这一学科的轨迹。而且，由于11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持续50余年连绵不绝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剖析建国以来我国金融学科教学研究发展脉络以及经验教训的系统资料。

回顾过去，瞻望将来，当前紧迫的课题是：面对飞速发展、时不我待的客观形势，如何推动金融理论建设进一步繁荣、发展。

我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进入教学研究领域的。在多年的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也逐步有些领悟：

首先，金融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马克思当年吸收、凝练一切文化精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最为经典的范例。

其次，金融学科建设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应勇于肯定，又应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



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

同时，金融学科建设又需要一个从不满足于现有认识，更不把自己的现有认识视为绝对真理的框架；只有永葆持续进取，才能为迅速发展、变化万千的生活实际提供理论服务……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金融理论的繁荣发展是可以作乐观预期的。

只是，对思维框架这样地抽象概括，颇觉佶屈聱牙，有时连自己也难以记准到底应该有几条，怎样表述才最为精准。繁不如简；精准往往让位于模糊。最近，蓦然浮现了这样几个字——“古今中外，含英咀华”。好像它可以把自己所领悟的建设基础理论所应取的思维框架加以概括。

建国伊始，在金融理论建设中，拒绝西方，拒绝建国前的研究成果，同时漠视自己本民族的古代思想，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精神。

现在，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知识特别受到重视。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那就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的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问题是如何学？这就涉及“含英咀华”。道理不复杂：不仅要“含英”的“含”——只有吸允，那就是全盘照搬；更需要“咀华”的“咀”——没有充分的咀嚼，就没有消化吸收。但实践起来，好像一百多年始终处于反复之中。现在，受到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克服完全照搬。但这个倾向的解决，不可能实现于旦夕之间。简单的指责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在学科建设上真正培育起我们自己的深厚根基。

至于对华夏的古代文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其他领域，不乏可观的研究成果。而在金融思想方面，相当普遍地并不认为



中国古代有多少可“含”之“英”，可“咀”之“华”。这也有客观原因，那就是还没有投入必要的研究力量，也没有多少可以打动今人之心的研究成果。

就基础的金融理论建设来说，也许应该把研究计划经济置诸视野之内。通常，我们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前，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已经有三四个世纪覆盖了世界的主干经济，并逐步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开拓出一片天地。而且，在以彻底扬弃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为最终目标的计划经济中，事实上不能不存在商品交换，在生产资料领域也一直摆脱不了所谓的“商品外壳”，并且几次企图“取消”货币都次次碰得头破血流。这说明，20世纪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同它自己依以脱胎出来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割断联系；商品、货币及其规律，依然在计划经济中取得了一个特殊的但却是普遍覆盖的存在形态。换个角度说，计划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存在。问题还在于，这个特殊形态还塑造了一个交易参与者极其简化的经济试验厂所。许多学者历来慨叹社会经济不同于科学技术，无法建立实验室。但计划经济正是在几十年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经济实验室。在货币银行领域，市场经济经过多年抽象推导出来的模型，在计划经济中则是以极为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英”，这里有“华”，对于这样的“理论财富”，我们是不是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金融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任务是艰巨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辛苦的。但真正投身于这个领域，那就一定能体会其中的乐趣。的确，在“古今中外，含英咀华”的过程中，那种可以令你浸沉于其中的乐趣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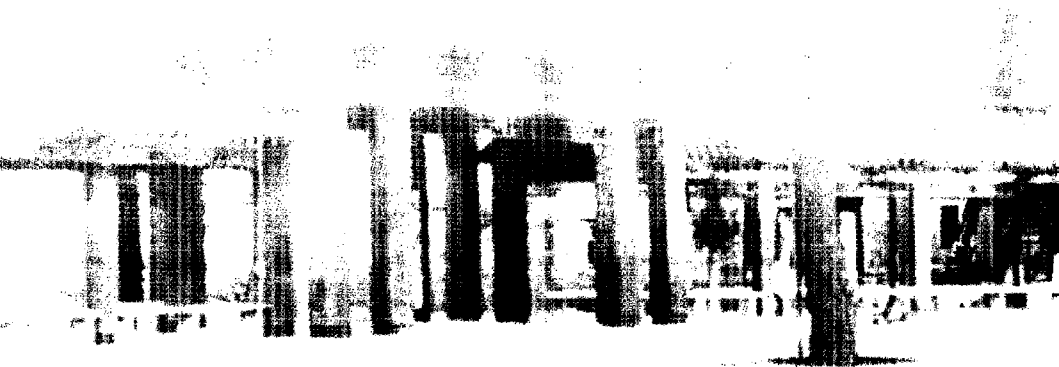


中国金融理论建设的繁荣发展应是确定无疑的；在中国土壤上成长的金融学界必将成为世界金融理论俱乐部中不容被忽视的成员。

谢谢！



学 习





机关软，企业软？

作者解题

这是一封回答中国人民银行杨培新同志所提问题的信，当时没有想发表。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是机关还是企业之争，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当时不仅有理论的分歧，往往还带有政治色彩。争论中经常引经据典，但却不知译文在这里开了不少玩笑。当然，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不应负任何责任。

1984 年底，银行在信贷控制上出了点纰漏之后，有这样一种观点：问题就出在把银行看成是企业。后来是否还有这样提出问题的，记不清了。银行性质如何，这自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却应提醒，在咬文嚼字上下功夫，特别是在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上穿凿附会，只能造成精力的浪费。

收入《黄达选集》和《黄达文集》。

2006 年 8 月

××同志：

遵嘱，对列宁著述中论及银行并提到“机关”字样的译文



对照原文作了查对。由于时间匆促，只查对了常见的几条。现奉告如下：

1. 我们最常引述的一条是：“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列宁全集》，第26卷，87~88页）译文中的“机关”，原文是 аппарат。

2. 译文中有“机关”二字的，原文并不一直都是 аппарат 这个词。如《全集》第27卷第124页有一句：“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能使居民亲自进行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会计、统计和监督的国家机关网。”这句里的“机关”，原文是 учреждение。

3. аппарат 和 учреждение 这两个词均既可译为“机关”，又可译为“机构”，而且还都有别的含义，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严格的”“机关”概念，特别不等于我们在银行是“机关”还是“企业”之中的那种特别严格的“机关”概念。

4. 这一点也可从列宁对这两个词的其他用法得到证明。比如，资本主义银行，除去发行银行外，是无论如何不能包括在我们的“机关”概念中的。但列宁论及资本主义银行时，既用过 аппарат，也用过 учреждение。就在“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这句话上面有一句话：“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统计机关。”是“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这种“机关”，这里的“机关”一词，原文就是 аппарат。再如《全集》第26卷第438页有一句：“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银行这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机关，可以在几天内被打破或改造好。”这里的“机关”也是 аппарат 一词。《全集》第24卷第299页



有一句论及资本主义银行的，指出银行是“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强大机构”。这里的“机构”的原文是 учреждение。

5. 《全集》译文中论及银行而又有“机关”字样的，原文还有多种其他情况。如第 27 卷，第 230 页有一句：“要继续向前实行银行国有，要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会计的枢纽机关……”这句中的“机关”，原文对应字是 пункт。пункт 一词的意思是“点”，没有“机关”、“机构”的含义。但译成“枢纽点”很别扭，所以按现在译法也无可厚非（当然，干脆译成“枢纽”也通）。再如，第 35 卷第 552 页有一句：“对国家银行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变成官僚主义机关。”这句话里的“机关”在原文中没有对应词，“机关”前的“官僚主义”是个形容词。直译出来，中文太秃，联系上文“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添上“机关”两字是可以的。这里的“经济机关”在原文是 хоЗорган。

6. 列宁还曾把银行说成是国营企业（见《全集》第 26 卷，第 221 页）。译文是：“……对银行实行全民监督，同时把所有的银行变为统一的国营企业。”这里的“企业”是按原文 предприятие 直译过来的。

情况大体是上述这一些。通过查对有两点想法：

1. 如果我们要论证社会主义的银行是“机关”，是否不必过多地去打扰列宁了。列宁大量论述社会主义银行问题，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后半年多的期间之内。当时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实行银行国有化则是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势力，战胜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必要措施。列宁所关心、所强调的，是必须把银行收归国有，使私人资本家的银行变成苏维埃国家的银行，使资本主义的银行变成社会主义的银



行。至于社会主义银行是“机关”还是“企业”，列宁并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自己逝世卅年之后还会出现这种长期争论。上面引述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列宁把社会主义银行既称之为“机关”，又称之为“企业”，既把社会主义银行称之为“机关”，也把资本主义银行称之为“机关”，而且在“机关”这个意思上是使用了几个不同的俄文单词。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俄译过程中所难免造成的一些复杂情况）引经据典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帮助。

顺便提一下，在论证这个问题中还常常引用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结论中的一段话（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5～307页）。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话，并结合当时的背景，很清楚，斯大林反对的只是把国家银行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并不涉及国家银行是不是“企业”的问题，即不涉及“企业”与“机关”之争。斯大林引述的索柯里尼柯夫的原话中，不错，确有“企业”字样。但斯大林对索的论点是概括为：“而现在照索柯里尼柯夫说来，这些作为我们国家机关组织部分的机关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机关。”显然，在这里，是企业，是机关，并没有予以注视。就这大段译文中的“机关”来说，原文用了三个词：аппарат, учреждение 和 институт。

2. “机关”软、“企业”软的探讨，其核心意义的所在，我一直没有搞得很清楚。既然有这样的争论，过去讲课、写书也不能不提上两句。但是，说老实话，应该承认自己有点糊涂说、糊涂写。就是“机关”这个概念到底包含什么意思，恐怕也还没有个严格的界说。如果说得远一点，资本主义银行，除去发行银行外，我们是不会给它个“机关”头衔的。但毋庸置疑，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它们的作用确实大，地位确实高。



而我们的银行，不论争论的结局如何，恐怕总不能把“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这个头衔给否定掉。但如实事求是地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银行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并不理想，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也不那么高。看来，一个“机关”的头衔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恐怕还是从我们的银行应不应该、能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矛盾何在，解决矛盾的关键是什么等等这类比较质朴的问题入手讨论会更好一些。而且，总有那么一种感觉，似乎过度强调“机关”，不由得就会与“衙门”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当然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衙门”，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但如真的挤进这个范围里，银行对经济生活起什么作用倒是值得重新思考了。

以上定会有些糊涂观念，请指正。

敬礼

黄 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主要的任务是打好基础

作者解题

本文是应当时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的约请写的，载入《中国大学校长论教育》，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出版。写作的时间在1991年夏。

全文是要说明这样一个命题：大学阶段，指大学本科，仍然属于“打基础”的阶段。对于如何打做人（政治方向和道德品质）的基础、文化的基础、专业的基础，分别针对一些模糊、糊涂的观念，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在大学教育工作岗位40多年，先是从事行政工作，从事思想组织工作，1950年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工作，除去一两年外，都是双肩挑，直到现在。怎样办好大学，点点滴滴有些经验、教训，难以尽述；由博及约，提纲挈领，又无把握避免以偏概全之弊。想就人们对“大学”的要求，谈点认识。

这个问题，我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触的。那时调查各



用人单位对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的评价，反映颇不一样。一个极端是估价甚高：理论底子厚，思想有水平，有潜力，有后劲；另一个极端是估价颇低：眼高手低，能说空道理，动手能力差，还不如中专生用着顺手。直到今天，仍然有这样两派意见，并且似乎也不只是专对中国人民大学，而是一般地对所有大学。显然，这是一个对大学这个层次应该提出怎样要求的问题。

多年的体会，大学阶段仍然属于“打基础”的阶段。当然，与中学、小学有别，但在“打基础”这个思路上有其更多的共同性。有的同志说，大学是要打专业的基础。这样的理解恐怕也还是嫌窄。

首先，大学阶段仍然要在如何做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继续打基础。如何做人通常指道德品质的素质，但在当代，政治方向更占突出的地位。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问题，是从小学或者是从学前阶段就进行培育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方面的问题，小时候只是印上一些概念。开始多少有些独立见解的选择意识恐怕要到高中阶段。大学阶段的特点在于，学生对于中小学阶段接受的东西进行理论思维：可能肯定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东西；也可能否定过去所接受的东西。在中学后期已经开始接触的各种思潮的理论观点，其中包括中、外、今、古多种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道德理论观念，在大学更是从多方面涌来，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判断，迫使他们选择。大学的门关不起来，使他们不去接触种种思潮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纵然有可能把他们封闭起来，当一旦不得不离开这个无菌空间，则会毫无自身内在的抵抗力。问题只能是如何诱导他们正确地思考。

对于这个方面，大学有政治理论课，有思想品德教育课，



有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政治取向，有党、团及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活动，等等。这一些都从正面告诉同学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然而思想问题有其自己的规律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心任务就是改造思想。那时有一个重要的方针，叫“思想解决问题”。意思是，你给他讲革命道理，你让他读革命的书，你给他创造接触革命实践的机会，如此等等并不等于他接受了你的观点；他要把他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道理与他头脑中原有的道理进行比较，对于他自己进行的这种比较，那时叫自我的“思想斗争”；而思想工作的效果则要看学员们通过思想斗争是否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是否树立了革命的信念。这一方针所反对的是硬性压服，压服总是压而不服。那些年，本着这样的方针，曾引导抱着种种目的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选择了跟着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参加过那时学习的同志现在均已年过花甲。他们体会几十年来虽说有胜利、有失败，有功绩、有错误，有喜悦、有苦恼，但回顾既往能无愧于心者，则根本在于对自己人生之路的正确选择。

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当严峻的。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不能不在青年的思想上引起动荡，这也就加重了大学的责任，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但追求真理是青年的本质特征，不论如何冲击，只要我们坚持思想工作的基本准则，终归能够引导他们向真理靠拢。也许一时之间消除不了他们的困惑，但至少也要并且也有可能诱导他们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冷静地、严肃地、负责任地思考；把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同自己的终生选择和归宿联系在一起，冷静地、严肃地、负责任地思考。把握正确思想工作的准则，我们应该相信，青年们的绝大多数是会自己作出正确的选择来的。



在大学阶段，个人道德品质的素养，与政治思想问题比，似乎是第二位的，但道德品质恶劣也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因而也特别要针对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大学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应该说，提出放在首位的要求，要放在首位；不提出这个要求，事实上也不能不是首位。一代的大学生如果在徘徊彷徨中走上歧途，其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是难以想像的；如果他们最终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中国的前途，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重要的保证。这不是哪一个大学、哪一个院系、哪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所有大学、所有院系、所有专业的问题，是大家共同的问题，是大家肩负的无差别共同责任。说它是基础的基础，并不过分。

其次是打文化基础。小学、中学学文化，难道大学还打文化基础？是的，的确还需要。这些年来，我们碰到的这方面问题有两类。一是有的文化基础本应中学阶段解决但没解决好，还得在大学补课。比如文字表达能力，大多数大学生的水平明显偏低。不只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判断：在这方面不及抗战前乃至于抗战时期的水平。是不是犯了“九斤老太”的毛病？恐怕不是。这个问题的麻烦还在于在大学阶段不太容易补救。再有外语，现在大学阶段压得很重。中学能不能再多打些底子，至少值得研究。另一类是本应在大学阶段打的文化基础。比如高等数学，不只大学理工科要学，大部分文科专业也要学。比如微积分，比如数理统计这类知识，就大学生来说，已是普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再如，理工科所应选的文科课程，文科所应选的理工科课程，也都是属于文化基础的范围。不仅在大学工作的同志主张文理渗透，社会各界呼吁文理渗透的人士也是相当多的。再有美学，在大学的教育中，不论在何种专业，均



应有其一席之地，像是也成为共同的认识。

这类文化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的作用主要是增强潜力，加厚功底。潜力、功底，是不显山、不显水的，只看毛皮，难以知其深浅，但这却是发挥一个人聪明才智的本钱。现在改革开放，经常碰到新课题，学科的更新也很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能独立开拓攻关，有的人则看出了门道，但缺乏解决的能力，有的人则干脆连门道也看不出来。所以有区别，关键在于潜力大小，功底厚薄。

对于大学生来说，有较广、较厚的文化基础也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懂得如何发挥他们的潜力；意识不到这一点，根据一时一事的观察，往往会作出大学生也不过如此的判断。自有大学以来，潜力得不到发挥，终归陷入众人而已矣的命运，恐怕也不是个别的。当然，在大学不肯下功夫，混个毕业文凭，并无潜力可挖的也有人在，但总是少数。

三是专业的基础。孔老夫子那个年代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虽然重视因材施教，但六艺大家都得学，夫子他老人家大概也是一个人都能教，那是不分专业的。社会的发展不能不业有专攻，于是理工农医、文史哲经等等就逐步分开了。但建国以来，专业越划越细。比如会计是个专业，后来分成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农业会计、基建会计等等专业，后来还有要求建立南海石油会计专业的。不仅石油工业从工业中细分出来，而且专业还要按地区分！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还应有渤海石油会计、塔里木石油会计等等。好在近年来大家已痛感这种思路的谬误。由于这种思路，各种专业计划的课程设计自成一套，结果是基础越来越窄，而在越来越窄的基础上，一门专业课接一门专业课，就像竖起一根竹竿之上再一根接一根地往上竖，越接越高，也就越摇摇晃晃不那么牢靠。事实上，专业无



论分得多细，也比不上毕业生将会走上的岗位分工细。然而，分工极细的工作岗位却又要求有关本专业的广泛知识，而过细的专业划分却满足不了这种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拓宽专业，并且重视打专业的基础。

拓宽专业碰到不少阻力，有校内阻力，更有人事管理体制的阻力。如果专业设置完全不考虑国家管理部门的划分，毕业生的工作分配都会成为问题。现在我们学校在专业暂时难以调整的情况下，正在采取“通开课程，淡化专业”的措施。比如经济类各专业，强调加强共同的经济理论课、共同的重要经济学分支课和普遍必须掌握的如会计、统计这类课程，即强调都学好打基础的专业知识。

目标是打好专业基础，那么课程就要按照这样的目标来建设。总的说来是要讲清道理，不仅要使同学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如此才能举一反三而以三隅反，掌握探索专业奥秘的锁钥。比如经济类的课程，不管理论多一点的还是实务多一点的，都要既讲中国的，也要讲点外国的；既讲当今的，也要讲点古代的。有中有一，当然以我为主。但以我为主不能旁人的毫无所知，特别是旁人优于我们的更要注意。现在讲市场调节，过去，这方面我们不太在行，而西方一直搞市场，自然有其比我们在行之处。学了不要被人俘虏，这是界限；但怕受影响而不敢接触则何从战而胜之。有今有古，当然厚今薄古，同样不能一点不懂古。说学好孙子兵法就会搞好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那是言过其实；但这笔思想财富我们自己要是不甚了了，那就有点愧对祖宗了。“古今中外”不是炫耀学问，而是要诱导同学专业领域视野广阔，胸怀全局，进一步掌握比较、吸纳、扬弃的本领。

专业的基础打厚实了，既可专而又专，又可随工作的需要



不仅能专于此，还可专于彼。这也是时代对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

还有基础技能这一项，最简单地讲恐怕是写字。有位工科老教授对于有些学生制图写不好宋体字、写不好斜体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码很恼火，他怀疑这种基础都没有，怎么能搞好设计。有人说，字写得不好没有关系，有电子计算机帮忙，但这是一个对具体技能的态度问题。如果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电子计算机也掌握不好。现在电子计算机普及极快，对大学生掌握这种工具，应该严格要求。

如果承认大学的重要任务是打基础，那就不能不承认从打基础到潜力现实地发挥要有一个过程。有的人不了解这个过程是难以逾越的阶段，就埋怨大学没办好，大学生事事还得要人教。其实问题在于中国缺少一个职业教育的环节，这个环节一般应在用人单位。大厂矿、大管理部门可以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小单位则要求“师傅带徒弟”。然而用人单位或缺少这个观念，或有这种观念而缺少条件。这个问题的解决，绝不能采取把大学降为“职业教育”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在种种理由之下，这样的主张还是存在的。假如按照这样的路子走，造成的损失，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说，是难以以尺寸、以斤两计的。不过，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还是起了作用的。这就是说，大多数用人的单位，大多数用人的人懂这个道理，理解大学工作的甘苦。这也就是我们能够有信心之所在。



自 述

作者解题

记不清是谁约的稿，当然也记不清寄给了谁，更不知其最后的下落。但写出了这篇自述之后，凡是编各式各样的人物传、人物大词典等等而要求提供资料时，倒减轻了我一一作复的负担。

《自述》中有一段总结：自己所以能够摸索到进入经济学科的门径，颇得益于教学。这的确的确是切身的体会。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教师均有所领会并给予真正重视的。

收入《黄达文集》。

2006年8月

我是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从事金融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中间未曾改行。十年动乱期间，不能教学，但也仍然断断续续地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资料积累。算到1993年底为止，已43年有半。今后岁月，恐怕“终于斯、老于斯”几字庶几可以概括。

本来，少年时的志向既不愿当清贫的教师，更未想到进入



经济理论领域。那时，一心想学工，将来当个工程师；如迫不得已学人文科学，向往的也是文学、历史之类。中学毕业时，一场大病失去了升学机会。在历经坎坷之后，于1946年，用当时的用语来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即跟随中国共产党投入波澜壮阔的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那摧枯拉朽、地覆天翻的年代，个人的荣辱得失和事业理想都显得非常的渺小。虽然也想“革命成功之后”还是学工，但当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际，分配我从事经济理论教学，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决定终身职业的安排。

要教经济学，却未曾受过正规训练。虽然1946年春我考入了华北联合大学并进了财经系，但在这所熔炉中学的主要是革命的道理。在缺乏专业基础的条件下，硬要走上经济学的讲坛，真像俗语所说的，是“打鸭子上架”。然而终于“上了架”并在这一领域铺下了一些便于后学的石子。对此，旁人誉之为“自学成才”，以示鼓励；我自己则喜欢用“土法上马”这几个字，以示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更能形象说明自己成长的时代特点。

土法上马并能一步一步地前进，我自己总结，颇得益于教学。如果确是真心诚意地想把学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远远不够，还要通过文字，特别是要通过口头表达自己之所懂。所以说，从备课，到编教材，到讲授，到主持讨论，到组织考核等等，每个环节都是从“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转化。转化不过去，或说明并未真懂，或说明懂之不深，这又会推动对学科的吸收和消化。并且，像在讲授、答疑这类思维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往往会提供在学科中进一步创造的气氛和机会。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青年学生要求教师的是讲道理，是严密的逻辑论证，是判断真假善恶的理性思维和一以贯之的标准。所以，面对学生，总会感到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必须坚持科



学态度的约束力量。“教学相长”像是已经俗而又俗的口头禅，但我的感受却是常说常新。直到今天，不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如何多，我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遵守的准则。

土法上马并多少有所成，我自己总结还有两个必不可缺的条件。

其中之一是文化底子。高中，我是在天津历史最久的一所中学上的。这所学校只招男生，而且入校一律剃光头，当时学生都把它叫作“和尚学校”。教师的阵容极强。我从以学数学的杨学涵老师，风骨清介，学问扎实。那时先后的同学提起他老人家均肃然起敬。如果没有他的教导，我是没有可能补学经济理论所需的最低限的高等数学的。在语文方面，一位老师裴学海，是知名的文字学家，他在讲授中，拆章析句，辨字正源，使我们真正有可能进窥汉语的殿堂；另一位老师王荫浓，带着我们历游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园地，为我们理解民族的心灵打开了一扉通路。当时学校有一个图书馆，中午借书。我住家远，带一顿午饭，用不了半小时就吃完了，还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到图书馆读书。主要是读中外文学作品，也杂七杂八看些科技知识性读物。在家读课外书，是我从小学即养成的习惯。那时只是浏览，是看故事。也许没有过多似是而非的“指导”，所以涉猎面广，由此拓展的视野使我至今受益。应该说中学的课内课外，除课外读了几本有关社会发展史之类的书籍——当时被列为禁书外，几乎很少涉及经济理论。但经济不能脱离整个文化，没有必要的文化底子，土法是上不了马的；上去了，也跑不起来。

再一个条件是广泛接触社会。参加革命前的20多年，我经历的是温馨的童年，贫苦的少年，中学毕业后的坎坷谋生，变化极大。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有机会广泛地观察到社会的



众生相。参加革命后，两度从事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到农民中间，使我这个出身城市的青年真正看到了中国更广大的农村世界。从教后，又多次走出校门参加城乡各种运动。十年动乱则下放到“五七干校”。建国后的这些活动，很多是在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指导思想下组织进行的，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我觉得这些活动，甚至“左”的路线本身，都使自己对人生有了一步深入一步的领悟。没有对人生的领悟，恐怕经济理论的奥秘之区也是难以深入的。当然，接触生活、接触社会，完全不必要以极“左”的伤害知识分子的路线为前提。

时代背景不同，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但科学之路总会被有志者走出来的。

1993年12月



就名词术语 讲点学习方法问题

作者解题

1999年12月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本科毕业班专题讲座的提纲。

金融学科中的名词术语，有的是指认客观经济范畴，如货币、银行，有的是指认客观经济过程，如货币均衡、通货膨胀。了解这些经济范畴，了解这些经济过程，往往是一门学科世代研究的总结。而对经济范畴、对经济过程的界说、定义，则通常是从某一视角、某一深度观察所做出的理论概括，从而不可能是全面的。可是学生希望有一个绝对科学、彻底排他的定义；教师也力求教给学生这样的定义；一般人更想记住了这样的定义也就等于掌握了这门学科。这就使得人们对名词术语的争论特别感兴趣。

在1999年，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界定通货紧缩。然而，就像过去的一些定义、界定的讨论一样，精力耗费了不少，结果不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收获不大。而学生们却特别希望能给出——实际极难给出——既简明又权威的答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向同学讲了“就名词术语讲点学



习方法问题”。

文中的标题以及最后一节概括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补充，那就是不应就界说论界说，就定义论定义，而应从学科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和学科探索已达到的深度求得较为全面、较为本质的理解。

本文编入《金融——词义、学科、形式、方法及其他》
(金融出版社，2001)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一）不要让名词术语“套牢”

1. 为什么想起要讲这个问题？

①货币的定义。

②通货紧缩的争论。

2. 简单说说货币的定义

①不应死背一个定义——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特定的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这个观念是马克思以前的学者已经有了；马克思的论证有质的发展。

如果是论证劳动价值学说，懂得马克思剖析这一问题的精髓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只简单背下这一条，什么是货币依然不清楚。

——碰上非要“定义”——而且是非要“一般等价物”答案——的判卷老师怎么办？对策似乎并不复杂：一般等价物五个字并不难记。



②必须懂得对货币的更接近生活的一些界说，比如“流动性”。

3. 通货紧缩

①三种说法（基本是两种说法）：

②就定义的本身来剖析：

——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是不是必然伴随着经济负增长？

答案是否定的^[1]。

——假如硬是认定“通货紧缩”只能指“必然伴随着经济负增长的物价水平持续下降”；那就应该给“伴随着经济正增长的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再起个名字。这样地闭门造车，增加烦扰，得不到公认。

——再一条出路是：通货紧缩即可指伴随着经济负增长的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也可指伴随着经济正增长的物价水平持续下降。换言之，可以称之为通货紧缩的经济过程，只要求一个条件，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

③趋势如何？恐怕人们日益取后一条路。

——如何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儿的演化（外国、中国）可为借鉴。

——这类名词只是用来概括某种经济过程，取决于约定俗成，它本身没有必要花过大的精力去争辩。

——但这种想法是行政命令统一不了的。可听之任之：自己的用法要一以贯之（至少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内）；旁人的用法则要分辨清楚。

④要花精力研究的是：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与经济成长的相互关系；如何预防不陷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境地；如何摆脱这样的境地；如何辩证认识这样的经济过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就如同通货膨胀并非总是可怕的，通货紧缩或许也是如此。近来就有一种“应该把通货紧缩视为一个机遇”的思想；而过去多年严厉批判的“通货膨胀有益论”，现在好像颇受青睐。

（二）使用名词术语也要讲求规范

1. 不让“套牢”的同时也应注意避免不讲规范的毛病

由何引起这样的思考？近来大家都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理解得均极笼统^[2]，不利于问题的分析。

2. 要分清宏观与“非”宏观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词是用来分别代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宏观政策工具。它们是财政部门 and 货币当局从宏观角度干预经济进程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由财政部门实施的所有与财政收支有关的政策和由金融主管当局（不只是货币当局，在中国还有如证监会、保监会）实施的所有与金融活动有关的政策。

这有点不太好分。比如，在行文中，“由财政部门实施的所有与财政收支有关的政策”自然而然会简化为“财政政策”；硬是不准如此简化，那做不到。在这里只能联系上下文把握。如讲宏观干预问题时，或与货币政策并列时，财政政策这个词应是指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工具的那个“财政政策”，而不是指“由财政部门实施的所有与财政收支有关的政策”。

3. 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总体似乎比较容易分清，其实也不然

要说明这点，可翻回头，再看看环绕通货紧缩的争论：



①分歧的焦点，是为了论断中国是不是已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但戴不戴这项“通货紧缩”的帽子有何本质意义？

——当局怕的是什么？怕造成人们对经济形势过分悲观的预期和动摇人们的信念。

这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一谈通货紧缩，就好像面临着 1929—1933 年的大危机、大萧条。国外的宣传也大多是这个调子。

——非得给戴上这顶帽子是为什么？

当局已经承认了需求不足，做出了扩大内需的决策并大力予以贯彻，如“积极财政”的出台，应该说劲头是够大的了。

那还要什么？最简单明了地说，就是要“积极”的货币政策；而所谓的积极货币政策就是要求进一步加大货币供给扩张的力度。

②在这里：货币当局说，货币政策适当，无可指责，不需再加“积极”。攻之者说，依然是紧缩：过去是“适度紧缩”，后来是“适当”，是“稳健”，直到最近才提出“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等等。一直不“积极”，货币供给不足，必须学财政，也在货币政策前冠以“积极”。

——“积极”，实在不科学。财政部门这么用了，那没有办法；再加以“推广”，实不可取。

——至于“提法”，不要看字面，要看行为实际。就货币政策来说，至迟在 1996 年中实际已是“扩张”的了。

——问题是货币供给，到底是多是少？

4. 如何分析货币供给是多还是少？

——简单说来，应多视角地分析。

单纯看名义货币供给量，无疑增长率是放慢了。这是最常见的引证数字的方法，也是论证货币供给量过少的最主要的论据。



较为进一步的分析是把货币供给量的增速与 GDP 的增长率对比来考察。如此得出的印象：货币供给的趋势并非急剧缩小。

如果从实际货币供给量来看，可能得到颇为不同的印象：

以 M2 的实际增长率与 GDP 的增长率来比，1993 年及以前两年，前者大大高于后者；1994 年略低，1995 年略高，或可说这两年基本持平；1996—1998 年的三年，前者又明显高于后者，而且高出的幅度与 1991—1993 年相近。

以 M1 的实际增长率与 GDP 的增长率来比，1993 年及以前两年的趋势基本同 M2，前者大大高于后者；1994 年和 1995 年两年，M1 的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 GDP 的增长率；1996 年稍高；1997 年高出的幅度大体与 1991—1993 年高出的幅度相当；1998 年高出的幅度，较之 1997 年，有所缩小。

所以，仅就货币供给量分析，也难于简单作出货币供给不足的判断^[3]。

5. 融资困难的确存在

然而，“攻之者”推断货币供给少了还有一个重要论据：融资困难。这确是需要讨论的；而且涉及本节的主题——对名词术语的规范掌握问题。

或许可以把 1996 年，至少可以把 1997 年视为始点，在金融领域中事实存在着两个并行的走势：

一个是宏观决策的取向：从 1993 年中开始的紧缩过程，至迟在 1996 年中，出现了转折，即货币政策事实上日益明显地采取了扩张的取向。虽然提法从 1994 年到 1997 年 4 季度之前一直是“适度从紧”。

明确拉动内需之后，自然是进一步地明确扩张。至于提法，开始是不再提“适度从紧”，后来有“适当的货币政策”，再后是



“稳健的货币政策”，新近是“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另一个与之并行的趋势则是金融领域中伴随着“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行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日益强化而出现的紧缩效应。这一效应的开始如果可以回溯到1993年中，那么在1997年末的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可以说是继续加强。但在这次会议之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态势已经明朗到谁也不能不承认的程度。

“整顿、规范、化解”，原则上说，是发展金融事业之所必需，任何市场经济均极关注。但是在通货膨胀的背景逐步让位给通货紧缩的条件下，步调、力度依然原封不动地推行，则是不合宜的。

两个相逆的取向同时起作用，于是，金融措施的紧缩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消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意向。现在人们谈论货币政策，其所指，实际上往往包括所有的金融政策和举措，是以所有金融政策和举措的效应作为评估货币政策的标准。因而人们埋怨货币政策“不积极”也非空穴来风。但无论如何，把所有的金融政策和举措笼统地视之为货币政策则是概念的混淆。“混淆”，就不能对症下药；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货币供给，并不能解决金融活不活的问题。

（三）翻译过来的名词术语千万不要 从中文的文义推衍，钻牛角尖！

1. 现在人们说货币供给不足，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就是字面的影响

“通货”——“紧缩”了，岂不是货币供给不足？



2.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这两个词最典型

我们的这两个翻译过来的词，其结构有共同的特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极其强烈的复合词。而原来的洋文，则绝不是复合词：是膨胀，是紧缩；是不是有“通货”含意，至少在字面上没有直接表示。正是由于中文的复合形式，于是我们这些年的简化语是“通胀”，而不是“膨胀”；是“通缩”，而不是“紧缩”，并反转过来更加强了其复合词的特点。以致对于我们的经济是否已陷入通货紧缩的发问竟然使用“通货状况”如何的提法……

翻译过来的词就应该就原文的词义去理解。——这里必须“接轨”，这种接轨绝不是洋奴哲学。比如国际常用的通货膨胀率，大家都知道是指价格指数的变动。假如非要按中文字面把它理解为货币供给量的指数变动，那只不过是自找麻烦。

3. 类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名词术语还有许多
如财政、金融……

4. 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词也不能只凭字面解释其含意

如“拨改贷”，现在就有不少人不了解改革开放初期实施这项措施的具体背景，把它泛泛地解释为：财政不拨款了，企业的资金需求都由银行贷款解决。

中国的古圣先贤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告诫：千万不要“望文生义”！

(四) 对炒得很热的名词术语 首先要搞清争论的目的

没有搞清提出并争论某一名词术语的目的，就没有参加



争论的前提条件。

1. 这里举一个前几个月炒得极热的“铸币税”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提出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是不是有一大笔钱国家没有发觉？而不是仅仅推敲抽象的名词解释。不论你自以为解释得多么合乎逻辑，推导出多么好的模型，如果找不到它的具体位置、规模大小，特别是它的会计表现，那政府就无法把钱拿到手，那就是空的，没有用的；请出洋权威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也没有用。

2. 剖析的一般思路

① 铸币 (coin) 流通时的铸币税 (seigniorage)。

——封建诸侯和封建王朝的铸币税；

铸币税的收入有时为正，也有时为负。

——“劣币”铸造时的铸币税；

——自由铸造制度下的铸币税 (费) ——政府收入的理论值应为零。

② 政府直接发行纸的钞票 (或银行发的钞票交给财政)。

中国宋、元、明即有；在西方的出现是以民族市场的形成为前提。

这时用“铸币税”所表达的含义可从铸造劣币的含意引申。

③ 现代银行体系下要用“铸币税”说明什么问题？

不过是要说，银行里还有一大笔钱，挖出来可以拉动内需！

为了解释这个相当生疏的词，还翻译了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的条目。但这个条目，关于①②的解释是对的；关于现代货币供给机制下的解释，从整个社会的角



度，提出了模型，也有启发；至于是不是在银行里还藏着一大笔钱，该条目的作者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需要论证。

3. 大体可做出的论断

现代的货币供给机制，相对于使用金属货币来说，有极大地节约。

如果用铸币税这个词来代表其节约的总规模，可以制定模型度量它的大小。

如果用铸币税这个词来代表政府从中可以形成多大的收入，其具体剖析，我还没有看到系统而实在的剖析。

至于当前还有多少钱被“密”起来了（具体说，有多少钱被中央银行“密”起来了）？积极鼓吹铸币税者说一定极大。但一点证据也拿不出来——今后也拿不出来。因为思考具体问题的方法是脱离生活的，是“想当然”的。

当然，可以具体剖析，但必须排除不懂充懂，想当然。经济学中有的问题只能靠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如价值论。有些则必须理清经济机制的运作过程直至相关的数量关系，其中有相当部分要借助于会计工具。否则，则难以作出有价值的判断。

至于具体的剖析、推衍，或许应该留给大家思考。

4. 不过可用先秦诸子擅长的“抽象思维”法作个了断 经济中是否还有一大笔财富我们没有找到？

先讲一个 50 年代初的事例——财政部老副部长戎子和谈的 1953 年的事例。

领导问：财政有钱，为什么一动用市场出了乱子，是否钱只是账面上有，而实际被人贪污了？——这是抽象思维！

以抽象思维对抽象思维：财政部老副部长戎子和回答：贪污了这么多的钱，他往哪儿存？



在铸币税这个问题上如运用抽象思维，可以这样论难：
上上下下天天盯着钱，围绕着银行的行家里手盯了多少年，都没有看出门道，难道书生在书斋里竟然参透了天机？
借用金圣叹批十才子书的笔法：“一笑”！

（五）在名词术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上面已举出 4 条：

- （1）不要让名词术语“套牢”；
- （2）使用名词术语也要讲求规范；
- （3）翻译过来的名词术语千万不要从中文的文义推衍，钻牛角尖；
- （4）对炒得很热的名词术语首先要搞清争论的目的；
再加一条：
- （5）不要瞎创造，如积极财政之类！

【注释】

[1] [美] A·加利·西林，李扬、黄金老等译：《通货紧缩》其中有一章《“好”的通货紧缩和“坏”的通货紧缩》。

[2] 《财贸经济》1999（11），李扬文章中的注①。

[3] 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对于“一切都是货币现象”这个货币主义的论断应该如何把握？如下的推导（相当普遍）即失之于过分简单：需求不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是客观实在；按货币主义的“一切都是货币现象”的命题，必然是货币供给不足判断；无可置疑的处方：扩大货币供给。

在需求不足的形势下，扩大货币供给的确是无疑的。但是否已经采取了扩张货币供给的措施。能否和应否继续大幅度扩张？而且更重要的是，运用货币政策强力扩大货币供给是不是扭转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最关键的因素？



实事求是谈

作者解题

应是一篇应命的急就章。

收入《北京高等教育丛书·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学者治学经验谈》。

2006年8月

治学要讲求实事求是，这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但多年从事教学研究的体验，不仅是自身的体验，也包括有意、无意观察旁人有关这方面言行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一再提示，要真正做到，或者说的客观一点，要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绝非易事。当然，这是对那些在治学中的确真心诚意想实事求是者来说的。至于巧言令色，华容取宠，企求实事求是之名，而无实事求是之实者，显然不在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之内；干脆不掩饰自己本来就不想实事求是者更不存在想实事求是却总难于做到的困惑。

主观上方向明确，主观上也朝自己明确的方向努力，但客观结果却事与愿违，这需要自己努力探究、剖析、总结原因。



有所领悟，就会有所前进。

一点体会，是需要检查自己的视野。如果视野只覆盖所要观察的客体的一小部分，那就无从对客体作如实的，也即实事求是的描述。通常说的“以管窥豹”、“井蛙观天”、“夜郎自大”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以井蛙观天为例，井底的蛙把天形容为“○”，他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形容为其他形状那倒是非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却闹出了笑话，是因为他的视野较旁人小。假设所有的观察者生来都没有离开过井底，井蛙关于天的说法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所做出的实事求是的论断，至少就那个“历史”时代——所有的观察者生来都没有离开过井底的历史时代——是应该视为实事求是的具有真理性的论断。

任何人的视野都不可能没有其局限性。问题是：①要自觉承认局限性之必然存在；②自觉地努力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来扩展视野。然而，人们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欠缺这样的自觉性，对治学者来说这是大要害问题。

我是学货币银行财政金融的，也可以说是学经济学的。在这方面深有体会。



充实自我

——谈金融人才成长之路

作者解题

2002年1月11日访南京大学，并以这个题目讲演。讲演内容，不少是过去讲过的。不过环绕人才问题，特别是自我培养，有所展开：如努力融会东西，关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的链接，力求把自己锻炼成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可以无障碍地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人才；如应锻炼必要的“容忍”，排除概念带来的干扰，力求不为概念使用的差异所干扰而进入实质性的剖析；如重视对自己思维的打造，能动地把握自己逻辑思维“软件”不断升级的质量……

为讲演准备的是幻灯片。本文转换成文字提纲形式。

收入《黄达文集（续）》。

2006年8月

（一）金融——红得不得了！

1. “红”得不得了

（1）金融——成了“核心”！不谈金融——不足以显示时



代人物的身份，不足以显示学识和睿智。而且，讲金融——人人俨然都是“行家里手”。

(2) 在我们教育领域：

专业——高等院校遍地开花；

高校重点学科——布点指标优惠；

“表外”专业——金融学科的特权；

各校延揽师资——千方百计，重点投资；

学生报考专业——普遍地列为首选，而且在“金融”之中还要优中选优！

2. 越“红”越应冷静思考，“红”需要支持

(1) “红”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反映。金融，在当前世界生活中，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也在政治领域，都是从社会公众直到顶级决策层所共同关心的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人们对之特别关注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

(2) 问题是我们如何使这个“红”，实实在在地“充实”起来。

不管是否关心“充实”，在不断的碰撞中，一方面，对金融的看法终归会达到“热”与“冷”、“爱”与“惧”……的统一；与之同时，则会使红火的气氛日益累积扎实发展的根基。

(3) “充实”是必然的，问题是代价。较自觉，代价就会较小！

(二) 关键是人才

不是泛论人才问题；也不是全面议论金融人才，如一个WTO与金融人才流失就是一次讲演的重磅题目。



在这里，只想对有志于自我培育成金融人才的人才贡献几点建议。

1. 融会东西——关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的链接

(1) 金融领域中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大量快速地充实力量，自不待言。但就经济学界、金融学界来说，其中特别需要的是：

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可以无障碍地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人才！

当然，这属于“顶尖级”的人才，但他们决定着人才队伍的水平。

(2) 这个似乎有点“浪漫”的提法，刺激其提出的原因是：

从经济学科、金融学科的学科建设角度观察，在加速对外开放和接轨的局势下，用中外、东西结合的要求衡量，差距越发显得突出！

(3) 要中外结合：

a. 一方面要靠出国多年并积极愿为祖国效力的学子。

其中有些人的确学有所成，已开始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俱乐部。

他们介绍西方金融学科前沿，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可是，从思考问题习惯、体察中国生活脉搏的角度来看，却往往有一层颇难具体描述的隔膜。

时日和生活的历练会使隔膜消除；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以日、以月计，而是以年计的过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下意识地排斥中国的、民族的传统思维。这就不太容易体察中国的经济脉搏。

这样的矛盾并非出在今天。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外国



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讽喻。

b. 要中外结合，另一方面则要靠在国内环境中生活的、为数众多的、由中国高等学府培养的、对于体察中国实际多少有些根基的学子。

“土生土长”并不等于“土头土脑”。应该说也都有了一点“洋味”：学到不少西方金融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一些前沿学问；掌握了不少名词术语、数学模型……

但基础锻炼不足，往往失之于片断、表面，没有掌握真正的精髓。用以指导实践，出现过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议论。

而且也不因土生土长而对本国实际就自然而然地具有深透的了解；甚者，在国内就有点“洋”过了头：对本国实际不感兴趣。

c. 两支队伍都是现实的存在，但各自都有缺欠：

就国内队伍来说，立足本土，企图实现向外的跨越，——但总体说来，尚未实现实质性的跨越（这包括教与学两方面）；

就归国效力的队伍来说，实现了向外的跨越，——但要跨回来，也非轻而易举。

两方面“结合”起来不就全面了？

当然，推动“结合”是必要的。不过，经验证明，真正的结合必须是在一个人身上的结合！

d. 结合难的原因可以列出甚多，其中有一条是做学问的人所最难于跨越的，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要不，跨不过去；

——要不，跨过去了，退不回来。

e. 到底有没有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可以无障碍地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精英？

有！老一代的学人里面就有。



当前，金融学界的后起之秀、学术骨干中也有！其中既有学成归国的，也有国内培育的。他们实现着或已实现了“往返的跨越”！

就金融学界来说，问题是凤毛麟角，数量太少。

f. 需要培养出一批具有这样水平的精英，——这是我们高等学府金融院系的主要职责。

具有这样水平的精英，其相当部分，也理应在大学，特别是大学金融院系的摇篮里成长！

有志成为这样的人才，必须培育自身的文化素养！

要想成为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不能只把视野局限在专业领域；没有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语言的、哲学的等等方面的学识和素养，无论任何专业，都不可能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境界。

g. 这包括两个方面：

——用“外语”来思考（并不等于“洋化”）；

——对华夏文化要补课（没有根基就谈不上融会贯通，而只能“被”融化：融过去，回不来）。

老一代融会“东西”的学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同时能融会古今。

“补课”，就是要求融会古今。当然，绝不是鼓吹“皓首穷经”；实际也无可能。

h. 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训是：对文化传统素养的关注长期处于削弱状态。

传统文化精髓举例：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管子》；《盐铁论》……

但不论自己的理解是深是浅，是有所领悟，还是若明若暗，必须谨记：关心文化这一根本问题，对于自我培育专业理



论素养至关重要。

2. 必要的“容忍”——排除概念带来的干扰

(1) 举例：

a. 货币覆盖圈圈的混乱。

按理说这是最不应出现模糊的地方……

我国：货币供给的“货币”与货币发行的“货币”；

IMF：money supply 中的“money”等于统计口径中的“money”加“quasi money”，即

$$\text{money} = \text{money} + \text{quasi money}$$

$$\text{money} = (1 + \text{quasi}) \times \text{money}$$

$$1 = 1 + \text{quasi}!$$

看似混乱，但大家都懂。想要毫不含混，并非轻而易举。

b. 环绕“通货紧缩”所费的笔墨。

什么样的经济态势才应称之为通货紧缩？

① 价格水平下降；

② 价格水平下降，同时 GDP 负增长；

③ 价格水平下降，同时伴随有 GDP 的负增长与货币供给的负增长。

是不是可归结为“冠名权”之争？

设 A 代表价格水平下降；B 代表 GDP 负增长；C 代表货币供给负增长，则冠以“通货紧缩”之名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① A

② A、B

③ A、B、C

为什么必须是 A+B+C 才可称之为通货紧缩？

——赞同这样主张的认为：因为 A+B+C 是典型现象，经济文献中有关通货紧缩的论证也大多以之为对象。的确，上



个世纪， $A+B+C$ 是典型现象。

——不同的见解认为：世界经济史上，①②③这三种经济态势都曾出现过。比如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有 $A+B$ ，在 1950 年 3 月后、在 60 年代初有 $A+B+C$ ，在 1989—1991 年和 1997 年以来有 A ，而无 B 、 C ……

这就会有不同的取舍：

——从世界学人之众，只把 $A+B+C$ 称之为通货紧缩，才有利于交流；

—— A 是“通分母”，有 A ，即可称之为通货紧缩，简单明了，而且，洋人也多如此用。

这样的讨论，不可能求得统一：谁也否定不了谁（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散文集中关于墨点与虫子的争论）。

应该说更需要讨论的问题甚多，如：

—— A 、 B 、 C 之间，在不同经济条件下极其复杂多样的相互制约关系。

——不论是 A ，是 $A+B$ ，还是 $A+B+C$ ，好像都有个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什么需求不足？如何拉动需求？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是否比“冠名”更有实质意义？

类似的争论，其实早就存在于如何界定“通货膨胀”的困扰之中。可以说，怎样才叫“通货紧缩”的争论只不过是怎样叫“通货膨胀”争论的翻版！

c. 金融与 FINANCE（略）。

（2）问题如何解决？

就一种语言本身来说，概念的系统并不是“无冲突”的系统。

要在两种自身本身就存在冲突的系统之间建立绝对的、毫无



例外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庶几乎可以形容为：“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不同用法并存，如何办？

“你死我活”抑“和平共处”？出路只有“和平共处”！

客观是复杂的——不因人们企望简明而简明。

所以我们不得不“容忍”复杂的客观和反映复杂客观的复杂概念系统。

在对象同一而概念却多样化的现实中，应具有的素养是：无论对方在怎样的内涵和外延上使用概念，都能不为概念使用的差异所干扰而进入实质性的剖析。

3. 重视对自己思维的打造

(1) 人总是按照一定的程式、规则、逻辑进行思维的。问题是思维的逻辑程序是低级还是高级，是迟钝还是锐利，是顺畅还是经常出错，大有区别。对论断的正确程度有关键意义。

这个“逻辑软件”是不断升级的。越年轻，升级的频率越快；越年老，升级过程中的死机次数越多。但不同于电脑的是，人，具有把握升级质量的能动性。

(2) 把握升级质量的能动性，则需要经常结合生活中的实例，特别是金融问题的实例，剖析思维逻辑的毛病，那就有可能实现自我诊治的“升级”。

事例一：如为什么人民币该贬值不贬值，该升值不升值？为什么该降低利率不降低？……

a. 仅就“贬值”问题剖析，按照如下的推理：

——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已大幅度贬值，从而人民币高估；

——按照币值高估不利于出口的原理，中国的出口必将大幅下滑；

——在国内需求明显疲软的条件下，国外需求同时下降，



后果是严峻的；

——因而贬值是关键性的对策！

人民币高估是事实；币值高估不利出口也是基本的原理。

但如果考虑如下的因素：

外贸已有的订单、出口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国内出口业的竞争潜力等等，是否依然有保持出口增长的可能。

除外贸外，还存在有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吸引外资、如对外还本付息的负担……

仅就经济的损益综合评价，结论也不必定是“贬值”这一条路。

b. 问题出在哪里？

“币值高估不利出口”这一原理，有一个经济原理所共有的约束条件，即“其他条件不变”。

当然，如果其他条件的作用太小，纵然“变”了，也可视为“其他条件不变”。

否则，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依据以其他条件不变为约束条件的原理所作出的论断并不必然是唯一的、正确的解。

“其他条件不变”的微观分析方法是人人懂得的；但在分析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却是人人常常容易忽略的——没有在运用原理时，把抽象掉的“其他条件”再如实地予以应有的估计！

c. 我过去曾有一个概括：这是感染了“教科书病毒”！

教科书论证得太完美了：严格的逻辑推导；精确的数学模型；形象的曲线视觉……

它给出了从“复杂”提炼出来的“抽象”，却极少给出从“抽象”如何回归于“复杂”的指引——这不是它的任务。

而教与学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



事实上，由于前提和推导的过分抽象化，甚至极难实证。

——如“M—M理论”，“生命周期理论”……

——如无摩擦的市场，完全信息的市场……

这并不否定：思路极为重要，论断极有价值。但必须注意，不能“孤立化”、“绝对化”。

事例二：贪污腐败与消费不足。

在讨论消费需求不振时，偶然听到一个论点：贪污腐败掠夺了老百姓的货币收入，也是消费不足的一个原因。

a. 的确，老百姓口袋中的货币少了，消费需求相应减少；但货币并未消失——跑到贪污腐败分子的口袋里。

b. 贪污腐败分子拿这些货币干什么？

如果不敢用，舍不得用，消费需求等量减少；全部拿到国外去，结果一样。如果花天酒地，消费需求总量不变。如果部分消费、部分投资，社会总需求不变。

这有点像笑话，可是在宏观分析中，类似的笑话极多。

c. 宏观分析的对象，至少是相互之间存在着难以割断联系的一组变量。如果变量组成链条，只取其一段分析，如果变量纽结成多面体，只取其一面分析，都不会得出有意义的判断。

事例三：韩国一夜之间穷了一半。

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席卷北上，给韩国以沉重打击之际，韩元的汇率贬低一半。于是报纸上出现了大标题：韩国一夜之间穷了一半！

a. 韩元对外贬值一半，绝不等于韩国这个“国”穷了一半：

——韩国的产出，以可比价格计算，有损失，但决不会损失一半；



——韩国的生产能力有损失，但更不会损失一半；

——韩国累计的财富有损失，但损失的比率恐怕只是很小的百分数；

——韩国的秀美山川，依然故我；

——韩国的人口不变，知识素养结构还可能在经受危机震荡之中有所提高……

b. 如果要寻求可以成立之点，那就是用美元计量的“韩元”少了一半。

显然，这是一个“名义 (nominal)”与“实际 (real)”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类似的问题极多。如社会保障基金的欠账；如“资本经营”……

当金融的急速膨胀着的作用弥漫视野之际，往往就易于只见“名义面”，而忽视“实际面”！恐怕这是学金融、讲金融的人士所特别应该注意警惕的。

(3) 要想结合实例，剖析思维逻辑，最重要的是，把自己转换为自己的对手：

这是治学的修养——极难做到，但必须经常要求自己做到！

进入这样的境界，你将成为超一流的大家！

谢谢！



是不是可以这样思考

作者解题

2005年11月16日，在财政金融学院对博士生做了这个题目的讲课。

主题是：经常注意如何思考，是自我提高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讲了思考应分清层次；应深入利益、实力的相互折冲去分析；应保持几分从容，才能深入；应多从必然性认识事物，才利于把握方向，等等。

本文没有发表。

2006年8月

要讲的内容虽非随手捡拾，但也无严格的逻辑条理。看做是交换心得可也。

(一) 层 次

思考是否要有个层次？



问题是有层次的。层次有高、有低，有深、有浅，有古、有今，有实、有虚……讨论问题要分清层次好像理所当然。

然而，人们很容易：

——人家在哪个层次上提出问题，就跟人家在哪个层次上辩论，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

——总认为自己是在最高、最深的层次上提出并讨论问题的，自我高估从而闭塞进一步提高之路……

例一，现在，效率与公平是作为一对矛盾来讨论的重大政策取向问题，是个热点问题。讲来讲去，好像讲成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无所不适的问题。但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层次看，效率属生产力的问题，与公平并不是一对矛盾。

1. 以奴隶制为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取代了原始公社——以“不公平”的剥削制度取代了无剥削的“公平”制度。这里，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2. 从改革开放的决策层次看，效率与公平也不是一对矛盾——不得不放弃集中计划体制，不是因为集中计划体制“不公平”，而是因为这种体制缺乏效率，也许可以说是由于平均主义与效率的矛盾。这里，效率与公平也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3. 当今，也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在这种体制的范围内，在这样的层次上，效率与公平才构成一对矛盾；是必须经常关注、必须经常大力加以调节的重大政治课题……

但，不论它在当今如何重大，却不能说成经济学的一般问题。问题是，混淆了层次往往会得出牵强附会的论断：

比如，孔老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从社会安定，从巩固王权的角度论公平，不涉及效率。

再如，说西方经济学是单纯强调效率，社会主义则不能忘



掉公平等等，也属牵强附会。依据统计数字，我们的贫富差异甚至大于某些老牌西方国家，那岂不是说人家比我们更加重视公平！

而且，“公平”也要诠释……

例二，近来，关于房地产开发的讨论，展示的画面从泡沫到腐败，从开发商到业主，到物业之间的种种矛盾，从房地产投资到宏观均衡、到社会稳定……真是处处有问题，使人头晕目眩，不知要对社会经济生活捅出个什么大的娄子。

如果从“居者有其屋”的历史大话题看，那是世世代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如果从建国以来，经改革开放，到“每人有两套房子”的话题，到新世纪之交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好像国情国力和人们的要求，都反映住宅这个至少上千年的历史大课题正处于全国城乡——特别是城市居民——较为明显地向一个高层次跨越的必然趋势。

几亿、十几亿人口居住条件跨上一个新台阶，那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解决的问题，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够提高到这样的层次去思考，就会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在一次大的跃迁之际，发生持续不断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具体问题应该具体研究、积极解决。但视野高了，则不会忧心忡忡，杞人忧天；就会乐观地看到问题解决的前景。

(二) 折 冲

要深入利益、实力的相互折冲去思考、分析！

读书读多了，思考问题总是从规律、原则出发；再精细一



点，则是建模、计量。

这是读书人的本分，无可指责。但仅仅凭这点本领观察现实生活，做出判断，并发表一通议论，往往散发着书呆子气息，实际也难以深入本质。

这并不是说，不要讲规律，讲原则，不要建模、计量。而是说，与之同时，更要深入地进行对利益折冲、实力折冲的剖析。

利益折冲、实力折冲构成社会前进的实质内容。可以不叫“阶级斗争”，但总有阶层、集团、群体之间的摩擦、碰撞……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只有结合这方面思考，才会获取较全面的认识。

折冲——现在用“博弈”这个词可能更时髦一些。

例一，人民币的升值、减值：

1994年以来的历程，反反复复：始于国外压人民币升值；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先是国外，继而国内，压人民币贬值；近些年来，国内外，主要是国外，压人民币升值。

今年7月，人民币升值2%。是计算得那么不多不少吗？时机是那么不早不晚吗？洋人在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减值都那么有学问吗？其实汇率制度问题，从布雷顿森林会议直到今天，是一个谁——包括国际级的大学问家——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怎样解决为好的问题。当然许多人自以为搞清楚了，但别人并不买账。

洋人，特别是议员，向人民币“发难”，根子是利益驱动；“理论”实际上是在决策后用来说事的。中国学者倒有人是以理论为依据，但只有理论，就显得乏力。真正的决策，是实力的博弈，而非在于书斋的论辩和计算之中。

例二，股权分置改革：

80年代末，在中国，谁也不知道资本市场将来是个什么



状态；但无论如何有了资本市场……

问题之一，带有决定性的，是出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必须解决。

于是有了“股权分置改革”；于是出了个“对价（含权）”问题。

多种多样的对价方案，多种多样的计算公式。到底谁占了便宜？实际算不清楚！方案能否成立，其实是博弈——要看社会“气氛”，看股东大会是否通过。

全流通的大框子是“必须解决”的。至于谁占了便宜，谁得罪了谁，相对于必须解决“分置”，则无关宏旨。

（三）从 容

保持几分从容，思考才能深入！

经济学家不是新闻记者，不能碰到经济问题就大惊小怪、一惊一乍。

新闻记者需要的是“卖点”，是要聚精会神寻找能够引起惊愕、震撼的报道材料；而经济学家是寻找规律，或者说，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是要应用学到的规律知识分析发生的经济现象。

是规律的东西好像不应大惊小怪；真的让你大惊小怪了，那应该是一般规律解释不了的问题。

本来是规律可以解释的，可你却大惊小怪，这说明你没有学到家，没有看到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不太像名实相符的，至少算不上稳重的经济学家。

（哦，现在出了个“大”问题——什么是经济学家？可放



在“层次”框架内讨论，也可放在其他框架内讨论，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听之任之可也……）

易于一惊一诈的例子甚多：

——两极分化（势所必然，问题是“度”）；

——基金黑幕（本来就是赌场，并非中国独此一家）；

——不良资产（金融是中国的“软肋”?! 是否只有“脆弱性”一面?! 一个重病缠身的银行体系竟然支持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倒也是令人惊愕的!）；

——贪污腐败（不能只从道德观考察……）；

——银行股份改革，出卖主权，拉丁化……

再一个例子：“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几乎年年听到这样的忧虑。

要是你年年跟着扼腕惊诧，不知所以，忧虑的彻夜不眠，也许早就看不到今天的大好形势了!

就眼前的局面，如果把听到的问题一一联系起来，好像明年就有可能泡沫破灭（有人说，不是“明年”，是“明天”）。

对于媒体的“大惊小怪”不必“大惊小怪”。要是没有了这些“大惊小怪”，我们的传媒事业恐怕就会十分寂寞，舆论也会过分清冷了。“大惊小怪”或许是振聋发聩之所必需。

其实，对于经济学家的“大惊小怪”，同样也无需“大惊小怪”。经济学界也需要“张扬”的经济学家，否则记者就难以找到采访的对象了；说得再“透”一点，也需要“炒作”（美恶不嫌同词，“炒作”绝非总是贬义的）的经济学家；“炒作”的题材中，沙里澄金，也时时有真正值得探讨的课题!

问题是，要是你真心诚意地对经济问题进行科学思考，那就需要保持几分从容。

思考时要有几分从容，才能分辨是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还是假的；面对急风骤雨的舆论，高深莫测的权威，如果保持不了从容的心态，那就是自己使自己丧失信心，纵然你确实是掌握着真知……

(四) 必 然

多思考必然，利于把握方向！

对于学西方经济学，有两种极端对立观点：

(1) 学西方，学市场经济，学过头了，损害了社会主义，损害了民族……

(2) 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总是指责没有原原本本、没有百分之百地照着人家（其实主要是美国）的路子办！

前者，口头上也讲应该学习，但时时事事看着不顺眼，是事实上的自我封闭；后者，就实质看，难辞“全盘西化”之咎。

对于这种状态，应多从必然性的角度思考。

这样的争论，从 19 世纪“西学东渐”开始，时起时伏，直到今天依然牵动着不少人的情感。

过去，常常听到这样模式的宣言：“如何学”的问题到这里已经解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以制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然而，“宣言”并没有能够结束这一对对立观点的存在——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它当作原则问题争论。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还得向人家学——这是客观必然！

有很长一段，我们是“天朝”，自认为是天下文明的中心和起源地，至少几千年没有受到挑战；其间多次外族侵入，结



果都被迅速同化。

当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已经被西方占领后，很长一段，我们全不自觉，甚至接连打败仗，还梦想会把“蛮夷”同化。直到逐步感到自己真正不行时，才痛定思痛，认识到要向人家学。

中间经历一段波折：从学西方到学苏联；应该说学苏联依然是学“外国”。

既然还不得不处于“向人家学”的地位，原来的老问题——“如何学”的问题，在新条件下必然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今天，就总体估价，处在全人类文明发展前沿的依然是人家，不是我们；因而我们还不得不处于“向人家学”的地位，并不断为“如何学”所困扰。

对于“学”，为什么有那么严重的方针、原则问题？

因为这涉及两种文化，两个概念系统的交锋与渗透，而它们的形成是经历以千年计的不同的途径。

两种文化，不能简单“PK”；而是要使它们衔接、融会。但这是一个极难、极难的过程。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浅层次的交往中，好像不难；步步深入阻力就越来越大。

一个“金融”名词，我先后折腾了好几年：2000—2001之间，我几乎用了一年时间来集中理清这个小小的名词概念。问题就出在在中国土壤上发展形成了至少一百多年的观念与九十年代中期从国外商学院带回来的观念发生了冲突。

1950年3月，我们一举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那时中国人既没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帮助，也没有用苏联老大哥“以新币兑旧币”的办法。我没有看到洋人对中国这个事例有深度的总结——他们的笔墨主要是用在德国在二战后克服通货膨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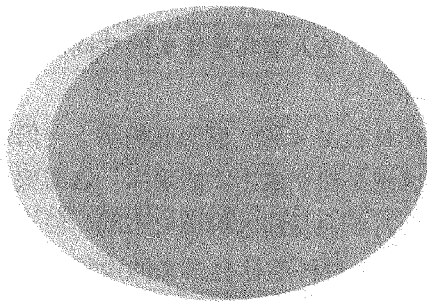


经验。恐怕，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是极其关键的原因。

深入到哲学领域，问题就更大了：例一，中国有没有哲学；例二，宋元明清，何时开始有启蒙思潮——如西方的文艺复兴——的萌芽？都是国内与国外谈不拢的问题。

我常常感到，两种文化中，思考问题的方法好像不一样，但我总结不出来。

能衔接、融会，又不能彻底衔接、融会，如图所示，于是必然有两个极端：全盘照搬和故步自封。



全盘照搬，就是要把中国彻头彻尾地“美国化”（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在抗日时期“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之际，就有“日本殖民统治是中国之福”的观念）。如果中华民族真的—直沉沦下去，彻底“外国化”也许可能成为事实。但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华夏子孙，在终于奋起抗争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实在难于想象这样的结局。

虽然不可能“美国化”，但的确存在“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老问题：只知道西方，只知道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教义和模型，却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即使谦逊恭谨，如不能消化西学并用之于中国实际，也有待提高。

学了点西方经济学，就认为可以指挥经济领域的千军万



马，这的确应予引导。但切不可做出他们已经在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判断。历史证明，这样的倾向从未决定性地左右过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今天依然如此。

至于故步自封也同样是一厢情愿。虽然事实上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叫板：“不应该向西方学”，“不应该学西方经济学”，但事实上拒绝“学”的思潮依然存在。为什么？

“天朝”观念早已不存在了；也大概不只是为了捍卫民族的荣誉和传统。主要的，恐怕还是意识形态之类。

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共产主义，作最一般的解释，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理想，而不单纯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信仰变成了客观必然。但要把客观必然变成生活的现实，这需要亿万人、百十代人的实践。十月革命是伟大的历史实践。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联共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诠释并不准确，从而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退潮。

但是，当人们仅仅接触过苏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诠释并一直从内心尊崇它是“绝对真理”时，那就很难接受改革开放的路线。同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对西方经济学相当陌生：只是习惯地原则考虑——是“立场”不同的学问，却无从具体分辨其哪些应该吸收，应该如何吸收。于是往往在没有弄清楚科学内容之前就做政治性的判断。当然，这不应认为是严肃的。

西方（美国）的心态：从过去的十字军东征到今天的“十字军东征”，新兴的西方，实际存在着是想鲸吞全球——不仅是土地、人口、自然资源，而且是想基督教义一统天下的思潮。应该承认，今天，他们有所领悟——东方文化不能简单抹



杀（如对孔夫子与儒家的研究；对《孙子兵法》与管理的研究……）。但同时应该清醒，他们也还没有从总体上领悟要向东方学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强者地位虽然受到挑战，却依然没有动摇（证明：对中国崛起的强烈逆反心理）。

是否永远不能全然融合？

也许这等同于问：共产主义（大同世）何时能够实现？

人类美好将来的理想，不允许我们作否定的回答。但它将是一个极其长远的过程。

2005年11月11日，有人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提问：何时全世界可以行使统一的一种货币？这是“欧元之父”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了货币领域，经济领域……

面对问题、面对困惑、面对干扰、面对矛盾，多从来龙去脉全面地思考其必然性，那就有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短暂的，还是持续的，可能涉及的面有多大，可能冲击的力度有多强，进一步将如何发展……

了然于胸，就有可能把握如何对待、如何处理问题的方向！

经常注意如何思考，是自我提高之不可或缺！